

临沂市在山东省的位置

临沂市政区地名图

#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全国文明城市

东夷文化发祥地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中国市场名城

中国地热城

中国书法名城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图例

- 市政府
- 县(市、区)政府
- 乡、镇(街办)
- 铁路
- 高速公路及道号
- 国道及道号
- 省道
- 县道
- 省界
- 设区市界
- 县(市、区)界



2012·09, 5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李克彬 秦鸿伟  
何相军 尹云川 王长利  
赵宗远 康德忠 刘兆东  
李凤军 王泽远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王傢玉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王瑞柱 伊永航  
杨兴文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贾 梦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 目 录

## 【本期特载】

罗炳辉：鲁南捐躯 英名永垂 倪良端 04

## 【峥嵘岁月】

征战沂蒙——开国上将傅秋涛 初学者好吧 10

王凤瑞起义经过 庞广兴 16

## 【名人素描】

踏遍青山人未老  
——记老党员王任之 王 滨 19

## 【文化掇英】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郯城木旋玩具：薪樗逢机显性灵 张铁民 26

##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31

## 【蒙山沂水】

临沂“头”字地名例释 邵明武 37

## 【探索发现】

孝悌临沂——《二十四孝》探源之五 大荒堂主 39

富饶庄高氏墓志考略 王相臣 孙 静 41



【诗画赏析】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续三）

李兴河 47

【影像沂蒙】

解放临沂

本 编 52

【沂蒙名医】

齐鲁十佳 秀出蒙山

——解读李廷国

刘凤才 56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陈姓（上）

赵丹峰 63

【史料辑存】

临沂汉画像石上的“车马”类型

桑玉厚 68

【沂蒙乡亲】

院士诗人王鸿祯

王善刚 75

【史志动态】

80

封面：二十四孝图之“卧冰求鲤” 绘画/陈少梅（清）

封底：书法/胡石



本刊声明

凡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均视为双方自动接受如下约定：

1、本刊刊载的文字、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稿不查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两个月未采用者可另作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作者文责自负，若侵犯他人权益，本刊概不承担连带责任。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即拥有在“临沂市情网”和本刊主办单位编印的出版物及资料上转载的权利。

# 罗炳辉： 鲁南捐躯 英名永垂

倪良端



## 入鲁首战告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中共中央不得不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在政治方面，同意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在军事方面，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作出了“发展东北，巩固华北，坚持华中”的部署。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军部命令由第二师的第四、第五旅和第四师的第九旅编为第二纵队，由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从淮南北上鲁南。1945年10月底，罗炳辉率部抵达山东滕县东北的龙阳，为新四军首批入鲁部队。

这时，蒋介石调集的军队正沿津浦、平汉铁路北进。其中，国民党第五路军吴化文部由徐州进至山东滕县。我山东八路军第八师、罗炳辉率领的新四军第二纵队的第五、第九旅奉命在滕县界河地区伏击。1945年11月2日夜，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队按命令进入各自地域，隐蔽待命。3日8时许，吴化文部先头部队由在济南投降的日军1个大队为掩护，沿津浦铁路以西公路北进。下午1时，吴化文部后卫离开北界河1公里，罗炳辉命十三团派第一营直插北界河。盘踞北界河的1连守军招架不住突然袭击，退回南界河据点。十三团顺利占领了北界河，斩断了吴化文部南逃之路。此时，八师、五旅、九旅遵循罗炳辉的指挥，放过为吴化文部开路的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公路两侧山上冲下来，分割围歼吴化文部。吴部被打得晕头转向，有生力量大部被歼，第六军军长于怀安等纷纷缴械投降。吴化文丢下部队，由几十名亲信卫士和骑兵护卫逃跑。两个多小时的伏击战，歼灭吴化文部4000余人。界河战役是罗炳辉在陈毅统一指挥下周密部署的结果，也是罗炳辉指挥第二纵队由淮南到达山东后的第一个大胜仗。至此，我军控制了津浦铁路徐州、济南段沿线130余公里，临城、枣庄铁路30余公里，解放了鲁南津浦线和临枣线广大地区，挫败了国民党军北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 把住山东“大门”

界河战役后，罗炳辉指挥第五旅第十三团继续围攻吴化文部第七军的1个团和土顽约1300多人据守的南界河。敌人大部被歼，少数突围



者被俘虏或击毙。

11月11日，毛泽东接到陈毅关于界河战役胜利的报告，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电报向津浦前线指挥部表示祝贺，同时要求：“为准备战胜敌人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铁路线的占领区，拔除临、滕、邹、兖地区的据点。”陈毅召集界河战役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的贺电后指出，国民党陈大庆的第十九集团军已由徐州进至临城（今枣庄薛城）一线，我们必须从全局考虑，准备打大仗，扼制敌人北进行动，掩护八路军主力在东北、华北的战略展开。会后，罗炳辉指挥新四军第二纵队向南行动，投入反击陈大庆军的战斗。

根据山东野战军指挥部命令，罗炳辉指挥第二纵队在新四军第七师第十九旅配合下，11月25日晚向临城、韩庄等敌人据点发起进攻。当晚至次日上午攻占了外围据点，破坏了临城至滕县、枣庄、徐州间的铁路，完成了对临城、韩庄的包围。26日下午3时，陈毅和罗炳辉向担任主攻韩庄任务的第四旅第十团团长沙华夺下达电话指示：“迅速打下韩庄，坚决消灭拒不投降缴械的日伪军，关住山东大门。只能胜，不能败，速战速决！”26日晚8时，我第二纵队第四旅第十一团的1个营炸毁了韩庄南的运河大铁桥，截断韩庄敌人逃路，徐州敌人也无法增援韩庄。吴华夺抓住战机，带领两个营和兄弟部队猛扑韩庄。困于韩庄的日伪1个中队自动放下武器，伪军张乃宇部800余人大部被歼，残部企图逃向徐州，因大桥被毁而纷纷坠入运河身亡。午夜后，罗炳辉在四旅旅长朱绍清、政委高志荣陪同下赶到十团视察，高兴地对吴华夺和指战员们说：“你们打得好，打得漂亮！我们占领了韩庄，就把住了山东的大门呀！”

新四军占领韩庄后，在陈毅统一指挥下，罗炳辉指挥第二纵队向徐州来犯之敌反击，迫敌退缩徐州城内。1946年1月13日，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生效，津浦线的战役暂告结束。

### 病中传书寄情

紧张的战斗，使罗炳辉的高血压症愈加严重。他多次昏倒，不省人事，无法在前线指挥。在组织一再督促和安排下，他不得不于1945年12月底将工作移交给纵队副司令员韦国清、政委赵启民，前往新四军军部临沂休养。

住进临沂城，组织上拟安排他赴苏联疗养。可是，1946年1月3日夜罗炳辉食管内血管突然破裂，只好就地诊治。病情稍好转，便移至临沂东郊独树头休养，由夫人张明秀和两岁的儿子罗新安、刚满月的女儿罗鲁安陪伴。

罗炳辉病情严重，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电告延安，请求将罗炳辉的大女儿罗镇涛护送来鲁。罗镇涛起程时，毛泽东抚摸着她的头说：“告诉你爸爸，他对党对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要他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党和人民需要他做更多的工作。”罗镇涛来到临沂，转达了毛泽东对爸爸的问候和关怀，罗炳辉听了很感动。当罗镇涛讲到她在重庆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在延安得到朱德和康克清等的照顾时，这位久经疆场、身历百战的将军，竟感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一段时间疗养，罗炳辉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为丰富休养生活，陈毅等劝罗炳辉到泰山游览，他愉快地接受了。1946年3月5日罗炳辉登上泰山极顶，在那里拍照留念。他在照片上端写道：“转战敌后苦战八年，和平民主终于开始实现。”返回临沂，罗炳辉开始撰写曾几度中断的自传。3月24日，“从青少年到吉安起义”这一段终于完成。

在休养期间，罗炳辉给毛泽东、朱德等写信，感谢他们对自己及女儿的关怀，问候中央领导同志。信是托赴延安的张云逸转交的。毛泽东在5月20日的复信中说：“炳辉同志，来信收到，极为感谢。你身体有病，望多休养。留得青山，是很要紧的。我身体好些了，勿以为念。”朱德和康克清在6月5日的回信中说：“炳辉同志，八年抗战，你为人民又建了许多功勋。我们常常盼望着你们前方的胜利消息和你的健康。云逸、黎玉两同志来此后，更知前方



罗炳辉和孩子们

战事及工作情况和你的健康。我们更深刻了解你们山东及苏北根据地是永远巩固的……”遗憾的是，怀揣毛泽东、朱德给罗炳辉复信的张云逸，由于局势恶化、交通限制，7月5日回到临沂时，罗炳辉已经去世，他没有读到毛泽东、朱德的回信。

### 生命的最后岁月

1946年6月，国民党利用停战机会，秘密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其军队不断向解放区进攻。

为了给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以迎头痛击，用实际行动保卫解放区，罗炳辉奉命下令发起枣庄战役。他召集参战部队领导讨论作战方案，亲率团以上干部实地考察敌情，一同制定战术战法……。9日晚7时，罗炳辉指挥第七师第二十旅、二十一旅一部，第八师第二十三团和二十二团1个营向枣庄伪军王继美盘踞的据点发起进攻。在猛烈火力打击下，伪军纷纷投降，王继美当场毙命，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副参谋长王纲、专员鲍国良以下官兵3300余人被俘，缴轻重机枪95挺、各类炮12门、汽车5辆和大批其它战利品。

枣庄战役是罗炳辉征战32年、参加和指挥的数不清的战斗中的最后一仗。正如他重返枣庄前线时对妻子张明秀和儿子罗新安说的：“我从十六七岁离家以后，始终驰骋在战场上，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了我的一切。我受党长期的培养和爱护，这次重上前线为党和人民捐躯，也是值得的……，我毕生没有打过败仗，在我牺牲前再打一个胜仗，作为我对党最后的献礼！”

6月13日，罗炳辉在峰县前线指挥所里写信给夫人张明秀，希望长女罗镇涛能“真正做个劳动人民的女儿，女革命家”。信中还无限深情地写道：“秀，你对我是特别照料、关心，可是我对你的母亲的安慰信写得太少，请她老人家谅解！”

14日，罗炳辉就当时国内形势和解散伪军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他指出，和平民主团结，是党在和平建国期间始终不变的方针。但是，和平的道路是曲折的，有阻碍、有困难。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到处布置内战，阴谋发动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他还说，枣庄伪



军王继美部被我解除武装，国民党反动派可能以此为借口向我进攻。所以，我解放区军民必须加倍警惕，密切注视动态，准备好自己的力量，为保卫和平、保卫解放区奋斗到底。

后来的几天里，罗炳辉强撑病体，召集七师、八师等单位研究枣庄战役的善后工作，同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就鲁南战略作进一步讨论。这时，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企图更趋明显了，他托宋时轮于17日赴临沂向陈毅汇报、请示工作。

18日，血压很高的罗炳辉又患肠胃炎，高烧退而反弹，昏迷不醒。但只要他神智稍清晰便问：“有电报吗？”“有什么消息？”第3天，罗炳辉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回临沂治疗。21日早饭后，罗炳辉由峰县乘大卡车启程赴临沂，中午至苍山县兰陵镇时，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于6月21日17时逝世，时年4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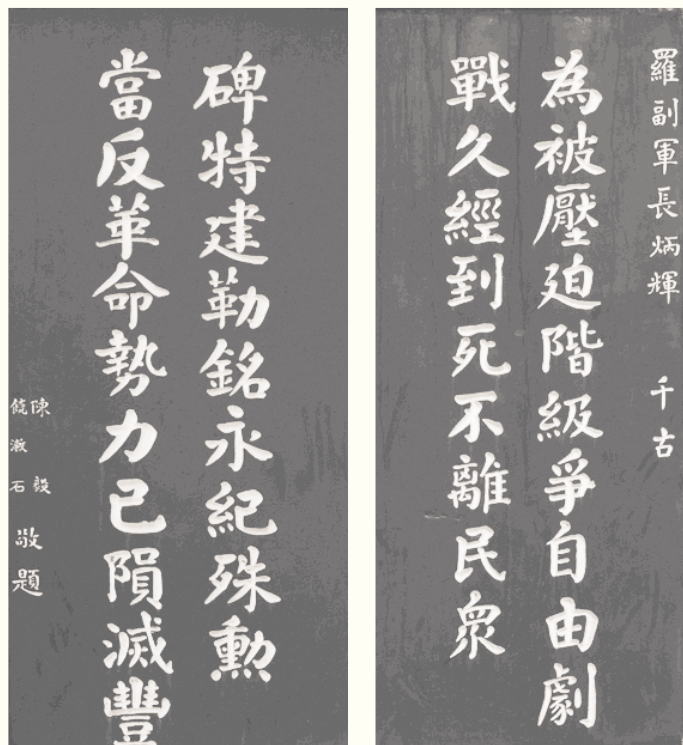
罗炳辉用毕生的精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

### 英名永垂青史

罗炳辉逝世的消息传到临沂，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参议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罗炳辉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在联合讣告中向党政军民沉痛宣告：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罗炳辉病逝。指出：“罗炳辉同志病逝，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极大损失。”

22日凌晨，罗炳辉的遗体运抵临沂县城，停放在布置就绪的灵堂里。山东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群众团体成员、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前来凭吊。陈毅等陪同罗炳辉夫人张明秀、儿子罗新安、女儿罗镇涛和罗鲁安到灵前瞻仰遗容。

22日16时，罗炳辉遗体装棺。陈毅在入殓仪式上致词，说：“我们与罗炳辉同志多年一块作战，现在只能瞻仰遗容了！这是我们最大的悲痛……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发动大规模内战的紧急局势之下，我们更加沉痛。但我们应在最悲痛时也不消极，将教育我们对法西斯反动派更加仇恨！”在历述罗炳辉对人民革命的贡献后，陈毅指出：“你的死是一个号召，





号召山东全体军民起来继承遗志，实行严正自卫！”陈毅向罗炳辉英灵宣誓：“你未竟的事业，我们一定去完成！”

23日，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山东军区司令部及罗炳辉的家属发来电。电文中说：“罗炳辉同志的病故，是我党我军与全国人民的重大损失。炳辉同志早年加入滇军，参加护国、北伐等革命战争。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战争中，又于1929年冬领导江西吉安起义，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不懈。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新四军第二师奋战皖东敌后，创造了皖东解放区，立功尤著。中共中央谨以悲痛的心情哀悼罗炳辉同志的逝世，并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

是日17时，新四军军部暨山东党政军民隆重举行罗炳辉遗体安葬仪式，10万军民送葬，行列长达数里。

罗炳辉病逝和安葬前后，延安《解放日报》、山东《大众日报》等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发布的《罗炳辉传略》、中共中央唁电和《悼罗炳辉同志》等文电，以及陈毅在罗炳辉墓前的演说词等，连续报道了山东和苏皖边区党政军民悼念罗炳辉逝世的的活动，登载纪念文章。“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反袁到北伐，起义赣江红。抗日君迈进，饮马江南北。苏鲁驰劲旅，日伪告溃灭。六载苦纠缠，疾病多磨折。革命不自惜，一朝痛永诀。”这是陈毅所写《悼罗炳辉将军》中的一节，概括了罗炳辉奋斗的一生。

月底，国民党发动了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我军放弃鲁南作战略转移，罗炳辉的老对手、国民党一三八师占领临沂。他们掘墓移尸，将罗炳辉的遗体凌辱后丢到沂河沙滩上。两位老渔民冒死收殮罗的遗体秘密掩埋他处，直至1948年10月临沂解放后，华东军区派出的调查小组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找到遗体掩埋地，将其暂厝于青龙寺中。

解放后，华东军区会同地方政府在临沂烈士陵园重新安葬了罗炳辉。陵园内修建了罗炳辉将军墓和罗炳辉将军纪念亭，罗炳辉将军石雕像矗立亭中，“瞻容思功”匾额高悬亭檐之下。陵墓石壁刻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陈毅撰联：“为被压迫阶级争自由剧战久经到死不离民众，当反革命势力已陨灭丰碑特建勒铭永记殊勋。”

附：

### 陈毅在罗炳辉将军墓前的演说

现在，在我们与罗副军长最后告别的时候，我代表我党暨山东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向他致沉痛的哀悼和崇高的革命敬礼。

罗副军长享寿四十九岁，但有三十二年是为革命而斗争。他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役，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十年苏维埃运动和八年抗日战争四次革命运动。他是一个农民子弟，十六岁时入伍当兵。三十年来，罗副军长一直保持农民和士兵的革命群众本色，他从没有忘本。他并不因为当了军官便带着兵掉转枪口去反对农民。相反地，当北伐末期国民党实行清党反共大举向工农红军围剿时，他便从起义中转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反革命。罗炳辉同志是一个士兵出身的革命将军，又曾是一个国民党军队起义的革命将军。从组织起义之日起，罗炳辉同志便由一个民主老战士进而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创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并且在抗战期间，有力的培养了新四军，开辟华中解放区。罗炳辉同志的名字，已为爱好和平的中外人士所传颂。因此，罗副军长的病故，是我党一个重大损失。

近数年来，由于敌后战争的极端艰苦与困难，致使罗副军长转战贫困，影响健康，乃身患血压过高的恶症。党曾数次通知他休养，但他恳切的拒绝了，因为他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高度责任心，超过他对于自己的爱护，使病日益转剧。最近经过再三劝告他才勉强的愿意休养。可是当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三大协定，再度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犯时，爱人民重于爱自己的罗炳辉将军不得不亲自出马，奔走于自卫战争的最前线。在他抵达鲁南后不



久，枣庄伪军在他英勇的指挥下被消灭了，枣庄数万矿工及附近数万难民得以重见天日，伸雪冤苦。可是，当此军务繁忙、夏日炎炎之际，罗炳辉同志不幸旧病复发，并在十六日突患急性胃炎，不得不于二十一日由前方返回临沂休息，在汽车驶到兰陵时，又突患脑充血，昏倒达数小时，虽经多方急救，终于下午五时与他的亲密战友永别了！

同志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对于他的先锋战士、革命领袖的死去，是比失去任何亲人都要哀痛而难受。但是，罗炳辉同志的亲密战友们应该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向我们狞笑，正在计划消灭我们。反动派他们要中国人民撤回一切民主要求，承认法西斯封建独裁，他要中国人民服从他的反动命令，放下武器以便让他消灭。因此，我们应进入自卫的准备，千万不能让法西斯反动派得手。因此，我们今天不是流泪，而是揩干我们的眼泪；不是难受，而是勇敢的坚定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去继承死者未竟事业。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万分艰苦的，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冲上去；二批倒下了，我们第三批又冲上去，以头颅热血换取人民的自由和保护民族的独立。最后胜利之券，是操在我们人民手掌中的。只有这样，才是纪念先烈的最好办法，也只有这样，革命的先烈才喜欢我们来纪念他。

罗炳辉同志在六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动身回临沂的那几天，都再三再四的和我谈滇军的革命光荣传统。他为潘朔端师长在南满的起义欢呼。他亲手拟具贺电，并分函他所有的云南故交。罗炳辉出身于滇军，在滇军中受到革命民主的教育，一生最关心云南人民及其军队。罗炳辉同志代表滇军的革命光荣传统，他致贺潘师长的电文是他对滇军将士的热望和他留给故乡军民的遗嘱。我们应该负责将他的遗志之一加以传述的。

最后，我们说：罗炳辉同志，你好好的安息吧！我们今天在你墓前宣誓，在你遗像前许愿：值此内战威胁极端严重之际，我们誓以胜利地保卫民主和平来纪念你！

同志们，全中国的和平进行了数月的谈判，现在证明我们人民的和平不能由反动派恩赐，反动派也绝无诚意放下他对中国人民的鞭子。我们不能向人乞求和平，恩赐和平。我们只好准备自卫，反动派敢于进攻我们，一定将他击退！让我们取得和平民主的最后胜利时，再为罗副军长举行隆重的追悼。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瞻容思功”亭



# 征战沂蒙—— 开国上将傅秋涛

初学者好吧

傅秋涛（1907—1981），190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南平江县南乡程家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任湘鄂赣省总工会委员长，同年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副书记。1934年11月任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1937年5月任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后，任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司令员。1938年1月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任新四军皖南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山东，同年冬起，任中共鲁南区委员会书记、鲁南军区政委。1948年鲁中、鲁南、滨海区合并为鲁中南区，任中共鲁中南区委员会副书记、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同年8月起，任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委员、支前司令部司令员，1949年任华东运输司令部司令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山东军区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0年冬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1955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左起：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在新四军云岭总部

1945年8月25日，傅秋涛和陈毅等一行离开延安前往山东。10月20日，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的部队；傅秋涛被任命为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治委员。

傅秋涛到鲁南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接受从徐州到兖州一线日伪军的投降，保护工农利益，扩大解放区。傅秋涛指挥鲁南军区所属部队，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及山东军区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率领部队赶在国民党军到达该地区之前，一个一个地拔除日伪军据点，扫清残敌，先后解放了鲁南地区的滕县、胶县、曲阜等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鲁南解放区。

1946年1月，在鲁南区开展了反奸、诉苦和生产自救运动，带领鲁南区人民群众克服因敌人长期掠夺和遭遇严重自然灾害，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度日的艰难困境。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全面内战，山东是国民党军的主要进攻目标之一。面对气势汹汹的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傅秋涛立即在鲁南区进行战斗动员，他代表鲁南区党委发出号召，要求全区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积极贡献，要求部队全体指战员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为人民立功。9月3日至16日，傅秋涛主持召开了鲁南区各人民武装部部长会议。在会上，他明确指出人武部会后的任务是积极支援前线，开展爆炸游击运动，巩固民兵组织。10月1日，他又主持召开了鲁南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动员民工、民兵为前线服务，搞好交通运输，进行战时各地物资的调剂。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总部为策应北线争夺胶济铁路线和南线出击淮北、苏中，同时也为打通台（儿庄）枣（庄）铁路线，调遣了第三十三军、整编第五十一、第二十六师及第一机械化快速纵队，向鲁南解放区发起进攻。

10月19日，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发出命令，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为司令员，鲁南军区政治委员傅秋涛为政治委员，成立鲁南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第一纵队和鲁南军区部队，在山东峄县以东地区组织防御。10月27日，国民党军开始全线进攻。叶飞、傅秋涛指挥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展开防御。在敌进攻正面，鲁南前线指挥部组织4个营的兵力，实施机动防御，避敌锋芒，达到疲惫消耗敌人的目的，后再集中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和鲁南军区主力共11个团的兵力对敌实施反击，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敌人连续进攻3天，只前进了7公里，且部队之间的距离也随之拉大。其先头部队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已处于突出、孤立态势。鲁南前线指挥部立即抓住这一歼敌良机，命令部队改变战斗部署，向冒进的敌第七十七师实施全面反击，收复被敌占领的我军阵地。在叶飞、傅秋涛的指挥下，我军乘敌立足未稳，分多路发起攻击，连连收复失守阵地，歼灭国民党军2500余人。激战至30日晚，敌军进攻受挫，被迫退至台儿庄、枣庄一线。

1946年12月初，蒋介石为在山东与新四军决战，命令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25个半旅及1个快速纵队共28个旅的兵力，分4路同时向苏北、鲁南解放区发起进攻。12月15日至19日，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发起宿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及3个半旅，共2.1万余人。在宿北战役中，傅秋涛除指挥鲁南军区部队牵制进攻鲁南解放区之敌，动员组织了鲁南区群众，积极开展战斗支前运动，为山东野战军取得宿北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人力、物力支援。

## 二

宿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命令进犯鲁南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军第七十七师，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师、第二十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等各攻击兵团，在占领陇海路南地区后，将新四军压到陇海路北的山东鲁南地区，并全力“追剿”，会攻临沂，企图与新四军决战。陈毅、粟裕等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在鲁南峄（县）枣（庄）地区，集中山东、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约27个团的兵力，组成左右两个突击纵队发起鲁南战役，歼灭气焰嚣张的、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鲁南军区政治委员傅秋涛、副司令员郭化若和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向明，共同指挥由鲁南军区和鲁中军区部队组成的右纵队，负责切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与整编第五十一师之间的联系，并歼灭位于石头崮、太子堂地区的整编第二十六师第四十四旅。在部署战役作战计划时，傅秋涛根据陈毅、粟裕指示，命令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武装，在码头至新村段沿沂河南岸进行防御，保障主力部队的翼侧安全，维护山东与华中之间的交通，并要求第三军分区派部分干部组织一些精干民兵到兰陵、邳县及兰陵、峄县、台儿庄间进行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监视该地区间敌军动向。

1947年1月2日，山东、华东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鲁南战役。参战的左右两个强大的突击纵队分别从西北、东南两个方向实施对进夹击，会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傅秋涛等指挥右纵队，首先切断了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与整编第五十一师的联系，歼灭了位于石头崮、太子堂地区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部和第四十四旅大部，并和左纵队一起，将国民党军第一快速纵队包围在贾头、陈家桥、作字沟等狭小地带。

在鲁南战役中，傅秋涛指挥鲁南军区第十师第三十团夺占了位于峯县东部、敌人重兵防守的坚固堡垒——平山。同时，傅秋涛还和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共同指挥鲁中军区第九师和第四师第十团，攻克了敌重兵把守的重镇太子堂，扫清了鲁南战役中右突击纵队前进路上的一大障碍。

战至1月4日上午，国民党军第一快速纵队以第八十旅为先头，开始弃阵向峯县方向突围。陈毅立即命令左右两个纵队全线出击，把敌人逼上绝路，予以彻底歼灭。敌第一快速纵队在突围中，犹如惊弓之鸟，争相逃命，结果敌军坦克、重炮、车辆全部陷入泥潭，动弹不得。傅秋涛指挥部队，用炸药包、集束手榴弹，甚至铁锹、洋镐搏斗坦克群。战斗至下午3时，除有7辆坦克侥幸逃至峯县外，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国军精华”的第一机械化快速纵队就这样被我军彻底消灭了。

鲁南战役期间，鲁南军区政治委员傅秋涛和鲁南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还根据陈毅指示，组织动员了鲁南区数十万民兵、民工、千余辆大小车、数千副担架支援前线，为作战部队转运伤员、运送粮食、弹药等，有力地保障了一线部队的作战，为鲁南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

### 三

1月28日，傅秋涛主持召开鲁南区地、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传达了鲁南区党委关于支前工作的决定，指出目前头等中心任务是支持前线，保证部队供给，以争取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对鲁南的进攻。2月1日，鲁南区鲁南支前司令部正式成立，由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任支前司令部司令。鲁南区各地、县与区党委均有三分之一的委员离开本职，加入支前司令部工作。

鲁南重镇兖州，长期为国民党军吴化文部所盘踞。鲁南军区部队屡攻不克。傅秋涛等经反复研究后，决定对吴采用攻心战术。同年11月初，蒋介石命令吴化文率部从徐州开往兖州，在北上途中，解放军伏击“吃掉”了其中的1个军，俘军长、参谋主任等以下官兵几百人。傅秋涛等军区首长对被俘军长、参谋主任等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在此基础上，傅秋涛派鲁南军区联络部长胡成放去兖州，通过释放回去的参谋主任和吴化文进行谈判，并达成了两项协议。一是和吴化文建立秘密的联系；二是吴化文答应了保证不抢粮、不欺压老百姓。傅秋涛及鲁南部队也作出了相应让步，一是撤兖州之围；二是在城外划出一定的区域给吴化文。由于和吴化文建立了关系，鲁南军区在兖州只留下少数部队，其余的都抽出来作机动力量。后来在济南战役时，吴化文率所部两万余人宣布战场起义，加速了济南战役的胜利。

1947年3月起，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攻势受到严重挫折后，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向对陕北、山东两个战场实施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为避敌锋芒，采取主力分向敌人两翼，运用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充分调动敌人，在运动中积极寻找战机，消灭敌有生力量。在鲁南区，中共党政机关大部分已随主力部队转移，傅秋涛等组成鲁南区前方指挥部，统一指挥留下的第十八、第十九两个团及各县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他们采取昼伏夜行、“下跳棋式”的战术，同10倍于己的敌人迂回周旋，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军35个团的兵力于鲁南地区，先后击溃了国民党军冯治安部第七十七师、第五十九师的进犯，相继收复了枣庄和郭里集等地，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行动。

1947年6月，傅秋涛主持召开了中共鲁南区党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如何继续坚持斗争，会议作出了采用适合于群众的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打击敌人；军事斗争结合政治攻势，打击歼灭蒋介石国民党军及伪政权等7项决定。傅秋涛代表鲁南区党委号召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对敌，以独立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在进行济南战役作战部署时，傅秋涛在山东曲阜召开了鲁中南各地委书记、专员和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联席会议，部署动员群众，筹备物资、支援我军攻取济南的具体工作。9月12日，傅秋涛任山东省人民政府鲁中南支前委员会、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前方办事处主任。他按照中共华东局的部署，领导鲁中南区党政机关开展大规模的支前动员和后勤筹备工作。在战役开始时，他已动员了鲁中南50万民兵参加战斗，动员了数以万计的担架、挑子、大小车辆和牲口，筹措了亿万斤粮食等支援前线，有力保障了济南战役作战的需要。

傅秋涛经过组织领导鲁南、兖州、济南等大战役的支前实践，摸索总结出支援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的支前经验，健全了各级支前组织。他在民工的动员体制上，根据民工性质、任务不同，分编为随军常备、二线转运和后方临时等3种民工组织；在民工队的组织管理上，按照军事编制配备一定比例的干部、党员、积极分子，集合后进行普遍轮训和教育；他还以民工连队为单位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选拔干部；在执行任务中倡导开展立功运动，民爱民运动等；在运送粮食、弹药、转运伤员时，实行接力运输，减少了人力的浪费，并在运输线上设立民工站，保证民工的食宿、医疗；在政策上，注意支前与生产结合，实行合理负担，工具顶工，统一调拨等。在支前的合理负担方面，傅秋涛在鲁中南地区总结出对生产互助中的欠工，采取“找”、“补”的办法。即少出工的对多出工的要按定额补还，对支前出工少的和生产互助不够的采取“赶”的办法，努力赶上去，这样群众感到合理，比较满意。

#### 四

济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中原大地谋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战略决战，即淮海战役。

10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鲁中南区党委，统一领导鲁中、鲁南的各项工工作，傅秋涛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兼鲁中南军区司令员，主要负责鲁中南区在淮海战役中的支前工作。11月4日，成立了统一的最高支前领导机关——华东支前委员会，傅秋涛被任命为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担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司令员，担负起统一调拨华东地区的民力和粮食。傅秋涛先后以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华东支前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指示信，强调各级党委对支前民兵、民工及干部要进行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并在大规模的支前运动中培养大批干部与积极分子，有计划地发展党员。他还要求在半年内提拔两万各以上区、村干部，同时，他组织制定和颁布了《关于民站工作的决定》、《关于民工政治工作的指示》以及《关于颁发各类民工编制表的通知》等一系列支前文件。傅秋涛在领导支前工作中，提倡实行耕战互助、合理负担、有偿派差等政策措施，积极有效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支前积极性。

淮海战役支前工作计划下达后，傅秋涛在鲁中南区抽调300多名干部到华东支前委员会工作，负责带领民工随军服务，同时，另安排300多名干部待机候命，随时调用。战役发起前，傅秋涛领导华东支前委员会积极动员鲁中南区广大妇女为参战部队缝制棉衣、棉被和鞋袜。

为保证战时运输畅通，使后方粮食、弹药等部队所需的军需物资及时运送到前线。从10月20日起，傅秋涛等领导的中共鲁中南区党委先后动员了数万群众，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在陇海路以北的大片新解放区内，修通了临沂到滋阳、台儿庄、潍县等长达650余公里的31条公路和近50余公里的大路，开辟辅路转道99处，修建桥梁380座，使鲁中南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全部畅通无阻。



为保证战时的通讯联络通畅，傅秋涛领导华东支前委员会组织动员了3600余名民工，协助野战军电话分队分别架设了临沂至沂水，临沂至十字路，临沂至郯城，临沂至兰陵、再至邳县通运河站、峰县、滕县，然后再从兰陵通往台儿庄、贾汪、徐州等地的5条长途电话线，全长近450公里。

在淮海战役期间，山东共出动民工218万余人，而傅秋涛领导的华东支前委员会在鲁中南地区就组织调用了随军常备和二线转运民工34万余人，临时民工140余万人，共计174万余人。

动员群众参军，补充前方部队兵员，是华东支前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傅秋涛专门召开中共鲁中南区党委建军补兵会议。当时，鲁中南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纷纷响应党的号召，把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心愿变成“胜利人人有份，参军人人有责”的自觉行动，全区到处呈现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感人情景。1948年10月，鲁中南区即完成征兵1.7万余名，11月份，又动员群众完成了8000余名参军任务。12月，傅秋涛从鲁中南军区抽调地方武装组成4个团，日夜兼程开赴淮海战役前线，及时补充一线战斗部队，保证了参战部队战斗力不减。继续动员鲁中南区1.1万余名群众参了军，及时补充到了淮海战役战场上华东野战军的一线主力部队中。在中共华东局的领导下，傅秋涛及华东支前委员会还组织动员了山东2.2万多名武装民兵，组成了17个子弟兵团，随华东野战军参战，一直打到福建。

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作战通令中特别指出：“这次战役所感困难者，唯有粮食问题。”在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每天需要供应粮食约300万斤。为保证对参战部队的粮食供应，傅秋涛领导华东支前委员会建立了严密的粮食运输体系，做到部队打到哪里，华东支前委员会就把粮站和粮库建到哪里，确保对部队粮食供应的不间断。傅秋涛和华东支前委员会先后动员了几十万民工，以小推车为主，及时地从华中地区向淮海战役战场运送粮食2.3亿斤。山东方面，仅从鲁中南运第一线粮食到粮站直接供应部队有1亿斤，第二线粮食运到兖州、济宁有6300万斤。同时筹集食油70万斤、盐72万斤。当解放军在歼灭了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后，部队很快就向徐州东南挺进，把几千辆小车的粮食远远的抛在了后面。傅秋涛及时地调整了山东、华中的运粮系统及粮站的位置，动员民工采取更换交替的办法，顶风冒雪，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短的时间保证了战斗部队的粮食供应。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次日，即成立徐州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傅秋涛又兼任徐州军管会主任。傅秋涛受命后，立即着手成立徐州军管会领导班子，及时领导徐州军管会，加紧进行对徐州的接管工作，组织力量抢修以徐州为中心、东西南北周围长达800余公里的铁路线。12月7日上午，傅秋涛就组织了部分铁路员工从徐州出发，开始抢修茅村铁路桥。陈毅亲自打电话命令徐州军管会务必在5天内完成任务。傅秋涛立即召集徐州军管会人员开紧急会议，研究布置茅村铁路桥的抢修任务，他命令鲁中南军区参谋处长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抢修工作；同时，又让军管会的其他同志给鲁中南区的几个地委分派任务，要求他们设法动员群众把过去破坏铁路时保存的枕木、铁轨收集起来，尽快送到茅村。

12月9日，在徐州又成立了陇海、津浦铁路临时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条铁路线的抢修工作。在傅秋涛等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短短12天的突击，至12月15日，800余公里的铁路全部修竣通车。陇海、津浦铁路线的畅通，对华东野战军快速追歼逃敌，以及为作战部队及时提供军需保障和解放区之间进行物资交流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为了统筹安排、合理调度对淮海战役中参战部队的粮食供应，12月26日至29日，傅秋涛和刘瑞龙在徐州主持召开了由山东、华中、冀鲁豫、豫皖苏等战区和部队各后勤单位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经会议协商，确定由华中负责淮海战场东南面各部队的粮食供应，山东负责战场东北面各部队粮食供应，豫皖苏负责战场西南面各部队粮食供应。会议还研究决定，在淮海战役中，对所有参战部队的粮食供应以及由华北局从冀鲁豫地区紧急征调来的粮食（小



1959年10月1日  
傅秋涛（左）、  
江渭清（中）、  
陈士榘（右）在  
天安门城楼上

米1亿斤），均由傅秋涛及其领导下的华东支前委员会统一调度。

1948年12月17日，中央军委电令中共华东局、中原局，要求在1949年春节期间，做好对华东、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一线部队的新年慰劳工作，一律慰劳每人猪肉1斤、香烟5包。华东局把慰劳华东野战军各部队而要征调猪肉的任务交给了傅秋涛，要求傅秋涛和华东支前委员会务必在春节前，分两批送到淮海前线各部队中。傅秋涛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务后，迅速将征调猪肉的任务下达到他所领导的山东鲁中南区。仅此一项，就需筹集、运送猪肉80余万斤。当完成第一批40多万斤猪肉的征调及运送任务时，已是1月中旬，春节是1月29日，当地群众已经准备过年，再征调猪肉40万斤，任务相当紧迫。为了完成好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重任，傅秋涛带领鲁中南区各级领导，亲临一线，发动群众，想尽一切办法，或从群众手中直接征购，或到集市上收购，或用麦子等粮食换猪肉等等。

从1月21日到28日前后共用了8天时间，第二批40多万斤猪肉，全部送到淮海战场华东野战军一线部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大批猪肉运到前方，引起了刚刚获得解放的新区人民的强烈反响。新城镇（今新沂）车站站长深有感慨地说：“我在车站工作20多年，从未见过专门运送这么多的猪肉给战士们吃。”在1949年新春来临之际，淮海前线我军指战员都吃上了香喷喷的肉包子。

1949年1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中，华东支前委员会在傅秋涛的领导下，共动员了200余万民工和民兵支前参战，为淮海战役筹措、运送粮食近10亿斤和油、盐、肉等数百万斤，筹措鞋、袜等数百万双，还为部队运送弹药等军需物资不计其数。而这些粮食、弹药绝大多数又都是傅秋涛等动员组织华东数百万支前民工，推着小车，冒着严寒，不远千里从山东各地一路跟随作战部队运送到火线上的。为此，1949年2月，在徐州召开的华野前委扩大会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高度赞扬了人民支前的伟大作用，指出：“淮海战役是怎么胜利的，是人民群众用小车子推出来的。”

# 王凤瑞起义经过

庞广兴

王凤瑞，临沂县人。1942年任伪“山东省剿共第二警备队”第13中队长，驻汤头镇，受当地日本侵略军石川部队统辖。

王凤瑞身居沦陷地，心在解放区，不甘心为敌伪卖命，不忍心与亲人肉搏。他在侵略军的铁蹄下，夜不能寐，深以为必须做出报国事迹才合做人之道。每夜查岗回来，在室内踱来踱去，一连10余夜。传令兵吴家功（这个名字不一定记得准确），略知其意，遂以言挑之：

“队长有啥心事吗？但有用我之处，刀山火海不辞。”王未敢实言，暗中加以考察，知吴确有爱国之心。过几天他又问吴说：“你能冒险替我送信吗？”吴说：“刀山火海不辞，我敢对天盟誓。”王说：“不用盟誓，盟誓是迷信，你有热血就行。”遂连夜写信给八路军首长，决心起义投诚。

王凤瑞把毛头纸剪成2寸方4块，取两块各折1/2，上下对好，在半边用干净水蘸白矾水写道：“有人心的人，决不愿祖国沦亡，决不愿做人奴隶。我定于后天夜间，率本中队全体武装起义，向贵军投诚。如当夜不便，顺延一周；再不便，再延一周。希接应掩护。切切！”



燃烧着的鬼子据点



王凤瑞即日。”写好后，嘱咐吴家功，谨慎小心，随机应变，把信送到。

吴家功晨起，带着有字和无字的四块纸前往。他走到中途，见有特务骑自行车追来，自觉不妙，便蹲在道旁拉屎，用写字的两块纸，在没字的半边揩屁股，再沾上些黄澄澄的大便，把没写字的两块纸一起都扔在屎堆旁边。走了几十步，特务追上了，问他：“干啥去？”他说：“我母亲病重了，捎来口信，说想我。”特务把他全身搜查，帽里儿、衣服贴边都拆开了，啥也没有，便把他放走了。特务到屎堆旁边看看，把两块干净的纸拾起来拿走了。

吴家功见特务去远，从麦地里爬回来，把带屎的两块纸拾起来，用麦叶擦去粪便，揣在衣袋里爬回去走了。到了十字路镇，见了八路军首长，说明来意，取水湮湿两块纸，现出字来，交上投诚信，并述说途中经过。首长热情招待后，传给照办口信，他便匆匆往回赶。

特务先回汤头镇，见了日军石川，说吴家功奉王凤瑞派遣与八路军联络。石川问：有没有证据？特务说身上搜了没发现，将吴丢在地上的两块纸取来，用水湿了会有字。石川哼了一声，将纸放在桌子上了。特务又说，王私通八路，应该处死。晚上，吴家功回到汤头镇，便和王凤瑞一起被捕，打入牢房，经过刑讯并无口供。

王凤瑞的近人连夜奔往临沂，次日天亮进城，到“剿共第二警备队”总部，向少将总队长王九思报告了王凤瑞和吴家功被捕的情况。王总队长派上校参谋长张文清和副官处员庞广兴并传令兵刘子良同去汤头镇解救王凤瑞。途中，趁传令兵不在身边，参谋长对副官处员说：“王凤瑞究竟如何，我们不摸底，怎么办呢？”副官处员说：“是不摸底，但是我们的宗旨就是中国人维持中国人吧！”参谋长点头，诺诺地说：“对，就是如此。”当晚，3人到达汤头镇，参谋长带领副官处员同见石川，副官处员会日语，给参谋长作翻译，石川答复明天审问王凤瑞后再行决定。

次日，石川带卫兵2名，特务1名，约会参谋长和副官处员6人同进牢房，审问王、吴2人。石川隔着栅栏问王凤瑞：“你为什么去和八路军联络？”王凤瑞说：“没有联络。”石川说：“明明是你叫吴去干的嘛！”王说：“他回家看他妈妈去咧，与我无关。”石川把吴家功从栅栏里放出来，绑在板凳上灌凉水，叫他承认是王派他去通信的。刚灌了一碗，参谋长说：“如此办法，他一定假承认，问不出真情来。”副官处员翻译完后，石川便命令停止灌水，然后叫卫兵取来桌上的两块纸，当面湮湿，啥字也没有。他问特务：“你说有字，怎么啥字也没有？”特务又推说两块沾了大便的纸上有字但没拿回来，石川说特务“撒谎”，把特务骂了一顿。参谋长说：“既然没有证据，据我们看来，王凤瑞决不能做坏事，我们要求释放出来，叫他照常担任职务。”副官处员见有离间特务的机会，把参谋长的原说翻译完后，紧加一句“撒谎的人，是危险人物，信他能坏事。”石川哼了一声，点点头，叫参谋长写保证书。参谋长写道：“今保得第十三中队长王凤瑞，因该人有私通八路嫌疑一案，查无实据，我们情愿担保释放，所具保条是实。具保人剿共第二警备队总部上校参谋长张文清（印）。上尉副官处员庞广兴（印），1942年4月30日。”石川当场打开栅栏，放出王凤瑞，并把吴家功从板凳上解下来，二人谢了石川和参谋长、副官处员3人，参谋长等3人当日返回临沂。

当晚，王凤瑞小心谨慎地查岗放哨，未敢擅动。八路军首长知道吴家功被盘查情况，估计今夜王中队不能去，但为了防备万一，仍然到半途险要处来接应，直到拂晓方才回去。王凤瑞如坐针毡地挨至下周，自忖道：“如果万一官兵不服，耽误大事，切记为政以信，兵不厌诈。”黄昏后，他便召集班长以上干部开会，说道：“以前我们净打被动仗了，总是在碉堡里挨打，我想争取主动，你们有啥好法儿？”第一班长说：“我们也出去打他们去。”王说：“对，但是不要急，我们必须锻炼锻炼，今天我想练习夜行军，你们看怎么样？”大家说：“好！”并争着说：“我班当尖兵，队长指向哪个方向，就向哪个方向走，有遭遇战也不怕。”王说：“好，哪班当尖兵，听我指挥，你们回去准备全副武装，背包全带着，不



反正的伪军

吹笛、不吹号，10分钟后集合，大家散去。”10分钟后，集合好了。王凤瑞派定尖兵，叫吴家功参加尖兵班作向导，相机传令，自己断后，传令出发。八路军首长按约定率兵来迎，两军相遇。王部尖兵班长要开枪，吴家功说：“慢着，我是传令兵，我传队长命令，向前进！”两军各按左侧相向前进，王中队官兵有懵懂的，但也得随着走。八路军官兵全知道，到后队与王中队长相见，各问安好。八路军作为后队掩护，王凤瑞平安到达十字路，受到欢迎，加入山东纵队，被任命为特务营长。

翌晨，石川发现王中队全队踪影全无，勃然大怒，抓耳挠腮，顿足捶胸，准备派人去捕张文清和副官处员两人，追究担保责任并担保意图，正在紧急关头，沂蒙告急，上级有令，把石川调往蒙阴去了。11月中旬，石川复回汤头镇。消息传来当日慌了保人，张文清辞职奔河北，副官处员请假回关东。二人分手时，张文清对副官处员赋诗一首：“只缘避祸各潜踪，预卜他年难相逢。凤瑞已入光明路，尔我犹向泗辙行。是非功罪凭人议，名利荣辱唯自清。临别赠言无写处，愿君盛世再刊登！”



# 踏遍青山人未老

——记老党员王任之

王 滨

## 少年时代壮怀入党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年仅15岁的王任之（原名王小康、字福三）在家乡高小求学时，经中共临郯县委刘谐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又协助刘谐和发展了薛汉鼎、李伴农、夏林、高立明、杨家祥等人入党。经中共临郯县委批准，1932年12月17日建立了中共板泉支部，王任之为该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

1933年春，鲁南苍山暴动前夕，中共临郯县委两次派交通员向板泉支部送去《告鲁南同胞书》、“打倒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传单，在板泉一带秘密张贴，对配合当时的苍山暴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苍山暴动失败后，临郯



左四为王任之同志



县委遭到严重破坏，板泉支部与上级党委失去了联系，但支部在王任之的领导下，仍坚持活动。王任之曾在板泉完小集资组织读书会；在临沂五中、济南市立高中组织学生罢课请愿，开展抗日募捐活动，发展党员，至1937年6月底，该支部共发展了33名党员。

### 抗战爆发，奔赴延安

1936年秋，王任之考入济南市立中学高中部就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王任之到临沂中学借读。此时日寇举兵南下，在逼近德州时，济南各学校和临沂五中、临沂三乡师、临沂师范讲习所等校均已相继停课。1935年秋，板泉支部交通员薛汉鼎考入临沂三乡师，与王涛（他是1930年入党）是同班同学。经薛汉鼎介绍，王任之与王涛一见如故，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密切合作，利用临沂各学校停课的机会，开展抗日宣传。他们共同策划成立了“抗日救亡后援会”，积极募捐支援当地的抗日武装部队，为抗战救亡任务尽了应尽之力。

不久，王涛听说延安抗大有招生的消息，这让王任之惊喜万分，在与上级党委失去联系5年之后，终于又见到了黎明的曙光。王任之、王涛、薛汉鼎等人积极地秘密与“临沂三校”（三乡师、五中、师范讲习所）的进步同学联系，为奔赴延安去抗大学习做了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

1937年10月，王任之回板泉主持召开了板泉党支部骨干分子会议，决定由王任之、薛汉鼎、高立明、夏林、杨家祥等5人先奔赴延安去抗大学习。由李伴农接任板泉支部书记，继续坚持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虽然大家去延安的决心下了，但是路途遥远食宿怎么解决？正在这时，山东省教育厅通知“临沂三校”南迁许昌，让三校师生到砀山火车站集合，并给每位学生每月发6元伙食费。5名奔赴延安的贫寒学生当即决定借水行舟，暂且随三校迁移，毕竟每向前走一段，离到延安的路程就近了一段。

1937年11月，王任之等人从临沂出发，扒上由临沂南去的军车（张学良下属东北军驻临沂国民党五十七军军车），先到了徐州，后又扒上西去的火车到达砀山。最后他们在砀山分手，决定由高立明、杨家祥先乘去西安的火车到前方探路，打听延安抗大是否有接收青年学生的消息。1937年底，王任之、薛汉鼎、夏林随校乘火车至郑州，后转车到达许昌。

从1938年1月初至1938年8月24日，王任之一行在途中几经周折，冲破土匪横行、国民党军队盘查等重重险阻，从许昌随新组建的山东省联合中学转移到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的重要城市——郾阳。此时，与王任之一起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一路上已扩展到了20多人。又经过六七天的徒步行程，他们路经荆紫关进入陕南商洛地区，途经西坪、商南等地。每到一地（他们大都住宿在学校或庙宇），他们就向当地民众歌唱抗日歌曲、演出街头剧、张挂抗日标语和漫画，积极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路上他们主要以演戏作为解决食宿的来源。

1938年8月2日，他们由商南行至武关镇，刚在一家店铺住下，就突遭一国民党军连长带着几个兵来查店。面对该连长的盘问，他们谎称自己是到西安报考国民党中央军校的。但该连长仍坚持检查他们的背包，遂发现了背包里的《列宁选集》和《毛泽东传》等书籍。该连长立刻说：“你们分明是去延安的……老老实实在这里等着听候处理。”当时所有人听后确实都着了慌。

该连长走后，大家探知该国民党部队的军长叫萧之楚，是菏泽人，其下属军官也多是菏泽人。王任之便与同行的韦统泰（菏泽人）等人去找一位国民党营副接洽。该营副是菏泽定陶人，而他们当中也有来自定陶的。稍作深谈，互相竟还扯上了远亲关系。王任之等人诉说了背井离乡、颠簸流离之苦，并表达了投笔从戎之志。该营副听了很同情他们，不但把没收的书籍退还给他们，还主动替他们支付了店钱和饭钱，并介绍了武关一带的实际情况。

据该国民党营副介绍，原来武关至龙驹寨是个匪区，土匪们居住在高山深洞里，让国民党军对他们无可奈何，为了维护交通，只好与其和平共处。该营副还派了一名副官为王任之一行人引路——这真是“峰回路转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龙驹寨到商州的路上，他们遇到驻商州的一个国民党军师部，靠着机智和勇敢，他们闯过了匪区并化解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刁难，最后胜利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当时韦统泰等人被分配去了抗大，王任之等大部分人则被分配去了陕北公学。

1938年8月24日这天风和日丽，王任之与他的革命伙伴们第一次来到陕甘宁边区。他们高兴地看到满坡的老百姓一边生产劳动，一边高唱抗日歌曲；在边区的田野里，心情舒畅而兴奋的王任之一行就像没娘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地高兴，他们满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来到了陕北公学（分校驻地看花宫）报到。王任之老人后来动情地回忆说，当时受到陕北公学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时，他激动的心情实难以言表。每当回忆起当初第一次踏上边区的喜悦心情，令他难忘。

王任之到达延安陕北公学后，除努力学习外，对艰苦的工作总是冲在前边。1939年1月他们从桐邑陕北公学分校出发，行军至延长县，与抗大第五、第六大队合并，成立了抗大第一分校。他们渡黄河，过临汾（穿过同浦铁路敌人封锁线），越绵山，最后到达晋东南屯留县境，在这里举行了抗大一分校的开学典礼。不久，他被选调去干部训练大队区队长训练班学习。毕业后被留校工作，任抗大三十队区队长。

### 回到山东抗日根据地

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发展很快，王任之天天想着“打回山东老家去”。他曾找到副校长周纯全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周纯全回答说：“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你的愿望。”1939年11月，抗大一分校果然奉命带领干部挺进山东。王任之随校翻越太行山，穿过平汉封锁线，经冀中抗日根据地，再过津浦封锁线，最终于1939年12月抵达沂蒙抗日根据地的腹地沂南县孙祖东高庄村。不久，他被分配到抗大民运工作团，在界湖以南白石埠一带从事民运工作。

1940年下半年，莒南县板泉一带已经解放，王任之随抗大一分校进驻板泉，任抗大民运工作团二队队长。他们首先在渊子崖村驻了一个工作组，同时在三义口村办了三期抗日救亡青训班，培养了300多名青年抗日积极分子，发展党员100多人。他们还在渊子崖村建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十几名。这就为1941年12月20日爆发的全国闻名的渊子崖保卫战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1940年10月，王任之同志在原板泉完小校址主持召开了近百人的各界士绅名流座谈会，当时抗大文工团团长袁成隆还在会上做了抗日救亡工作的动员报告，发动民众起来努力抗日救国。这时，王培良（时任沭水县参议员和板泉区抗日民主政府优救会主任）自愿拿出了保卫家宅的三支长枪和两把短枪，并支持儿子王言时、王言畅两兄弟带枪支入伍参战。这就是当时被传为佳话的“五支枪干革命”的故事。

1941年春，王任之奉命去莒南县的大店开辟工作，发动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并通过办训练班，发展了党员300多名。

### 投入“双减”农民运动

1942年春，刘少奇同志来山东视察指导工作，提出了要大规模地开展“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的运动。王任之再次奉命带领抗大民运团的同志、抗大一分校部分政治教员和山东分局调研室的部分同志，在莒南县大店区发动群众，摧垮了大地主庄英甫为首的封建堡

垒。1942年至1943年，为巩固“双减”胜利成果，他被留在大店任区委书记。他与区长姜斌同志（抗大干部）密切配合，在“双减”的基础上动员群众参军，成立了沐东大队，下辖三个连共300余名武装人员。在与日、伪、顽进行的殊死斗争中，抗大干部张献廷、高芸升同志壮烈牺牲。当时，在沐河东岸的辽阔平原和丘陵地区，村村都建立了党组织和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及识字班、儿童团等抗日团体，筑起了群众基础雄厚的“钢铁长城”。

1944年3月，莒南县委组成以县委群工书记袁成隆（原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团长）为团长的工作团进驻大店，开展“查减”运动。“查减”主要是检查地主是否实行了“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的法令，凡未实行者一律按法令补交给农民群众。大店是鲁东南最大的封建堡垒，号称72堂号。当时大店地主拥有土地5万亩，横跨苏鲁两省七县，共有佃户村70多个。工作团通过深入社会调查，组织发动群众，运用典型实例，针对群众中普遍存在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和迷信观点，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按照“查减”的政策法令，对地主实行区别对待，分化互解，对开明地主庄佐辰（时任滨海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等采取团结的政策，确定了重点打击对象。工作团于5月下旬，在大店镇北门外召开了两次万人斗争大会，大会由附近几个村庄农救会长组成主席团，大店区农救会长担任主席。主席台两侧挂着巨幅对联，上联是“想当年受尽地主压迫，多少佃户成了屈死鬼”，下联是“现如今有了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都是新主人”。会场周围有民兵持枪站岗。汉奸地主庄英甫、恶霸地主庄景楼低头站在台下，20多个有民愤和罪行的地主分立两旁。200多位急于上台控诉的苦主，站在人群的最前面；最后，他们终于把多少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沉冤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那次大店的“查减”工作涉及了3个县10个区的64个村庄，共有612户农民按照政策规定得到了退回的租息。11月，山东分局将工作团长袁成隆执笔写的《大店查减斗争总结》印发全省，它对推动滨海区和全省的“查减”运动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同时漫画家任迁乔同志，把大店开展的“查减”运动编成了连环画册《翻身》发行到山东各抗日根据地。

## 大青山突围战

1941年10月，日寇侵华总司令畑俊六，妄图在山东的沂蒙山区一带消灭我驻山东抗日部



胡耀邦来临沂时  
与王任之交谈



队的主力军，进而控制整个山东。他亲自坐镇鲁南临沂城督战，分11路从山东抗日根据地各个城市调集精锐部队五万多人，加上当地伪政府部队十几万人，欲与我山东主力部队决战。日寇采用“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和“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歼灭我主力部队、山东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和沂蒙抗日根据地的所有抗日群众组织。

当年11月，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一一五师、省级群众团体及抗大一分校等千余人正自南沂蒙向大青山转移。由于当时不明敌情，误入了敌人的“清剿包围圈”。30日晨，日军以一个混合旅的兵力，向当时转移到大青山的军民发起了疯狂而残酷的攻击。

由于陷入日军包围的大都是非战斗人员，配有武装的只有山东分局的一个警卫连和抗大一分校的一个军事大队，且武器数量很少，形势非常严峻。为掩护军民和党政机关的突围和安全转移，当时的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等领导同志临危不惧，沉着地指挥分局警卫连和抗大一分校的军事大队等抢占有利地形，誓死抗击敌人，战况异常惨烈，当这些战士们手中的弹药已经打光，他们甚至用枪托和石块与敌人进行拼死搏斗，终于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成功地掩护了众多的被围困人员，保存了山东大批宝贵的革命骨干力量，使他们得以安全地进入西蒙山一带，重新开始工作。

在大青山突围战中，仅抗大学员就牺牲了200多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山东省战工会副主席陈明，一一五师敌工部部长王立人，抗大二大队政委刘惠东，国际友人、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都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了。王任之是在11月29日傍晚带领5个抗大伤病员离开大青山转移到东蒙山的，因此幸免于难。王任之认为，在那次突围战中，广大军民表现出的团结一致，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最后取得战斗胜利的根本原因和保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命令抗大一分校转移到滨海地区办学。周纯全校长遂命令王任之带路，一夜急行军，率领抗大一分校的学员们渡过了沂、沭河，转移到了滨海地区。

1945年至1946年，王任之先后在藏马县工商局和山东省工商总局干部科工作。

1947年春，王任之奉命北渡黄河，来到渤海地区杨忠县任各教会主任，开展土改复查工作。

建国以后，他先后任惠济县、博兴县、广饶县县委书记，在这些县积极领导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56年冬调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

### 集中农民智慧，指导农业生产

1956年冬，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不久的王任之，很快就调到省委基点县历城县任县委书记。他曾抵制了当时的高估产、高征购等不良风潮，保证了全县100多万农业人口的吃饭问题，1958至1959年曾三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鼓励。

对于为什么自己能够二年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王任之深有体会地分析，这是由深远的历史原因和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建国后三年经济恢复期已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已经完成，农村已经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全国正处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国际上已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国家正处于集中人力、物力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再次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大树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各级党委都要层层设基点，派出得力干部下到基点任职。当时毛主席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每次离京大多先到山东济南停一下，因为历城东郊公社离济南很近，所以就成了他经常去的地方。

当时历城、莒南、广饶是省委直接掌握的三个基点县，历城距省委最近，省委第一书记

舒同还亲自到历城县东郊公社大辛庄大队当社员。基点县县委书记王任之和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一起当社员，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 “长虹”青未了

1974年，王任之被组织上调回老家，任临沂地委副书记、临沂行署专员。任职期间，他走遍了沂蒙山区的山山水水，亲眼看到沂蒙人民发扬社会主义新愚公精神，开山劈岭，建立起了许多大、中、小型水库，兴建农田水利，实行稻改，平原上出现了一片片稻田，生产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也看到仍有的一片片荒山秃岭，部分群众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一个发扬沂蒙精神，改造旧山河、建设新沂蒙的想法在王老的心中油然而生。沉甸甸的责任感促使这位沂蒙游子冥思苦想，终于制定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宏图 and 良策。

王任之多次组织农办、水利指挥部的同志到莒南县厉家寨、到长虹岭地段考察。“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毛泽东同志对厉家寨的批示，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心。1976年春，王任之同志在地委常委会上动情地说：“根据全国农业会议精神，毛主席关于对厉家寨的批示，震动了全国，我们为啥不能在我区搞一个厉家寨式的治山治水的样板呢？”他毅然提出了治理长虹岭的建议，并得到了地委领导班子的一致同意。

经过连续的五年治理，长虹岭的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变。过去的“和尚头”、“猪头脸”、“茅草荒”，都变成了田成方、渠成网、道成线、树成行的全新景观。粮食产量比治理前增长了42%，花生产量增长104%，农、林、牧、副、渔总收入增长了45%。对国家的贡献增大了，社员收入增多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改变了。群众高兴地说：“大干就能实现大变。”

### 绿色银行遍沂蒙

王任之在沂蒙山区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解决民用建房木材的来源，必须从发展杨树速生林入手求出路。这是他跑遍了全区山岭河滩，乡镇村庄，考察调研了植树造林后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

沂蒙山区属森林植被稀少地区，原有树木不多，解放前的战乱，特别是日寇的“三光政策”对林木的肆意焚烧，加上解放战争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砍伐，导致在建国初期的森林覆盖率仅占1.6%。建国后，植树造林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多是小穴状，“一锹松”、“一锹槐”的粗放式造林，生长周期很慢，采伐年限平均15—30年；河滩上的杨树都成了“老头树”。群众说：“过去栽杨插个条，树高一年长一寸，十年长成推磨棍。”根本无材可取。

调研中，王老从平邑县沂河国营林场发现了一种优良的杨树种，经过选苗、整穴、施肥、灌水等措施后，四至五年即可成材，这使他深受启发。1976年，王老首先在莒县于家店子村搞了50多亩地做试验点，获得了成功。通过这一事例，使他联想到临沂地区，到处都有大面积的河滩和荒坡地，要解决民用木材，应走自力更生的路，发动群众，利用废地，营造杨树速生丰产林。他下定决心在地委的领导下，一定把这件既顺民心又有条件办成的大事办好。

于家店子的试验成功后，王老又令莒县搞了万亩大片杨树丰产林。莒县万亩丰产林的试验成功后，有力地启发和鼓舞了地、县领导同志，他们通过参观学习，纷纷表示要大抓杨树速生丰产林。在这期间，还是莒县带头领先，时任县委书记刘兴武、副书记郑承太等同志，亲自参加勘察规划宜林地带，研究营造措施，制定出了营造10万亩丰产林的规划并立即实施。经过全县干部群众同心协力的努力，很快就完成了种植任务。

临沂地区及莒县，成为国家林业部杨树速生丰产林的样板，省里在临沂召开了杨树速

生丰产林推广现场会和国际研讨会。1983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啊,速生丰产林》大幅标题文章,用大量事例论述了“像种庄稼一样来种树”、“一年等于二十年”、“绿色银行”、“无烟工厂”、“绿色保险公司”和“要想富多种树”等营造杨树丰产林的长篇通讯。

### 推动银杏种植 帮扶贫困学生

王任之于1984年离休。王老离休后的理念是:共产党员应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还应当继续为群众办点实事和好事。他积极组织了沂蒙银杏协会,他把个人的部分工资(约十三万余元)无私地奉献给了贫苦群众,从事“造福子孙后代”的银杏工程。据不完全统计,群众仅卖银杏叶就受益5000余万元。自2006年始,王老又与银杏协会几位副会长议定,每年从银杏协会的经费中拿出部份资金,扶持地区贫困大学生入学,积极参加扶贫帮困的希望工程。目前,已扶持贫困大学生、高才生50名,多数为北大、清华、山大和浙大等名牌大学的学生。



江泽民来临沂视察时与王任之交谈



##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郯城木旋玩具：薪樗逢机显性灵

张铁民



郯城木旋玩具，产地主要分布在郯城县港上镇以樊埝村为中心的周围十多个村庄。木旋玩具以往民间的名称叫“耍货”。“耍货”又是我国传统民间玩具的统称，它包括泥玩具、竹制玩具、木玩具、音响玩具、节令玩具等许多的门类。申报“非遗”时，考虑到樊埝村木玩具的大多数部件，是用镞床旋制而成，为了突出其个性，便起了“木旋玩具”这个雅致的名字。有的地方管这类玩具叫“车木玩具”，比如浙江温州的泰顺，就是这种称呼。不论“旋”还是“车”，都是指用特制的车床，对原木件进行加工的一种工艺。这种工艺在我国宋代就已经十分盛行。北宋著名建筑学家李诫的著作《营造法式》，就有详尽的记载，称为“旋作”。

传统木玩具的原料，多是被看做不成材的边角下料、废料，即所谓“薪樗”之材。然而，就是这些世人眼中的废料，一经木玩艺人之手，就像春天被和煦的阳光抚慰过、被甘露般的春雨滋润过的芳草百花，立时禀赋了灵性，纷纷争奇斗艳，绽放出令人炫目的万紫千

红，可谓“薪樗逢机显性灵”。

木制玩具包括木刻、木雕、旋木等门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山东大汶口、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曾出土过人工制作的“木鱼”，被专家认定为原始玩具。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代表人物墨翟，就是一位木艺大师。他制造的云梯、木鸢，不论是在当世还是后代，均备受称道。据专家考证，至晚到宋元时期，我国的木制玩具技艺已经相当成熟，并被大多数木工所掌握。民间工匠在走村串乡为雇主制作日用家具或农具的同时，也利用边角下料，为孩子们制作一些玩具。这些花色、式样繁多的木玩具，如踏碓童车、鲁班锁、七巧板、木陀螺等，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儿童少年，经过了多少春风秋雨，世代相传，直到当今。

木制玩具在国外出现，大约是在十六、十七世纪。十六世纪，德国开始有工匠制成木玩具出售。十九世纪，美国出现了由德国移民开设的木玩具工厂。他们制作的木玩具，有的源于东方，比如“跳偶”就是。至于木玩具在欧美广泛流行，已经是近150年的事了。邻国日本的木玩具历史也很久远，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最早是用于祭祀和祈祷，后来变为儿童玩具。日本木偶种类繁多，制作精良，还有为供奉、赏玩木偶设立的节日。比如三月三日是祭雏节，又叫女孩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也是男孩节。这些节日里，凡是有小女孩儿、小男孩儿的家庭，都要装饰、摆放供奉木偶人，祈求小孩平安茁壮成长。

我国传统木制玩具，从宋元时期头顶繁荣兴旺的冠冕，沿着历史大道一路走来，历经明清、民国，一直长盛不衰。只是到了新中国建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打掉了金银铜铁锡匠作，传统木制玩具也气息奄奄，渐趋衰落。到近几年国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各地才陆续从历史的尘封里将它扒拉出来，但已是寥若寒星。目前，能够查询到的仅有河南浚县黎阳镇的杨玘屯，浙江的云和、泰顺、黄岩，江苏泗阳的王集以及省内菏泽鄄城的郑营乡刘庄村等处。郯城樊埝的木旋玩具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北京、广东、福建等省市也有零星分布。各地大量存在的玩具工厂，早已不见了传统玩具的踪影，大都生产现代玩具和洋玩具。

## 二

郯城木旋玩具的历史，依据《樊氏家谱》和当地口碑，可以追溯到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65年~1487年）。传说距今500多年前，樊氏的七世祖樊木，从江苏赣榆逃荒来到郯城县西部的沂河岸边，遇到一位木匠，就拜这位木匠为师，学习木工手艺。樊木聪颖过人又能专心致志，没几年就把师傅的手艺全学到了手。出师后，樊木本想回老家，看到沂河畔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便在此定居下来。

樊木夫妇共有9个孩子，这些孩子个个聪明可爱，但若是淘气起来便搅得一家人心烦意乱。樊木无法专心木工制作，而他的妻子也无法专心做家务活，所以不得不花出大量时间去哄孩子们。一日，心灵手巧的樊木用制作木器剩下的边角料，随心所欲地制作了几个小巧的玩艺。这些玩艺做成后，发出吱吱的响声。家里的孩子们听到奇怪的声响，感到好奇，都被吸引过来。他们争抢玩具，嬉笑打闹，高兴极了。

孩子们玩得开心，乡邻乡亲的孩子们很是羡慕，都嚷着让家里的大人们给做同样的玩具。而家里的大人们觉得做起来费时、费力、麻烦，即使自己做了，水平也达不到樊木那么高，孩子们也不一定喜欢，于是便向樊木讨要。开始，樊木为他们免费制作。然而，制作这些小玩具，要用去大量的时间，本不富裕的家庭，也经不起长期无偿赠送。于是，他便酌情收取一些成本费用。料想不到的是，收费以后，向他索要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他发现卖这些木制玩具比卖那些诸如脚车、木凳、木椅等其它木器还要畅销，还要赚钱。心想，如果专门从事这种木制玩具的生产，说不定可以赚更多的钱。为了生产更多的玩具，樊木根据手拉皮

带使钻头转动的原理，制成了简易旋车，逐渐摸索出一套制作木旋玩具的技艺，开始大批生产木旋玩具。

除了满足乡邻乡亲孩子们的需要，樊木还把玩具批发给做生意的货郎。货郎们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把这些形状各异、色彩斑斓的玩具销售到了四面八方。天长日久，樊家埧木旋玩具的名声便传开了。

后来，樊木把这门技艺传给了孩子们，孩子们又传给自己的子孙，就这样薪火相传，直到如今。制作技艺也日益炉火纯青，成为鲁南苏北“一绝”。千姿百态的木旋玩具也以其迷人的形象和绚丽的光彩，受到百姓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并登堂入室，成为人们厅堂里的摆件赏品。现如今，在许多人家的书房、客厅、卧室里，常常摆放着高低棒人、燕车、虎头棒槌、提花篮等制作精美、造型活泼、夸张传神的木旋制品，既增添了文化氛围，又把生活点缀得异常精美喜悦。

这段“口碑”的草根味儿并不怎么浓重，很像一篇经过加工的故事。故事把木旋玩具的诞生，说成是樊木忽发奇想，显然是忽略了传承，有悖历史的。明成化年间正是传统木玩具发展的巅峰时期，那时木匠师傅中的大多数，应该是既能打造家具农具，又会制作木玩具的多面手，樊木的师傅自然不会例外。是樊木把师傅的全身解数悉数学到了手，才使得他成为郯城木旋玩具的开山之祖的。这虽然只是推测，但应该大致不差。

### 三

郯城县木旋玩具经过数百年来历代艺人的传承与发展，技艺逐步走向成熟。生产工具由传统的手工工具发展到手脚互动工具和现代的电力工具，产品也由“白货”（不上色的玩具）逐渐发展演变为“红货”（上色的玩具），其品格也由单一的要货，升格为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郯城木旋玩具种类繁多，有兵器、人物、动物、花篮、棒槌及车、鼓等十大系列500多个花色品种。仅兵器就有刀、枪、剑等六个小系列，几十个品种。如刀类中的小花刀、大龙刀、关公刀等，枪类中的梅花枪、水压枪等；人物有高棒人、低棒人及各种古代人物；棒槌有哗啦棒槌、虎头棒槌、两角棒槌等；车类有燕车、小人车、老和尚推花车等。其中，以棒槌人和燕车最具代表性。它们的制作技术，至今仍是制作木旋玩具的基本功。以火车、帆船、木偶人等为代表的木旋玩具则是艺人们根据时代和市场的要求创制而成的新品。

如果从玩耍形式上来分，还可以把它们分成四大类，即“声响类”、“牵拉推动类”、“舞耍类”、“摆放类”等。

“声响类”玩具，包括哗啦棒槌、虎头棒槌和双面货郎鼓等。这类玩具，虽然造型简单，但奇异悦耳的声响、灼目的颜色最能吸引小孩子，适合一两岁幼儿玩耍。

“牵拉推动类”玩具，主要包括燕车、小人车、击鼓车等。这类玩具，大多数能随着小车的前进，发出有规律的声响，有的还能看到小鸟振翅或者打鼓的景象。

“舞耍类”玩具，包括刀、枪、剑、戟等，是好动尚武男孩的最爱。

“摆放类”玩具，有棒棒人、古装人、小动物、花篮等。大多造型可爱，制作精美，因此格外受到女孩子的喜爱，成为她们形影不离的伙伴。

郯城木旋玩具制作的工艺流程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备料。制作木旋玩具的主要材料有杨木、柳木、银杏木。原料须首先进行剥皮、晾干。晾晒过程中最怕淋雨，经雨淋过的木材容易变质，彩绘时容易跑色，因此要特别注意。

二、下料。下料的依据是玩具的类型。传统的方法是用手锯截开，现在多用电锯。

三、上车床。把截好的小木棒以两端圆心为固定点，固定在车床上，然后开动旋床。在木棒旋转的同时，用刀具把它旋成所需要的形状。





老艺人在加工木旋玩具

四、砂光。对旋好的毛坯进行打磨。这一道工序比较简单，一般用砂布或布把毛刺打磨掉就可以了。

五、打底。为经过砂光处理的毛坯，涂一层“腻子”叫打底。“腻子”是用水胶兑上滑石粉熬制而成。打底用的腻子，比普通“腻子”要薄一些。

六、二次砂光。腻子凉干后须要再次砂光。使用的工具为串珠，即“桃木珠子”。用它处理后的毛坯，表面细腻，有光泽。

七、彩绘。彩绘使用的颜色多为红、绿、黄、蓝、紫、黑、白等，多为植物染料。将砂光好的毛坯安放在锥子上，先用墨线打出黑稿，再以各种颜色填充图案。绘画时手握锥把不时转动。高低棒人的脸部用墨线描绘，叫“开脸”。彩绘完毕，放置晾干，一件鲜活亮丽、栩栩如生的木旋玩具就完成了。为了使玩具能够持久保存，不褪色，艺人们还要涂一层清漆。但这并非传统工艺，而是当下的创新。

#### 四

郯城木旋玩具，乍看不过是孩子们手中的玩偶，并不起眼，然而，小小玩偶所呈现出的艺术个性和蕴含的历史讯息，却使许多大师、学者由衷欣喜，惊叹不已。

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韵致，是郯城木旋玩具的一大特色。其内容多取材于当地百姓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造型具有洗练精巧、形象夸张、生动传神、色彩艳丽等特点。装饰设计丰富多彩，既有儿童喜爱的花纹，也有民众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吉祥如意等图案，因此受到男女老少的普遍喜爱。

传统玩具棒棒人是这方面的代表。棒棒人，一高一低，成双成对。高棒棒人，为男子装束，头戴草帽，个子比较高，是一种典型的农人夏季劳作的形象。矮棒棒人，为女子装束，个头较矮，戴有头饰。棒棒人虽无手脚，却别有风致，且高矮胖瘦悬殊，有戏谑诙谐之情趣。切莫小觑了这小小棒棒人，它可是很有来头的。

过去鲁南苏北一带流行着一种迷信职业——江湖术士用一种叫做“耳报神”的削刻小木人，帮人求神问卜。术士们把小木人塞进耳朵里，作起法来，口中念念有词，信口回答主家的问询，说是“耳报神”探听到的。据说，棒棒人就是借鉴“耳报神”制成的。也有学者认为，夷人的远古先祖太昊氏又称伏羲氏，有伏羲与女娲兄妹相婚生民的神话，棒棒人就是这一神话的当代记忆。此外，棒棒人的造型和日本一种叫做“筒形偶人”的玩具极为相似，但

早出现数百年。这引起了日本学者、玩具收藏家的关注。他们曾数次来华考查、交流，探寻棒棒人的祖源和它背后的人文信息。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印记，是郯城木旋玩具的另一特色。燕车和鸟车表现得最为突出。

先说燕车。为什么要用燕子的形态来造玩具车？原来，现在的郯城县境，大体上是周代郯国的地盘。郯国是春秋时期，山东东南部一个子爵小国。它的国君就是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中“鹿乳奉亲”的郯子。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就“鸟官”答问时，曾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古东夷部族的首领少昊氏是自己的祖先。我们知道，太昊和少昊，是上古时期夷人部族两位最大的领袖。太昊风姓，少昊嬴姓，都信仰鸟类图腾，又以燕（玄鸟）、凤为最高代表。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作为姓号的“风”就是“凤”，“嬴”就是“燕”，是古字一音之转。果如此，就清楚地表明，“燕”曾是郯人祖先崇奉的神鸟。随着时光的流逝，几千年的凄风苦雨，已经把那些灼目的图徽，神圣的祭仪，还有嘹亮的颂歌，冲刷殆尽。唯有作为姓号的“燕”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木艺匠人、樊木及其后代，尽管对此可能没有清醒的文化意义上的自觉，但一种融进血液里的记忆，镌刻在遗传密码里的生命信息，终究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哪怕是下意识的。燕车便是这种顽强表现的结晶。

再看鸟车。仔细分辨一下，可以看出“鸟车”实际是“鸪车”。其渊源应该来自少昊部落的“五鸪”（祝鸪氏、睢鸪氏、鴈鸪氏、爽鸪氏、鹑鸪氏）。《左转》中记述的鸟官系统“五鸟”、“五鸪”、“五雉”、“九扈”，有学者谓，实际是指少昊氏部落的24个氏族。他们均以鸟名为氏族名号和官职称谓。“鸪”在木旋玩具中的出现，在述说着郯城这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与古代东夷少昊部落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

郯城木旋玩具，曾经伴随着多少代人的童年，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玩伴，为他们带来了数不尽的欢乐。改革开放后，被国家和省、市民俗、工艺美术方面的专家发现，载入新时期出版的各种有关典籍中。山东省美术馆民间艺术研究专家鲍家虎，在《齐鲁民间文化丛书（工艺卷）》中，系统地对它作了介绍。此外，郯城木旋玩具还曾多次参加国内大型展览，并先后被中国美术馆、宋庆龄基金会等单位收藏。2000年，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薪樗之材，欣逢盛世，蓦地获得了性灵，变幻成体态奇异，色彩靓丽的精灵，舞蹈着、歌唱着走上神圣的艺术殿堂，走进寻常百姓之家，给人们的生活增添别样的喜悦。



#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 兴福寺武僧抗清 东岳庙武道演技

民国二十四年《续修临沂县志》中有一《北齐北徐州兴福寺碑》的照片。这块北齐碑十分重要，它既说明了北齐时临沂属于北徐州，又证明临沂还有一座古刹兴福寺。这一古刹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

这座寺院建在何处呢？它就在城南护城河的南岸西小山上。这西小山又名鹤鸽山，即临沂广播电台的位置。清末许瀚先生在此发现了这块碑刻将其移至右军祠，此碑的残石现保存在市博物馆。这座寺院是何时毁掉的呢？这就要从明朝末年说起，自从李自成攻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开始，其势力也波及到当时的沂州。这在当时李国经的著作《明季遗史》中有详细的记载。当时临沂也有大顺政权派来了官吏，接管了府县两级政权，并发出布告起用永昌年号，但不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败走，临沂被派来的官吏也被赶走。临沂人公推原任河南巡抚的沂水人（今沂南）高明衡和李国经等人组织坚守临沂城，拒不降清，在今平邑一带的抗清义军王肖武部也与之配合共同抗清，一时成为山东抗清的最大势力，清兵对临沂城久攻不下，便派来一个贝勒率领旗兵前来攻城，但依旧攻之不下。原来城中抗清官兵给养充足，火药不断，皆是由城外兴福寺的僧人由地道送入城中。后来有奸人告密，清兵又转围兴福寺，武僧与清兵展开大战。这帮武僧武艺高强，数次打退了清兵的围攻。但坚守一月后，终被清兵攻入寺内。寺僧与之血战到底，全部战死了。这时城内失去了外援，不久也被清兵攻破了，高明衡和夫人自杀，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就这样悲壮地结束了。李国经则化装逃走隐于蒙山，写下了这段悲壮的历史《明季遗史》，这史稿一直秘藏于李国经的后人之手，至民国时始公开，故续修县志时多处引用，为编史志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临沂的历史上既有武僧同时也有武道，临沂城关的道观一向由正一派的道士看管，这些道士只会演奏笙、管、笛、箫、云锣、三弦、琵琶、埙等民族传统乐器，再就是给居民“打醮”、“放焰口”等做道场，他们从不习武。原来在城内各道观的全真派的道士，自清中期后皆隐退到山林去了，这全真派的道士去蒙山的居多，他们多在蒙山白云岩修炼，称为“炼师”。他们在山上采草药制作成药，还会制作古琴，弹奏古琴，由于全真派的道士食素，故他们制作的素斋也十分有名。他们还云游至湖北武当山，学来了道教的武术，道教的武术从此就在临沂发展起来了。白云岩的这些道士还与临沂的文人雅士有所交往，如清末进士王思衍、翰林王景禧等人皆曾去蒙山学琴，而临沂城在俗的几位武术师亦多在蒙山拜师学艺。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由县长范筑先为首成立了临沂国术馆，其教练高清三就是从蒙山道士学来的武术。

蒙山道士何时来临沂表演过呢？这是在1945年旧历三月二十八的东岳庙会上的一次表



演。日本侵略军自占领临沂后，怕八路军攻城，首先禁止了南关大集和教场会，而东岳庙会也只限为香火会。1945年日军节节败退，原住在东岳庙的汉奸也撤到了城内，这时看庙的道士顾宪宝乘机四出化缘，将东岳庙整修一新，所以这年三月二十八的庙会也达到了空前的热闹。他们还从蒙山请来了八位武艺高强的武道士，在东岳庙山门的对过有戏台表演，观众人山人海。一老道人表演了一套太极拳，又有一坤道表演了太极剑。接着是“举鼎”，早已有人将庙内的铁香炉抬到台上，这铁炉足有200多斤重，一位年轻的道士没费什么力气就轻轻地将鼎举了起来，台下一片掌声。接着表演的是“穿云”，在一张方桌上放个卷着的红席桶，一位光着膀子的道士双脚跳起，从席桶中穿而过轻轻地落地。“驾云”表演有些近似杂技团的“走钢丝”，在台上支起两个高架，两端连着一根绳索，一个道士轻轻地登上了绳索，手执一柄拂尘，在绳索上做着各种姿势，特别是表演的八仙的各种姿势让观众齐声喝彩。各种兵器的表演，尤以乾坤棍、太极剑、七节鞭、降魔杵最为精彩。这场表演持续到下午三点时，忽然来了一片乌云，接着一声响雷，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场武术表演也就结束了，这也是最后的一次在东岳庙的表演。

### 清明节城隍出巡 教场会大千世界

临沂的清明节习俗，家家户户门上都要插柳和柏树枝，据说这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孩子们喜欢放风筝，青年人则出城去踏青，但是最热闹的地方还是北门外的沭河渡口西侧的龙王庙的庙会。庙会又称清明会，庙会只是卖风筝、儿童玩具及各种小吃，特别是夏令的食品凉粉也自此上市。清明会的高潮是接近中午城隍出巡到达庙前的时刻。

每年的城隍出巡皆由政府 and 庙内的道士承办，供在大殿的城隍是个铜像，为出巡又制作了两个木像，分别为府城隍和县城隍。出巡时，庙里的道士给两个木城隍穿上官服，放在一个架子上由八个人抬着，这木制城隍还能活动起坐。出巡时前面摆很长的仪仗队和乐队，还有扮作“犯人”的还愿者，由扮作小鬼的人押着游行。出巡的队伍从庙门出来后，经城隍庙街南去经颜家巷口向东拐至原老专署前。早已等候的县官要来参拜，有人按下机关，这城隍还会立起来还礼，接着队伍南下至井神楼再向西拐至府衙前，又有知府参拜，同样木城隍还会还礼。出巡队伍向西行至今沂蒙路再向北一直出北门经北关直至龙王庙，将两个城隍放在扎好的彩棚里让人参拜，这时对面的戏台上就开始演出了，至下午5点时城隍才起驾回城。这种出巡直至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北伐军进城后才被废止。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城隍庙的各个偶像也全部被废掉，木制城隍也自然在劫难逃，只留下了一个铜铸城隍移到了万善庵，1965年“四清”时又被毁掉。

赶山会是过去人们的一大乐趣。至今山区农村仍有山会。过去临沂最大的山会当属城南大教场的教场山会了，因有骡马市故又称骡马大会，会址就在今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和原146医院的位置。这山会分春秋两次，春会是旧历三月二十五，秋会是十月二十五。一般是二十三就开始摆摊，至二十七结束。前来经营的客商有江南运来的木材杉木，北方张家口赶来的骡马，东有从连云港至日照运来的海产品，西方则有微山湖运来的湖产品和济宁菏泽运来的土产，还有江苏杂货，江西的瓷器，浙江和安徽的茶叶和丝绸，而本城的各商号亦前来摆摊。山会最让人爱看的是从张家口处赶来的马匹，山会东侧设有跑马场，让客商自己试马，本地有山区运来的柏木和石碾、石磨和各种山货。在春会上畅销的货物主要是农具和建筑器材，特别是牛马等牲畜，秋会畅销的是婚嫁用的木器，还有为老年人准备的寿木。

山会上最热闹的去处是各种文娱表演，主要有从税收中提部分钱来请京剧班来唱京剧，还有自行前来卖艺的艺人，其中有河北吴桥县的马戏表演，苏北来的木偶戏，鲁西来的皮影戏，还有天津来的拉洋片的。变戏法的、说相声的、说京韵大鼓的、打渔鼓的、打扬琴的，还有说武老二的、说数来宝的、打莲花落的，更有耍猴的、玩狗熊的、玩老虎的，五花八



民国老庙会

门，现在已记不清有多少了。山会上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各种乞丐。这乞丐中有打金砖的，背席包的，牵黄狗的，牵黄狗戴铃铛的，说好的……。特别令人讨厌的是“翻破头”的，它内部称“红山会”。会前抽签，要有一人在客商的摊子上“开山”，那就是将头刺破，让血流到摊位上，所以所有摊位都怕这帮乞丐，一见他们马上给钱让他走去。山会是人间众生相的一次大表演，还有开设赌局的，主要有押宝的，推牌九的，掷骰子的……，这些行当要收重税。每年的秋会还有一项特别的内容就是处决犯人，这是延续了明清两朝的“秋后处斩”的制度。十月二十五这天正中午，就在阁子门外小红汪处处决一批犯人。山会上的吃食是应有尽有，城内各大菜馆皆来经营，有钱的富商皆去饮宴，一般人皆喜欢去包子棚吃包子，穷人则去喝粥，吃些面食、干煎豆腐之类的食品。山会上饮水靠四口大井，也就是原146医院门前原有一甜水井，烈士陵园西北角处有一大井亦是甜水井，此外还有东北角处有一小井和南坛村北的一口井。厕所到处都有，大都是居民自设的临时小厕所。他们主要是为了积肥。用陶罐接尿，随时运走，这也是山会上一个组成部分。

山会至二十七日则结束了，重大的生意也在这天前后成交了，卖不了的一般货物要运走，但重量大的则不必运走，像卖石磨的要委托当地的石匠代为出售，柏木板则运到沂河渡口委托当地人代为出售。

如此大的山会至1938年日寇侵占临沂后即被制止了，因侵略军怕八路军乘机攻城，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又恢复了一次，但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领临沂后又被制止了，直到1948年二次解放后才又恢复，但随着改革开放，临沂已成为鲁南最大的商城，故山会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 天旱求雨拜众庙 急救时疫送瘟神

过去临沂城没有水利设施，遇到旱天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求雨。向谁求呢？当然是龙王。临沂城内外共有四座龙王庙，城隍庙西侧的龙神祠，东城楼上四海龙王庙，东大河渡口处的青龙寺，北关沭河岸上的龙王庙。首先是先到北关龙王庙去求雨，名曰“取水”，将一个泥塑的小龙王像抬着上街游行，所过之处皆悬起过街吊子，上面写着请龙王显灵等文字，

两旁居民还要向龙王的轿子上泼水，所有人皆光着脚头戴柳条帽，最后到东关老崖头由一名潜水员到渚子的深水处装满一瓶水，取回供在龙王像前。许愿后一定请戏班子来唱戏，同时下令全城断宰杀，一时市上就没有肉食品了。如果下了雨即就要“送水”唱戏谢龙王，但很少有灵验的。北关不灵就回城到龙神祠去求，这次是由城隍庙的道士“打醮”求雨，一连七天道士作法，但也都是无效的。这时，又要到东城楼上去求四海龙王。这东城楼上供着四海龙王四人和风雨雷电众神将，这次求雨的方式又改为由道士“拜章”，也就是上表给玉皇大帝下令让龙王降雨，一连又是七天。再不灵就要去沂河渡口处的青龙寺龙王殿中求雨了，这次的方式是由青龙寺的和尚“打七”，求佛祖派八部天龙前来降雨。七天后如再不灵就只好到外地去请人来求雨了，这种方式称作“打马皮”，是到鲁西去请“大师兄”前来作法求雨。请来后在西关东岳庙前扎起斋棚，所有求雨人皆要斋戒，不吃荤，不沾烟酒，不近女色。这大师兄住在神埵内，头包红巾，胸前还有太极八卦的图案，他焚香祷告后，即由神仙降坛。这些神仙大多都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中的神仙，有时是二郎神附身，有时又是孙悟空附身，但皆要执兵器表演，最后要爬上高杆向空中“借云”下雨，听说这种求雨法是白莲教的传授，可惜也往往不灵。这时已进入旧历五月了，人们心急如焚，只好改求关公了。在井神楼前又扎起彩棚，给关公上香许愿，然后奉关公命令去“请龙牌”，派一马队去到江苏宿迁县一深水渊中去摸“龙牌”。即一潜水员到渊底摸上一个刻有龙王的银牌或铜牌，用红布包上带回后供在井神楼上，这时已到旧历五月十三了，俗称这天是关公磨刀的日子，当然也是自然的气候降雨的季节了，故往往能下雨，皆道是关公显灵，当然要照样再刻一个“龙牌”，质地要一样，然后派人去送回龙牌，并在井神楼前唱戏三天以谢关公。这就是临沂旧社会求雨的大体过程。

临沂的神佛皆是庙宇供奉，独有瘟神是没有庙宇供奉的。每年的春夏之际，气温升高，各种流行病容易发生，因有中医会马上在药王庙开会研究处方配制药材及时救治，但是人们的心理还是认为有瘟神作祟，必须要送走瘟神，这项活动政府不介入，僧道也不参与，一般是由神汉和巫婆发起向群众集资搞活动，首先要请扎纸店给扎一个瘟神。这瘟神是紫面红发，锯口獠牙，甚是恐怖，再买些烧纸和香花果供，由四个人抬着，出南城门至南埵，埵上摆上果供，然后由一神汉大声念道：瘟神老爷，你酒也喝足了，饭也吃饱了，给你送行的钱财也准备好了，请你快走吧。说着由一人接着就点火烧着瘟神和扎好的一匹马连烧纸一同燃起，真是纸马明烛照天烧，这样就算把瘟神送走了。回家后送瘟神的人还要烤火，说是烤去邪气，这种活动一直至1948年解放后就没有了。

### 淹四隅三河会面 烧一库两庙唱戏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七月连日大雨，城外水位比城内还高，在水眼形成了倒灌，虽然关上水闸，但城内的水无法排出，积水汇于城四隅的低洼处，一时四隅皆被水淹，西南隅最严重，房屋全浸在水中，居民便逃到高处避水。西南隅最高处是普照寺，一时居民皆逃到寺中避难。西北隅是一片汪洋，只有北大寺尚露在水面，故居民皆逃往北大寺去避难。东北隅的至高点是原县衙门，群众无法进入，故皆逃到东城楼上去避难。东南隅魁星阁汪水满，将东城湾全部淹没，群众只好逃到南城楼避难。一时间全城倒塌房屋7000余间，幸无人员伤亡，7天后水位下降，这才开闸放水，但水消后，居民无家可归了，于是政府分发芦席给群众搭棚居住，一时连井水都无法饮用，怕有疾病发生。

城内淹得如此严重，而城外更甚。站在北城楼上向北看是水田一片，护城河、小涑河、大枋河已经连成一片了，北关村的村民皆逃到村西的上崖子上去避水。北看龙王庙只剩下回龙阁和大殿顶尚露在水面，这真是大水淹了龙王庙，这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

抗战前的临沂城还发生一次大的火灾，这次火灾是发生在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



的六月，事发地点是当时的南当铺。这家当铺是山西商人经营的，资金最雄厚，生意甚是兴旺。山西人有个规定，白天准许本地人在铺内打工，到晚上要全部清出，一律由山西人看管。其防火防盗十分严密，铺内有个规定不准留有任何火种，烧火做饭点灯用火一律用火石火镰打火，故此十分安全，打火时用火镰打击火石发出火星落在燃烧过的纸卷上用口一吹，火就点着了，用过后将纸卷要放进一个竹桶内，这次火灾就发生在这竹桶内的火种，原来纸卷尚有余火就放入竹桶了，果然在夜间这死灰复燃了，很快就引着了伙房内的柴草，整座伙房就起了大火，由于大火又引着了附近的衣物库，这衣物库下面是木地板，离地80厘米，是为了防潮，这火一引着库房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一时当铺内只有山西人，救火的人太少，本地人一时又无法招回，顿时，一座库房就这样烧毁了。幸运的是很快就熄灭了，又下了一场小雨，并未再延烧别的库房，事后晋商只好赔偿当户的损失。他们认为是得罪了火神，于是又去火神庙唱了三天的戏，下雨灭火他们又认为是他们的老乡关公前来救火，故此又去南关观音阁门里路西的山西会馆唱了三天戏，以谢关公。

### 火神庙山客传秘方 文昌宫老僧办佛学

旧城的西南隅有火神庙一座，庙宇甚大，对过还有一座戏楼，这火神庙主祀火神。关于火神的历史众说不一，有说是上古的祝融，还有记载是三国时醮周遇见的回禄，故古人遭火灾即称遭回禄。然祝融是男神而回禄却是女神，而庙中所祀都是火德星君，原来这五行中金木水火土皆是星君。《西游记》中火德星君和水德星君皆曾出现过，所以临沂火神庙正殿是供的火德星君，东殿供的是金木两星君，西殿供的是水土两星君，敬火神乃国家之典祀而民间更怕失火，所以这庙的香火特别旺盛，每年正月初七皆有庙会，并唱戏三天。这庙还有土地百亩，加上香火钱，庙的收入甚丰，奇怪的是这一道教庙宇却一直是由僧人看管，这庙最后的两僧人是老僧道亮和他的徒弟秀莲，抗战前这道亮生活甚为富裕，他不但吃肉喝酒而且还吸食鸦片。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某天，庙内来了一位山客，自称是蒙山道人，和道亮谈得甚是投机。此人也是吸毒者，很快二人成为烟友，终日对灯吸毒。这道亮的厨师制作的好菜更为山客所喜爱，长此以往日子久了，这山客对道亮的招待甚是感激，他对道亮说，我所以经济宽裕是因为我有一部《经验良方》给人治病，因此收入甚佳，如今我愿将此良方传授给你。这道亮当然欢喜，于是他们连抄写了几天，将秘方抄写完毕，从此这道亮就挂牌行医。其验方果然有效，从此火神庙的膏药和其他成药被广大群众所称道。1941年道亮圆寂了，他徒弟年龄甚小，故死前将秘方传给了他在南埵华严寺的师弟道明。至上世纪60年代初在南埵尚有人知道这些秘方，以后就失传了。

20世纪30年代范筑先任县长时开展戒烟活动，并寻找良方给吸食者戒烟，因火神庙的秘方中就有戒鸦片烟瘾的秘方，故派信仰天主教的医生夏云章前去抄写秘方，当时的道亮也非常支持，故此这部秘方被夏云章全部抄出，在解放前又在天主教内广为流传，至“文革”时秘方又被烧掉，幸喜的是最近又在民间发现抄本。

古城的西南隅还有一处道教宫观，那就是文昌宫，此庙建于明朝，亦入国家典祀，奇怪的是这庙也是僧人看管，20世纪30年代的当家老和尚名叫昌同，此庙坐东朝西，正殿五间，内供文昌帝君，后院是方丈室和客堂，东西配殿内还供着魁星和文曲星等等专司科举和功名的神仙，平时春秋两祭，而读书人更是前来拜祭者甚众，特别是考院开考前，这里香火更是盛极一时。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临沂推广新式教育，将许多寺庙改为学校，这文昌宫的昌同眼看要波及到文昌宫，为了保住文昌宫不被洋学占用，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自己办学”，他和其他寺庙的和尚商议要在文昌宫办个佛教学校，很快在东西配殿安放课桌，将城内外的年



庙宇学堂

轻僧人招来了30多人，并请广生宫的僧人圆悟前来讲经，这圆悟曾到普陀山受过戒，故在僧人中颇有威望，到教育部门前来办学时，这里已经开学了，所以在文昌宫办学的事只好推迟了，但好景不长，这些年轻僧人多不愿学习，不如在自己的庙中自在，很多人就退学了，加上经费困难，不久这所佛学院就结束了，这时教育部门派来了一批教师，带领学生将所有神像拉倒，改为临沂县第四小学，校长孙昭仁，教师有韩德一、刘公实、李荫青等人，这所学校培养的学生后来皆考入了三乡师和老五中，抗日战争中成了青年救国军的骨干，其中有庞世泽、王世超、李连峰、刘炬、孔超等人，这也是临沂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 临沂“头”字地名例释

邵明武

临沂市是山东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级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头”字地名星罗棋布。其中，有的“头”字在先，如“头道河沟子”；有的“头”字在后，如“汤头”、“马头”、“槎头”、“巩头”、“湖头”、“拐头”、“店头”、“驿头”、“墩头”、“玢头”、“独树头”、“柳杭头”、“高峰头”、“院东头”、“石桥头”、“凉山头”、“凌山头”、“薛山头”、“查山头”、“崇山头”、“尧山头”、“山南头”、“山北头”、“山西头”、“岭北头”、“朝山北头”、“北湖头”、“大山头”、“大井头”、“驼沟头”、“大枣沟头”、“河北沟头”；有的“头”字居中，如“大头庄”、“马头崖”。这些“头”字地名各有来由。今略举几例，以飨读者：

**汤头** 位于河东区东北部。关于“汤头”名称的由来，过去有两种说法：（一）有人将“汤头”的“头”解释为“首；第一”，将“汤头”解释为“中国第一温泉”。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也有“汤头”。两处地名都叫“汤头”，难道我国有两个“第一温泉”？！（二）有人说因地处汤水源头，故名汤头。这种解释也是错误的。汤河又名温泉水，是沭河的一级支流，其源头在沂南县大庄镇张家埠子村东南。汤头地处汤河中游，怎么能说是“源头”呢？《汉语大词典》中，“头”为多音字，一读阳平，一读轻声。读阳平时，有很多义项。其中第十二个义项是：“边，畔。”如田间地头。因为“汤”意为“温泉”，“头”意为“边，畔”，所以，“汤头”的释义是“温泉附近”，其意思便是“建在温泉边上的村庄”。

**马头** 临沂市有两个叫“马头”的地名。一是马头镇，位于郯城县城西的沂河岸边。明清以迄民国，马头镇是沂河岸边的重要港口。《汉语大词典》中，“马头”的第二个义项是：“船只停泊处。即码头。”这是对郯城县马头镇最好的诠释。其实马头原来就叫码头。二是马头村，属于沂南县岸堤镇。岸堤镇境内有一座山，山形像一匹战马，故名“马子山”。马子山，头朝南，尾巴朝北。因为马头村地处马子山的南端，故名“马头”。

**巩头** 位于汤头街道办事处北部。由张家、刘家、穆家、王家4个自然村组成，地处北起沂南县大庄镇政府驻地、南至巩头村的一条丘陵的东南端，东、南两面濒临沭河的第一支流汤河。《汉语大字典》收有“磬”字，读gǒng，其释文是：“水边大石。《说文·石部》：‘磬，水边石。’《广韵·肿韵》：‘磬，水边大石。’”这条丘陵，西临沂河，北临鬼沟，东面和南面临汤河，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堪称“大石”。由此可见，“巩头”应该写成“磬头”，意思是“水边大石的端头”。只是因为“磬”是生僻字，便用常用字“巩”取而代之以。

**槎头** 位于沂南县苏村镇沂河南岸。苏村一带是沂河冲积平原。《汉语大字典》：“槎（二）《广韵》鉏加切，平麻崇。同‘楂’。竹、木筏。”《汉语大词典》中，“头”的





郯城马头沂河老堤防

第七个义项是：“端，顶端。”常言道，“沧海桑田”，“山不转水转”。在河水的长期冲击下，河道会发生游移，有时还会出现分流。苏村一带就是如此。如今，沂河在槎头村北面由西流转南流。但是，过去在槎头村东，沿着夏孟寺、李家庄、小杜家庄等村，沂河曾有一条分支。两条河道并行南流，其中间的冲积平原恰似河里的筏子，槎头村位于筏子的北端，故名“槎头”。

**石浪头** 村名，属沂南县界湖街道办事处。村东沂河岸边有一石梁，涨水时节，水石相击，浪高声响，故名“石浪头”。

**东贯头、西贯头** 是沂南县依汶镇的两个自然村。如果站在东贯头村里向南观看，糠山子、米山子、赵家顶三峰鼎立，米山子高踞中间，其余两山略低，且互相对称，三者组成的形状酷似人头上戴着乌纱帽。汉语中，“冠”是多音字：读音如“官”时，是名词，意为帽子；读音如“贯”时，是动词，意为戴帽子。既然山形像人头上戴着帽子，那么山名应为“冠山”。但是，为什么村名却写成“贯头”呢？《释名·释首饰》说：“冠，贯也，所以贯韬发也。”可见，“冠”和“贯”同义。于是，三座山附近的村名，便被称为“东贯头”。也就是说，“东贯头”村名由山形而得。西贯头则因位于东贯头村西而得名。



# 孝悌临沂

——《二十四孝》探源之五

大荒堂主



砖雕：卧冰求鲤

## 卧冰求鲤

卧冰求鲤记述的是魏晋两朝重臣王祥的孝行故事。王祥祖籍今临沂兰山，生于斯，长于斯。其故事最早见于东晋孙盛《杂语》：“王祥字休征，性至孝。后母苛虐，欲危害祥，祥色养无怠。盛寒之月，后母曰：吾思生鱼。祥脱衣，将剖冰求之，有少处冰解，下有鱼出，因以奉养。”

东晋干宝的《搜神记》，第十一卷内中大致相同，多有补充：“王祥，字休征，琅邪人。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譖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入其幙，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

南朝宋时期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广搜博求，记述更加详杂：“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晋诸公赞》曰：‘祥字休征，琅邪临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继室以庐江朱氏，生览。’《晋阳秋》曰：‘后母数譖祥，屡以非理使祥，弟览辄与祥俱。又虐使祥妇，览妻亦趋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冻，母欲生鱼，祥解衣将剖冰求之，会有处冰小解，鱼出。’萧广济《孝子传》曰：‘祥后母忽欲黄雀炙，祥念难卒致。须

舆，有数十黄雀飞入其幕。母之所须，必自奔走，无不得焉。其诚至如此。’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萧广济《孝子传》曰：‘祥后母庭中有李，始结子，使祥昼视鸟雀，夜则趋鼠。一夜，风雨大至，祥抱泣至晓，母见之惻然。’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虞预《晋书》曰：‘祥以后母故，陵迟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吕虔檄为别驾，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累迁太保’。”

南朝齐臧荣绪《晋书》则提供了另外一种版本：

“王祥字休征。后母朱氏思生鱼。于时河水冰坚。祥朝朝冒厉风于河涯伺鱼。一朝忽冰开小穴。有双鲤跳出。”臧荣绪，东莞莒人，与王祥乡邻，记叙似乎更加实在。

稍后唐朝房玄龄等人奉旨编修的《晋书》基本沿用了干宝的《搜神记》：“王祥，字休征，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对于正史的取材构成，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批评《晋书》有一句至理名言：“好采小说，论赞不实”。

敦煌《孝子传》中则寻不见王祥剖冰求鲤：“王祥字休征，琅琊〔临沂〕人也。事後母〔孝〕。夜中伺祥卧，后母持刀欲往害祥，值祥少出，内逼少出是也。误斫其被。祥心知之，口终不言，色养无殆。家庭有果树一林，其子繁多，恐虫鼠及他人所食，令祥守之。时风雨大至，祥抱树经宿彻旦，雪湿寒冻，母见惻然。祥以孝著称奇，〔官〕至太傅。魏时人。出魏书。”这似乎又是一种版本。

至南宋庆元年间潘自牧撰《记纂渊海》，张冠李戴，将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楚僚”故事嫁接到王祥身上，《搜神记》里是这样讲的：“楚僚，早失母，事后母至孝，母患痛肿，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寝。乃梦一小儿，语母曰：‘若得鲤鱼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寿。不然，不久死矣。’母觉而告僚，时十二月，冰冻，僚乃仰天叹泣，脱衣上冰，卧之。有一童子，决僚卧处，冰忽自开，一双鲤鱼跃出。僚将归奉其母，病即愈。”从而完成了王祥卧冰求

鲤的塑造过程。

清代学者余嘉锡认为：“《初学记·三》引师觉《孝子传》曰：‘王祥少有德行，失母，后母憎而谮之，祥孝弥谨。盛寒河冰，网罟不施，母欲得生鱼。祥解褐扣冰求之，忽冰少开，有双鲤出游，祥垂纶获之而归。人谓之至孝所致也。’其叙事极为明确，可见祥未尝卧冰。《记纂渊海·二》引《孝子传》曰：‘王祥事继母至孝，母疾思食鱼，时冬月，冰坚不可得。祥解衣卧冰上，少时冰开，双鲤跃出。’此所引《孝子传》，不知何家；卧冰之说，盖始于此。则其传讹，亦已久矣。”

到元代郭居敬编录《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王祥居第十八位。登上了封建王朝的道德祭坛的顶端。

《二十四孝》“卧冰求鲤”条是这样记载的：“晋王祥，字休征。早丧母，继母朱氏不慈。父前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母尝欲食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归供母。”

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一片卧冰模。”

此后，王祥名气更是大涨，这与封建王朝的需要和封建帝王的推崇分不开的。明永乐皇帝朱棣撰《孝顺事实》，其中赞美王祥曰：“王祥诚孝真堪羨，承顺亲颜志不回。不独剖冰双鲤出，还看黄雀自飞来。”清乾隆皇帝南巡，路过沂州，题“五贤祠”诗：“孝能竭力王祥览，忠义捐躯颜杲真。所遇由来殊出处，端推诸葛是完人。”内中指出了王祥不仅孝行，其德能勤绩也足以称道。

王隐《晋书》里有：王祥出来做官，已经年过五十了。曹魏徐州刺史吕虔，委任他做别驾。“以股肱之忠，纠合义众，州境获宁。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晋诸公别传》记载：晋司马炎以禅让之名取代曹魏，满朝文武，喜笑颜开，只有王祥面无表情。了解他的人赞叹说：“王大人念旧，不曾忘记自己是前朝之臣。”说明王祥是一个不畏权贵、注重感情的人。

孙盛《晋阳秋》更有：“忠肃公亮，当朝正色，匡救远失。”

王祥入晋朝，官至太保，进爵为公。等到年迈病重，写遗嘱告诫子孙说：“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 富饶庄高氏墓志考略

王相臣 孙 静

平邑县柏林镇富饶庄古墓群是山东省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宋代墓群，2009年春，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些墓葬虽然多为二次葬，且几座较大的还被盗扰，但还是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墓志是这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共发现6方，其中4方是这次发掘出土的；另两方是1970年出土、这次发掘期间调查征集到的。6方墓志，内容丰富，书法精致，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学、艺术价值。现初考如下：

## 一、高弁墓志

高弁墓志是这次发掘出土的，位于高弁夫妇合葬墓内的右下方。该墓志为青石质。形制较为特殊，无盖，呈长方形，高51厘米，横宽92厘米，厚9厘米，顶部略残，但未伤及文字，四边饰蔓草纹。志文阴刻楷书，共35行，满行17字，计673字。

从墓志中可知，高弁，字元礼。原籍为赵方，即今河北。五代时期为避战乱，其祖父迁居沂州费县孝义乡（今属平邑县柏林镇）。其父、祖父等，虽然品德很高，但未入仕。高弁自幼读书，深明大义，廉直谦退，于物无忤，一生“以顺道事亲、事长，以义教子”。其子高复登科入仕，官至驾部员外郎。高弁“以子恩授大理评事”，后迁任大理寺丞，卒后赠尚书比部郎中。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家去世，享年74岁，由此可推知，高



弁生于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葬于沂州费县孝义乡东蒙里祖茔。高弁娶妻周氏，生子4人，即高复、高才、高言、高适；育女3人，皆嫁于大户人家。有孙12人，长孙高师颜早卒，次孙高昌庸任解州司理参军，孙高师雄、高师尹、高师韩均中进士，其他当年尚年幼。

为高弁墓志撰文的是时任将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棣州州学教授赵挺之，即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的父亲，词人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字正夫，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进士，为登、棣二州教授，德州通判。后任吏部侍郎、中书舍人、给事中；徽宗时任吏部尚书、宰相等职，曾屡陈蔡京奸恶。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去世，赠司徒，谥曰清宪。

## 二、周氏墓志

周氏墓志位于高弁夫妇合葬墓的墓道中间。陶质，呈灰色，高61厘米，宽63厘米，厚9厘米。正面内篆铭名，4行，12字，为“宋故永嘉县太君周氏墓志铭”。背面为志文，楷书，26行，行满27字。由于水渍侵蚀较重，部分字迹模糊难辨。

从墓志可以看出，周氏是当地颍舆村人。曾祖周惟籛、祖周冲、父周明均未入仕。周氏自幼天性柔顺，对父母、公婆孝敬，体贴入微，对丈夫恭敬备至。周氏勤俭持家，教子有方，以子恩封永嘉县太君。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八月二十一，卒于家中，享年88岁，同年十月二十八与高弁合葬于祖茔。推算可知，周氏生于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

周氏墓志撰文者为赵挺之，书丹者为定海主簿、蔡州教授秦观，篆盖者为奉仪郎蔡駟。秦观，字少游，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北宋文学家。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等职。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号称为“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秦观以书法见长，善小楷，工行、草。蔡駟曾任河阳知县等职，是北宋前期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梅尧臣的外甥。

## 三、高复墓志

高复夫妇合葬墓位于高弁夫妇墓的右前方。1970年夏，因暴雨被水冲出，为三室石椁墓，出土了铜镜、瓷器、砚台、墓志等文物。砚台等文物被送交至县文物部门，墓志则被拉至温水镇东围沟村。2009年春，在富饶庄发掘该墓地时，根据群众提供的信息，我们找到了

高复墓志，并征集入馆。该墓志一合，青石质，方形，边长95厘米。志盖为盂顶，上篆铭名，4行，12字，为“宋故朝散大夫



琅琊高公誌铭”。由于保存不善，志盖已断裂为数块，其中右上角残缺。志文楷书阴刻，共41行，满行41字，总计1649字。由于志石断为两块，个别文字无法识别。

根据志文可知，高复字道胜。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他以超人的学识获得世人的认可，从而步入仕途。先任大明府永济县主簿，后为杭州钱塘尉。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起，历任卫尉寺丞，知大名府朝城县；监闾州税盐场，迁大理寺丞、太子中舍，签书镇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转殿中丞、国子博士，通判保定军；虞部员外郎，通判陕州。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选知赵州，迁比部员外郎，驾部员外郎，知登州。后权知邢州，换朝请郎，权知相州。不久，任江南东路刑狱公事，迁朝奉大夫，知曹州。宋哲宗即位时（公元1086年），恩加朝散大夫，服金紫、勋上柱国。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五月二十五去世，享年69岁。推算可知，高复生于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和前夫人王氏合葬于沂州费县孝义乡东蒙里祖茔里。

高复曾祖父名高晏，祖父高尽忠，均未入仕；父高弁，告老还乡前任大理寺丞，后累赠为太中大夫。其妻王氏被封为寿光县君，继室王氏被封为寿安县君。生子8人：高师颜，早年去世；高昌庸，进士及第，为奉议郎；高泽，荫补为太庙斋郎；高康、高廉未仕；高小僧早卒；高沂、高奴，当时年幼。生育女儿3人：大女儿高朝娘，早卒；二女儿、三女儿当时尚未出嫁。有孙男6人；孙女10人，大的已出嫁，其余当时尚未嫁。

高复为官40余年，虽然多在地方任职，但都忠于职守，造福一方。任大名府朝城（今山东莘县）知县时，当地治安混乱，盗事多发，百姓不堪其扰。他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整顿社会秩序，先擒贼头，按律断狱，以礼待吏，宽以治民，扶弱抑强，“境内大治”。此时，高复的官职虽小，但遇事敢言，曾因河防之役得罪上司通判，由知县徙监澶州仓草场。不出一月，朝城县数千人到时任吏部尚书的夏竦府上，请求高复还任。夏竦察觉到了通判的诬陷，安慰高复说：“吾不敏，几以人言失君。”高复任朝城知县二年，政声甚佳，当时有歌曰：“令尹不去，渠胥不富；令尹不归，百姓不肥。”不久，经夏竦推荐，高复移监闾州税盐场，迁大理寺丞、太子中舍，签书镇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高复任赵州知府时，正值大旱。他开官仓放粮，出青苗钱，使数万人得到了救助。为根治赵城的旱涝问题，他组织百姓整治河道，兴修水利设施。高复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时，鄱阳令李深上书朝廷，要求实行江西盐法，以增加税收。高复力陈其弊，李深的提议没有得到实行。高复不仅勤政为国，体恤民情，而且品德高尚。他推荐的人都是有才能、口碑好的贫家子弟。他的俸禄多用来资助一些孤寡贫穷者。去世时，“家无余赀”，连一件新衣都没有。高复“天性至孝”，“以奉亲为职”。他母亲生病后，他衣不解带，昼夜侍奉，所用的药剂必亲口尝后再让其母服用。

从高复的经历看，他一生廉政爱民，多所建树。神宗皇帝曾说：“高复忠厚人也，宜委以事。”为他撰写墓志的顿起也对其一生做了概括性的评价，认为高复是个贤者。

墓志中提到的夏文庄公，名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北宋大臣，文学家、古文字学家，著有《文庄集》百卷及《笺奏》、《古文四声韵》等。官至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封郑国公。卒后赠太师、中书令、谥文庄。墓志中涉及到的另一人李深，字叔平，今福建省光泽县人。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曾任济阳主簿，鄱阳、遂平县令等职，以清廉审慎、刚直不阿闻名。卒后赠朝散大夫，著作有《杭川集》。

墓志的撰文者为左朝散郎、通判太原军府兼管内劝农事、上骑都尉、赐绯鱼袋顿起。顿起是蔡州人，生卒年不详，是苏轼、苏辙的好友。顿起有诗记述苏轼在徐州建黄楼的本末。苏轼有《送顿起》、《次韵答顿起》等诗，苏辙有诗《送顿起及第还蔡州》。书丹者为左奉议郎、充集贤校理太常博士、骑都尉、赐绯鱼袋陈察。蔡京专权时，陈察与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被列为“元祐党人”，受到迫害，其姓名被刻入“元祐党籍碑”颁布天下。篆盖者为左奉议郎、秘书省校书郎、武骑尉杨国宝。杨国宝，河南荥阳人。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以文行著称，曾任开封府推官等职。



#### 四、王氏墓志

王氏为高复的夫人，其墓志也是1970年出土的。墓志出土后被富饶庄村民拉至村内，改造成门础。2009年春，我们找到了王氏墓志，随即征集入馆。该墓志为青石质。无盖，长方形，高60厘米，横宽84厘米，厚19厘米，四边饰蔓草纹。该墓志现断为两块，个别文字残缺；碑面也因残泐，部分文字模糊难辨。志文满行16字，现存17行。

从墓志可以看出，王氏为临沂人。自幼天性柔慧，贵珍淑贤，18岁嫁高复为妻。在家勤俭率下，有礼有节，侍亲至孝，和睦乡邻，被封为寿光县君。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十一月二十八卒，享年41岁。依此可知，王氏生于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十月十五葬于沂州费县东蒙里先茔之域。

墓志的撰文者为宣德郎、守秘书丞、同监解州解县盐□兼知事田□□。王氏的次子，时为将仕郎、解州司理参军的高昌庸书丹。

#### 五、高昌庸墓志

高昌庸夫妇合葬墓位于墓地的东南部，是本次发掘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墓志位于墓葬的右前方，志盖相扣，四角用崇宁重宝钱10枚相隔。该墓志为青石质，方形，边长76厘米。志盖上篆铭名，4行，12字，为“宋故朝请郎琅琊高君墓誌铭”。志文阴刻楷书，共37行，满行37字，计1987字。

根据志文得知，高昌庸，字符仲。进士及第，先任解州司理参军，后为陈州项城知县。被封为宣德郎后，任蔡州确山知县。后历任签书镇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河东经略司、管勾机宜文字、提举晋隰州矾事、提举京东河北路监税、北外都水监丞、提举河北东路常平等事、尚书金部员外郎、京东路转运判官，自宣德郎五迁升至朝请郎，最后为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公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二月廿日卒于位上，享年58岁。推算可知，高昌庸生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四月十四，和夫人郭氏合葬于沂州费县孝义乡东蒙里祖茔里。

高昌庸是高复的次子。其妻郭氏被封为文安县君，先高昌庸去世。二人生育了6个儿子：



高完、高先、高览、高冕、高觉、高宽；女儿两人，分别嫁给了将仕郎顿逢原、从事郎谢克家。

高昌庸幼时聪明，五岁知自读书，从师问学，写词、做文章均超过他人。及长大成人，登进士第，任解州司理参军。时解州太守刚愎自用，下属官吏没有敢持不同意见者，只有高昌庸遇事敢言，多次因公事与太守辩论曲直。初太守十分生气，不久便对高昌庸的能力大加欣赏，并向上级推荐重用高昌庸。高昌庸任项城知县时，正值灾荒年，他在郡守面前力争，减免了项城百姓的租税。他还建学校，兴教化，录取优秀学生，亲自授课。在确山任知县时，高昌庸积极稳妥地革除旧弊，将确山治理得政通人和。韩缜任河东转运使时，上奏朝廷请高昌庸出任河东经略司。高昌庸到任后，为他策划方略，补益甚多。高昌庸不仅政绩突出，而且待人宽厚，重友情，讲义气。其俸禄多用来资助族属故旧，从不计较得失。在徐州应试时，与高昌庸同住一屋的刘刚意外受伤病重，高昌庸视之如亲人，精心调护。考试时，高昌庸又搀扶刘刚进出考场，后二人同时中选。

高昌庸入仕为官30余年。虽然官位不是很高，但他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体恤民情，造福百姓，是宋神宗赵顼在位时的“才能吏”。不论任内官外官，高昌庸均有卓越政绩，直至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卒后追赠为太中大夫。

墓志中提到的韩缜，字玉汝，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庆历二年（公元1042）进士。历任河东转运使、同知枢密院事、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罢相知颍昌府，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赠司空、崇国公，谥庄敏。墓志中提到的将仕郎顿逢原、从事郎谢克家，是高昌庸的闺女婿。顿逢原，《宋史》无传，生平事迹不详。谢克家，字任伯，上蔡（今河南汝南）人。绍圣四年（公元1097）进士。宋南迁时，任吏部尚书。建炎四年（公元1130）官至参知政事，次年为秦桧取代。绍兴四年（公元1134）去世。

墓志由时任宰相的赵挺之撰文，高昌庸的长子高完书丹。

## 六、高泽墓志

高泽墓志是2008年12月22日土地复垦时发现的。由于出土时遭到破坏，志石现存左下部，志盖则完好。该墓志为青石质，方形，边长70厘米。志盖阳刻铭名，4行，16字，为“宋将仕郎前杭州左司理参军高君墓铭”。志文楷书阴刻，现存27行，计525字。

从墓志可以看出，高泽以父恩荫补为太庙斋郎，历任高邮县主簿、杭州左司理参军等职。其母王氏为寿安县太君，即高复的后妻。其妻纪氏。生子一人，名高充，未入仕。育女二人。……四年三月壬寅葬于费县孝义乡东蒙里祖茔里。

将仕郎为文散官名，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废，崇宁二年（1103年）复置，为选人新阶官，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改为迪仕郎。崇宁年间，政治腐败，经济衰退，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频发，高泽辞职居家，著述讲学。后调任钱塘左狱掾，高泽称病不行。据此可推断，高泽入葬的时间应在崇宁五年后，政和六年前，即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或者是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

## 七、综 述

通过对上述墓志的初步考释和梳理，可以看出，富饶庄墓群是高氏家族墓地。其先祖为燕赵人，属渤海高氏支派。五代时期，为避战乱，高晏举家迁居于今山东平邑蒙山前。到高完、高充一代，已历7世。从墓葬的布局看，高昌庸、高泽之后，除夭折的儿童外，再无人入葬。据此可断定，该墓地的使用时间基本上贯穿了北宋一朝。其世系：高晏（始迁祖）—高尽忠—高弁—高复、高才、高言、高适；高复—高师颜、高昌庸、高泽、高康、高廉、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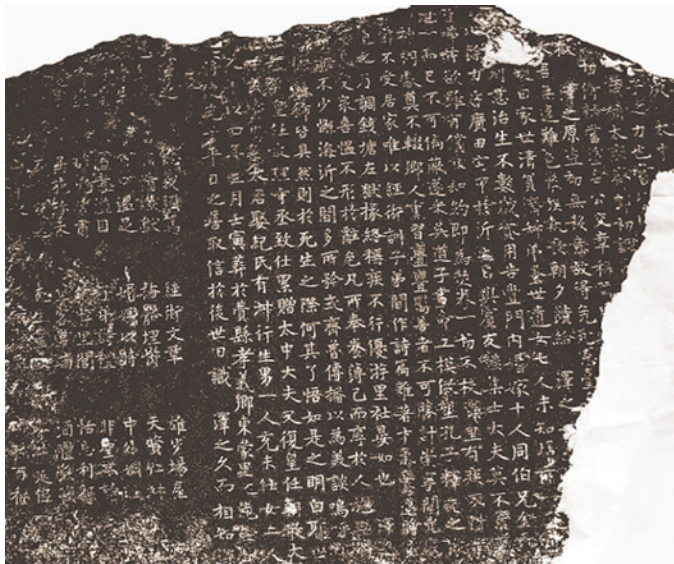
小僧、高沂、高奴；高昌庸—高完、高先、高览、高冕、高觉、高宽。

高复、高昌庸是这个家族的代表，父子二人在世时，该家族达到了鼎盛。高复官至朝散大夫，服金紫，勋至上柱国。朝散大夫是文散官名，为从五品上。金紫是指品官的服色，在宋代三品以上之官吏服青紫色。上柱国为勋官名，正二品。高复虽官为朝散大夫，但勋官却达到了最高品级正二品，其职权也重。在宋代，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官”只是说明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像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等官，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称为正官或本官，又称阶官或寄禄官。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提点刑狱公事等。官阶按年资升迁，即使不担任差遣，也可依阶领取俸禄，而差遣则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和升降。所以真正决定其实权的不是官阶，而是差遣。高复所任的差遣多为知州，是掌有大权的地方官吏。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最初是州、县两级地方官制，宋太宗以后发展为路、州、县三级制。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州的长官是朝廷委派文职京官前来“知某州事”的，所以又简称知州。与州同级的还有府、军、监。路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但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代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在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的宋代，高复属位高权重的官员。

高昌庸自幼聪敏好学，文才出众，步入仕途后，更显得出类不凡。不久被东平（今属山东）人，曾任濮州知州、夔州提点刑狱公事等职的郭概选为女婿。南宋史学家王明清称郭概“法家者流，遍历诸路提点刑狱，善于择婿。赵清宪、陈无己、高昌庸、谢良弼名位皆优”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四部丛刊续编本）。这既说明郭概善识人才，先后选择了赵挺之、著名学者陈师道及高昌庸、谢良弼为婿，也说明高昌庸确实具有非凡的才华。高昌庸数迁其职，最后任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公事，成为路一级负责刑狱的长官。高昌庸被誉为神宗朝“才能吏”，官至朝请郎，勋至骑都尉，赐绯鱼袋。朝请郎为文散官名，正七品上；骑都尉为勋官，正六品；赐绯鱼袋，即赐绯银鱼袋，宋代四品、五品的官员服绯，佩银鱼袋，作为出入朝廷或赴仕、出使的徽章，如果官员的阶官未及，皇帝以殿赐的方式授予，称做赐绯鱼袋。高昌庸在仕途上没有像其连襟赵挺之那样走得远，可能与他“遇事敢言”的性格有关。

高复、高昌庸等《宋史》无传，上述墓志的发现可补史籍之缺。墓志涉及到官名、地名、政坛上的人物、历史事件较多，为研究北宋中后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书法艺术、社会风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续三）

李兴河



## （七）

吴伟业（1609—1672年），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司业，左庶子等职。入清后曾长期闲居故里。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被迫应昭仕清，出任秘书院侍讲，迁任国子监祭酒。

吴伟业为明清之际诗坛的大家。其诗宗法唐人，博采兼收，早期诗作，风华绮丽，明亡后，多激楚苍凉之音。尤善七言律诗和七言歌行。著有《梅村家藏稿》。《夜宿东蒙道上》是诗人春天游览蒙山时所作：

客行杖策鲁城边，东访春风百里天。

蒙顶出泉茶辨性，龟田加火谷占年。

野蚕养就都成茧，村酒沽来不费钱。

我亦东山狂李白，倦游好觅主家眠。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中并没有正面细写蒙山的高大、雄奇、秀丽，而是精心选取了蒙山一带富有特色的习俗、风情、物产等来加以描绘，反映了蒙山一带物产丰饶和民风淳朴。表现了诗人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回归自然的心态。诗的首联，写诗人的游踪，信马悠悠，经鲁国都城，东行百里，山野春光，万紫千红，漫游画中，其喜悦心情，自不待言，这一联颇有宋人朱熹诗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的韵味。诗的颔联，先写蒙顶茶的清香，蒙顶茶被誉为“人间第一茶”，再用蒙顶泉水沏泡，以辨别蒙山茶的特性，自然更能品尝出茶味之美；次写蒙山一带土地肥沃，再加上焚烧作物秸秆和田间杂草，更增加了肥效，五谷自然就会获得丰收。“龟田”，即龟阴田。李白《寄东鲁二稚子》诗中说：“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这里泛指蒙山一带的农田。诗的颈联，写野蚕成茧，村酒酿熟，透露出丰收的喜悦。放养野蚕，即柞蚕，这是蒙山一带居民的一项重要农事收入，野蚕成茧丰

收了，居民自然充满欢乐。家酿的村酒，物美价廉，自然方便丰富了居民的生活，增添了乐趣。这里，诗人完全被恬淡的山野田园生活和淳朴的乡风民俗所陶醉。诗的尾联，写诗人也像豪放不羁的大诗人李白那样，游览感到疲倦了就在蒙山道上找了一家客店住下休息。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李白曾和杜甫联袂游览蒙山，杜甫写有“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诗句。诗人以李白自况，可见对李白品格和诗才的仰慕。全诗选材精当，内容富有特色，语言朴实动人，对仗工整，韵律和谐，不愧名家手笔。

曹贞吉（1634—1698年），山东安丘人。清代诗词家。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进士，历任徽州府同知、户部员外郎、礼部仪制司郎中、湖广提学佥事等职。为官清廉，深得民心。诗作气清力厚，情感真挚，风格道劲，尤擅长七言古风。词作追踪宋人，气韵淡雅，格调清高，风华掩映，寄托遥深。著有《珂雪词》、《珂雪诗》、《朝天集》、《鸿爪集》、《黄山纪游》等。暮春时节，游览蒙山，作《蒙山出云歌》，极有特色：

新安黄海天下奇，东蒙出云差似之。  
我来恰当春暮时，上巳已过清明迟。  
万山一气无端倪，如马如日不可知。  
绛衣掩映何葳蕤！化为苍狗空中驰。  
欲行不行司者谁？欲断不断微风吹。  
阳气鼓荡惊夔跼，纵横列缺兼王骀。  
八荒霖雨天无私，我闻贝阙光陆离。  
天吴海若夹水飞，蜃楼闪烁干虹霓。  
城郭人物靡不为，閼婆隐见波瀾瀾。  
观河面皱悲酸嘶，我有大腹一鸱夷。  
竟须引满金屈卮，醒来红日窥东篱。







这首七言古风，是山水诗中的佳作。主要写暮春三月蒙山出云的奇观和诗人观景的感受。诗的开头四句说，黄山云海是天下奇观，暮春蒙山出云的壮观景象堪与之媲美。诗的中间十四句，运用生动的比喻，奇妙的夸张，通过丰富的想象，织成绚丽多彩的画面，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蒙山出云景观的奇异瑰丽、变化莫测。“万山一气”、“如马如日”二句，是写群峰云烟弥漫，苍茫无际，遮天蔽日，极状蒙山云海的磅礴气势。“绛衣掩映”句是写云的色彩变化，日光映照，山云泛出红色，格外鲜丽。“化为苍狗”句，是说山云形态光色又须臾变幻的如成群苍狗在空中奔驰，这句写景，颇有杜甫在《可叹》诗中所写“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之妙。“欲行不行”、“欲断不断”两句，都是来形容山云缥缈浮动、变幻不定的形态。“阳气鼓荡”句，是说山中鼓荡的阳气象惊起升腾的虬龙。“纵横列缺”句，是说划破阴云的闪电象纵横错杂的银蛇。“八荒霖雨”二句说，苍天无私，一场好雨普降四面八方，传说神仙居住的宫殿用紫贝装饰得光彩绚丽。“天吴海若”以下四句说，传说中的海神天吴海若携带着雨水在空中飞翔，忽而天空呈现出“海市蜃楼”的奇观，与绚丽闪烁的彩虹相连接，蜃楼城郭中的人物都各有行为，有的迅疾行进，有的婆娑起舞，在茫茫的波涛中时隐时现。诗的最后四句写作者由观看云海蜃景而产生的一种世事虚幻、人生无常、逝者如斯的感慨，流露出醉酒长眠、超脱世尘的情绪。全诗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观察细微，想象丰富，比喻生动，妙笔生花，一气呵成，显示了诗人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才华。

颜光敏（1640—1686年），清代诗人。曲阜人。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工诗文。所作古体诗有汉魏遗音，近体诗有唐人情致。他与尚书宋荦、侍郎田雯、国子祭酒曹禾等结成“十子诗社”，并被推举为诗坛盟主，是时有“康熙十子”之美誉。著有《乐圃诗集》。《宿蒙山顶》是诗人游览蒙山时所作：

龟蒙遥接泰山阿，石屋苍苔覆薜萝。  
断壑阴森藏暮雨，孤峰屈注转银河。  
丁丁樵响穿林早，谡谡松涛闭户多。  
晓日晴开堪望鲁，高吟不叹手无柯。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中写的是诗人宿龟蒙顶从傍晚到次日清晨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将龟蒙顶的突兀高峻、石屋薜荔、断壑暮雨、孤峰瀑流、丁丁樵响、谡谡松涛依次写来，层次分明，景物变换，引人入胜。表达了诗人畅快的心境、乐观的情绪和对所谓清初盛世的赞颂。诗的首联，写高峻的蒙山主峰龟蒙顶与泰山遥遥相望，蒙顶的石屋和长满苔藓的石阶，覆盖着薜荔和女萝。诗的颔联，写傍晚在蒙顶所见之景：陡峭的深涧，阴沉昏暗，飘洒着苍茫的烟雨；突兀的孤峰，弯曲的瀑流，好似回转的银河飞落。渲染出一幅朦胧迷离的蒙山暮雨图。诗的颈联，写黎明在蒙顶所闻之声：丁丁的砍柴响声，一大早就从树林间传来；谡谡的松涛声，虽关着门窗，依然不绝于耳。诗的尾联，写早晨起来雨止天晴，立身山顶可以眺望鲁国故地，放声吟咏也不用叹息手中无伐木之斧了。心境的畅快，情绪的乐观，自然从诗中流露出来。“不叹手无柯”，用古琴曲《龟山操》典故。《龟山操》词曰：“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据传《龟山操》系孔子所作。喻指鲁国季氏擅权，有如龟山蔽鲁，而自己无权，无法改变季氏擅权的政治局面。诗人在这里反用其意，隐指清初盛世，政治清平，不用再为权臣误国而叹息了。

洪昇（1645—1704年），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著名戏剧家、诗人。康熙时任国子监生。性格耿直高傲，常常“白眼踞坐，指责古今”。“以诗有名京师”，其诗多流露感叹兴亡的思想情绪。擅长戏曲创作，与孔尚任齐名，有“南洪北孔”之称。所著传奇剧《长生殿》最有名。诗集有《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康熙十三年（1674年）春，诗人离家赴京，途中游览蒙山，写有《蒙山道中》：

乱石绕东蒙，崎岖古道通。  
一身千里外，匹马万山中。





密树遥遮日，轻花细逐风。

望云双泪落，岂是为途穷！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写诗人单身匹马，在东蒙古道游览，心中不禁产生一种孤独、凄凉和身世飘零的感情。诗的首联，写东蒙古道的崎岖、险峻、难行。诗的颌联，写诗人只身匹马在重峦叠嶂的深山中游览，自然感到孤独。诗的颈联，写暮春时节，茂密的树林遮天蔽日，轻盈的小花随风飘落。望落红无数，自然会产生一种飘零愁绪，正如宋人秦观在词《千秋岁》中所写：“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诗的尾联，正是写诗人的飘零愁绪。仰望天空飘动的云朵，禁不住双泪落，是什么原因使的诗人如此感伤忧愁，诗中没有直说，诗的最后一句说，怎是为个人境遇困窘、途穷路尽！杜甫在《春望》诗中写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看来，洪昇在诗中也蕴含着一种感伤世事、思念家乡、亲人的愁绪。春天的蒙山，山青水秀，花香鸟语，充满生机，却未能激发诗人的游兴，足见诗人心中愁绪之重。

查慎行（1650—1727年），浙江海宁人。清诗坛大家。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赐二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其为人正直，平和淡泊。为诗主张博取众长。平生作诗不下万首，精于诸体，风格清新隽永，善用白描手法，“卓然成一家言”。时有“北王（士禎）南查（慎行）”之称。他足迹几遍中国，其诗多记行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春夏之间，他由京师南归乡里途经新泰县境，南望蒙山如画，写下七言绝句《新泰城南望蒙山》：

翠岱孤抽碧玉簪，群山余势失崭崭。

晴云忽断东南角，又露东蒙一两尖。

诗的首句，先写远望泰山，孤峰独立，如竖玉簪。使人感到泰山之壮美。以“碧玉簪”比喻孤峰之翠美，古亦有之，唐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中写有：“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情景暗合，借用得恰到好处，也能收到好的效果。诗的次句，写周围的山陵却渐趋平缓，不再那么峭拔险峻。这时诗人遂产生一种看山已尽之感，以为前面就要进入一马平川了。诗的三、四句，写当作者向东南远望时却发现晴云开处又隐隐露出蒙山的一两个峰尖。给人以异峰突起之感，作者的欣喜之情自可想见。新泰城距蒙山遥远，能看到蒙山峰尖，可见蒙山之高。峰尖又是从晴云缝隙中露出，可想蒙山之秀。真是远山一抹美如画。唐人郎士元在《柏林寺南望》中写有“溪上遥闻精舍钟，泊舟微径度深松。青山霁后云犹在，画出西南四五峰。”“望”中之景，全在结句点出。查慎行的这首诗也是写“望”中之景，前三句波折起伏，堪称“画龙”，“点睛”之笔也在结句。全诗构思新巧，诗中有画，别具风味。

厉鹗（1692—1752年），清代诗人。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举人，以教学终身。学识广博，擅长诗词，精于琢句炼字，善写山水难状之景。作品多表现闲情逸致，时或杂有孤独之感。诗词独具风格，清新隽永，妍秀淡雅。著有《樊榭山房集》。1720年冬诗人进京应试途经蒙阴时写下七言绝句《蒙阴》：

冲风苦爱帽檐斜，历尾无多感岁华。

却向东蒙看霁雪，青天乱插玉莲花。

写这首诗时，诗人才28岁，风华正茂，心中充满了对仕途经济的美好憧憬和奋发向上的激情。诗中表达了他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对美好事物的热情赞颂，自然也流露出诗人愉快的心情。诗的首句，写诗人苦爱冲风吹帽，不畏寒冷，艰辛跋涉的情景，书生意气，自可想见。诗的第二句，写诗人感慨光阴荏苒，岁月流逝，时不我待的情怀，惜时之心，不言而喻。诗的第三句，突调笔锋，紧扣诗题《蒙阴》，转写欣赏眼前美景东蒙霁雪。东蒙，即蒙山，横亘于蒙阴之南，绵延百里，千峰戴雪，日光辉映，秀丽壮观。诗的第四句，细写东蒙霁雪之美：晴空一碧似水，雪峰洁白如莲，境界高远、空阔、清静、圣洁，极富诗情画意，真是一幅光艳照人的《蒙山霁雪图》！以“玉莲花”来比喻戴雪的群峰，更是神来之笔，特别新颖、贴切，又以“乱插”来加以修饰，化静为动，使参差错落的雪峰，更显得富有生命力。

造化之神奇，给人以天然之美；诗人之妙手，给人以艺术之美。“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足见诗人“琢句炼字”的功力之深。元代诗人杨载论绝句说：“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婉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这首诗的第三句，就转变得很好，起到了别开生面的作用，把诗境从冲风吹帽的路径上，从感慨岁月的沉思中拉过来，转而写东蒙霁雪，把视觉和情绪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诗的第四句，“青天乱插玉莲花”，一锤定音，诗的境界全出，诗的格调也随之由冷变暖，使人感到豁然开朗。

孙原湘（1760—1829年），清代诗人。江苏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官。假归后称病不出。作诗重性灵，词藻艳丽，作品内容多纪行一类。著有《天真阁集》。在归乡的途中，诗人特意到蒙山游览，并写下五言律诗《蒙山》：

山被云围住，围云更有山。  
青连马陵树，秀出铁门关。  
海近风常啸，峰高日可攀。  
我来立马望，一雁正南还。

这首诗是诗人眺望蒙山所作。诗用白描手法，朴实无华地描写了蒙山云山苍茫、横空出世的磅礴气势。并通过青连马陵、秀入铁门、海近风啸、峰高接日等夸张的描写，使蒙山由点向空间扩展，给人以高峻、绵远、浑厚、奇险的感觉。诗的首联，写蒙山之高，画山的要诀之一是：山要高，云缠腰。诗人深谙此道。山被云围，云上有山，可见山之高。群峰似不动的云，层云似游动的山。一静一动，相映成趣，把蒙山群峰写活了。诗的颔联，写蒙山之大，青苍的群峰遥连南面的马陵树色，秀美的山势进入北面的铁门雄关。这一联写蒙山颇有杜甫诗句“齐鲁青未了”的神韵。诗的颈联，写蒙山之险，蒙山临近大海，常有大风呼啸，山峰高入云天，登顶似可攀日，极言山之险峻。诗的尾联，写诗人驻马瞻望蒙山之时，高空正有一雁向南飞去。望一雁南还，自然会引起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乡，向亲人描述蒙山的高大秀美。





# 解放临沂

本编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盘踞临沂城的日军于1945年8月16日逃往枣庄。城内伪临沂第八保安大队许兰笙部和伪费县保安大队邵子厚部，秘密将王洪九部一部接入城内，企图凭借坚固的城壕工事和日军留下的几十万发子弹、几十万公斤粮食，固守顽抗。

为使临沂城重回人民手中，山东军区抽调二师四团、警备二旅四团、军区特务团、临沭独立团等，发起解放临沂城的战役。罗荣桓为此作了精心部署，他命李作鹏、罗华生、吴瑞林等组成前线指挥部，具体指挥这次战役。

8月17日，我军向临沂城守敌发起进攻，当即占领四关。20日、22日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爬云梯登城，一次次均被守敌打下。9月初，攻城部队确定在城西北角进行坑道作业，实行大面积爆破。经8昼夜紧张作业，挖成一条100多米长的坑道。工兵连夜将炸药从坑道内送进城墙下。10





攻城指挥部下达命令



北门城墙爆破成功，我军越过浮桥

日晨8时，将城西北角城墙外侧炸塌30多米，但因城墙过高过厚，墙内侧未倒。攻城部队两次向突破口发起攻击都未奏效。指挥部决定实施夜间攻击。夜9时，爆破组在猛烈火力掩护下，把一包包几十公斤重的炸药相继送到突破口，连续爆破，扩大了突破口。同时，攻城部队全体指战员呐喊声震天，军号骤响，造成冲锋的假象，迷惑敌人，使敌人的火力完全暴露。

11日凌晨1时15分，突击队秘密地迅速扑向突破口，当守敌发觉时，突击队已冲上城墙，迅速向两翼发展。敌人的所有火力点被一一摧毁，战斗又逐渐向城内各个区域扩展。天亮时，历时26天的激战宣告结束，鲁南重镇临沂获解放。此役俘伪临沂县县长韩文龙、伪临沂第八保安大队长许兰笙、伪费县县长韩金声、伪费县保安大队长邵子厚以下2000余人。

9月13日，临沂城2万军民举行庆祝大会，参战部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阅兵式。同日，临沂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山东军区及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等省级机关，先后由莒南县大店镇迁驻临沂城，临沂遂成为山东解放区的首府。





炮火急袭敌人阵地



率先突入临沂城的勇士们



突击队强攻临沂城



部队待命出发



被击毁的敌城防工事



战士们在打扫战场





入城式



入城部队接受首长检阅



此役歼敌600余人，俘敌2000余人



乡亲们庆祝胜利



# 齐鲁十佳 秀出蒙山

——解读李延国

刘凤才



2012年初，山东省卫生厅评选的第四届“山东省十佳医师”揭晓，李延国的名字赫然榜上。而十佳之中，出于市级医院者不出其二，李延国独占其一，更为临沂“杏林”赢得十分光彩，可喜可贺。

李延国乃临沂市人民医院肾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医院协会肾脏病与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临沂市医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多次被评为市级和院里的“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省卫生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为全省卫生系统“两好一满意”示范标兵，记二等功奖励。

人们在为其所获殊荣赞叹击节之时，必定更多地关注与探究其何以能够。笔者有幸对其进入较深入认知后，认为8字即可概括并昭示：“穷经皓首，殚精竭虑”。

## “穷经”为报养育恩

“穷经”者，意欲读遍所有经书，穷尽一切知识。

1977年3月，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进修生班，来了一位不到20岁的青年。从学员登记表

上看，他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去年7月才参加工作，满打满算，从医经历才8个月。学员大多是从医10年左右，有相当临床经验的中壮年大夫，谁也没把这个一看就是初出茅庐的后生放在眼里。大家只知道他有一个近似“痼癖”的特点，就是象一只永远吃不饱的“虫子”，天天抱着一本《实用内科学》啃读，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任何其他爱好没有，就是不能放下书本。

这个读书如痴、视书如命的小伙子，就是李延国。刚开始学习时，他还跟不上趟，便买了一套《实用内科学》，从头学起。几个月后，他的成绩就可以与其他学员齐头并进。一年学业结束时，他的考试成绩在全体学员中遥遥领先。那时，他有一个最简单最明了的人生目标：读书是为了好好地工作，好好工作是为了好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因为他们是沂蒙山中最善良最辛劳最不易最好的父亲与母亲。这对普普通通的农民夫妇，共养育了8个儿女。

1958年，李延国出生于蒙山之阴的蒙阴县联城乡。在姊妹8人行6。家中祖祖辈辈是勤劳本分的农民。上小学时，李延国还不是个“书虫”。他算弟兄们中比较调皮的一个，爱动不爱静，啃书的滋味太苦，太束缚。上小学二年级又赶上“文革”停课，于是，他辍学“自由”了。后来，他发现无知识的“自由”更苦，也没出息。看上中学的哥哥们多好，不用在家天天光着脚巴丫子割草、蹲在地里挣工分，将来上了大学还能到城里工作，吃“国库”，那才能更好地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当父亲终于把他重新送到学校读书时，他乐得一蹦三尺。从此，他开始一头钻进书本里，成了个品学兼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从上初中高中，一直到后来的大学，都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1976年7月，李延国参加招工被县医院录用，被安排在放射科学习做X线检查。这个“X”对他是一个全新的未知数。为了早点解读它，除了上班认认真真、点点滴滴地跟着老师学习，还专门买了《X线诊断学》等医书天天钻研。不长时间，就能在X线下看出不少的“门道”。他的勤奋与才智，深得县院领导喜欢，见其为可造之才，只工作了8个月，便把他送到青岛医学院进修。而他，靠“书虫”精神，给领导交上了一份优秀答卷。

培训结束时，青医的专家发现了他的极大潜质，几次动员他继续留下深造，培训费食宿费全免。他很矛盾，十分想留下来深造，可是心中却有一个更大的纠结，他要回去参加高考，正式走进医学殿堂。那时，他的身份是那个年代的“特产”——“亦工亦农”合同工，每月工资仅有29.5元。

1978年，李延国凭着若干年当“书虫”的良好文化基础，轻松通过高考。为保险起见，他填报了滨州医学院。上学前，县院领导满含期望：小李呀，千万别忘了蒙阴父老，毕业后一定要再回县院工作呀！他心头涌起一股热流：我一定回来！

大学期间，这位“大书虫”更如同身处知识的丰茂森林与广袤田野。他担任班团支部书记，全年级共发展6名学生党员，他为其一。1982年毕业时，学校领导数次请他留校任教。他留恋培育他整整4年的母校，但他更眷恋生他养他的蒙山沂水，牢记着他对父老的承诺，毅然回到了县医院。

4年大学，基础知识已经相当丰富扎实。正式工作、吃上“国库”粮后，他仍然感到知识“饥饿”。第一次拿到了半个月26元工资，竟然花了21.5元，买了一套新版的《实用内科学》，砖头块一样厚、2000多页的书本，只用了几个月，便记得滚瓜烂熟，几乎可以倒背如流。读书苦，苦读书，但是他不读“死书”，也不“死读书”，而是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更与实践结合起来，把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在临床中。现在有了充足的临床机会，他几乎每天24小时除了门诊，就是呆在病房中，靠在病人身边，用学到的知识指导临床，在临床中检验学到的知识。不久，他就成了内科骨干。

1984年，省立医院举办大内科进修班。要求条件很高，需本科毕业5年以上者方够资格，且考试录取。县院领导为了让他进一步深造，帮他悄悄地改了学历。全省报名200多人，只招30多名，他考了第二名。培训中，老师和同学们见他心对心血管、肾脏、消化、呼吸、内



分泌等内科无不精通，心电图，X片等各类检查无所不能，皆认为他是专门学彼专业的且是“老资格”。而他毫不懈怠，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为自己再“充电”，百尺竿头，又上一步。

### “皓首”皆因忧患心

读书让人快乐，知识使人年轻。李延国一向精明干练，一身朝气。但是，细心人会发现，他自己也无意间觉察到，自1997年后，尚未到不惑之年，他先前的满头黑发中，渐渐出现了根根银丝。当然，他的精气神却更足了。

1987年，为解决两地分居，李延国调到了当时的临沂地区人民医院，被安排在内一科即肾脏内科。多数新调到地区医院的医生，一般都要在几个专业上轮流转转试试，才能固定岗位。而他身手一试，就得到了十分认可，从此再没“转动”，在肾脏内科一干就是20多年。

当时的肾脏科，在大内科中还是一个“小专业”。为适应发展，培养骨干，来院后的第3年，医院特意安排他到上海瑞金医院专门进修肾脏内科。这次进修，让他眼界大开，水平再升，收益颇大。瑞金医院的专家也对他大为青睐，希望他能调到该院工作。但是 he 不想二次“分居”，更为缩小家乡与大城市的差距、抓紧提高临沂肾脏内科的诊疗水平而焦急，他要用学到的本领，化解家乡病人的忧患。

回院后他开展的第一项最有实用价值的技术，是“经皮肾穿刺活组织检查”（简称“肾活检”）。此前，当地在肾病检查诊断上，仍然沿用比较落后的一般性“临床诊断”，最多只能做个血检尿检。技术的落后使医生们不得不当“蒙古（懵估）大夫”，诊断不明确又往往贻误治疗。而“肾活检”作为“病理诊断”，是相当先进的肾脏病检查手段，可以对各种肾脏相关疾病作出确定性诊断，帮助明确肾脏损害的病因、病理类型、判断预后和指导有效的治疗。

1991年某天，肾内科收治一位20多岁的女患者，其全身浮肿，蛋白尿，血尿，贫血，肾



功能异常。按以往临床诊断，一般即视为慢性肾炎或肾功能不全。但是李延国对其病情心存疑虑，建议患者进行肾活检，此时他开展肾活检仅仅四五例。果不出其所料，病人被确诊为“狼疮性肾炎”。若按先前诊断治疗，患者病情发展的结局就是尿毒症，后果不堪。他随即对患者进行了激素、免疫抑制剂等特殊治疗，患者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并最终得以康复，后来还生了二子。而他采用的治疗方法，也是在瑞金医院进修时学习引进的“激素联合大剂量环磷酰胺冲击法”，在国内也属较早应用。当时，红斑狼疮患者的10年存活率只有20%左右。应用此方法后，达到80%以上，完全来了个“大反个”。

1992年，李延国他们已经比较熟练地进行肾活检时，据查，在国内市级医院中仍属较早开展，走在前列。现全科已累计完成肾活检4000余例，成功率99%以上，严重并发症为0。

真正促使李延国黑发生白的，却是因为开展另一项治疗技术——血液透析等血液净化。

1994年，李延国担任肾脏内科副主任，95年兼任血液透析室主任。当时，透析室属于传染科。临沂地区是出血热高发区，透析室主要是为抢救治疗出血热患者而设。随着肾病治疗需要的不断增加，院里决定由他兼任透析室主任。

肾脏是人体的重要排泄器官。它象一个极为严密而复杂的过滤器，随时把人体代谢中产生的许多“垃圾”排出体外，并调节保持水、盐等重要平衡。如因各种原因造成肾功能的损害、衰退、衰竭甚至不可逆转时，各种“垃圾”潴留体内，就会导致酸中毒，严重危害多个生理系统，直接危及生命。血液透析法简称“血透”或“洗肾”、“人工肾”，对减轻患者症状，延长生存期均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是抢救各种药物、有毒物质中毒的一项重要方法。然而当时医院透析室的现状却让他难以“差强人意”。机器陈旧落后，透析液不达标，透析质量低。在流行期应付病期较短的出血热尚能凑合，用于需要经年累月、长期治疗的尿毒症等，则相当不适应。有些患者虽然用上了透析，但不出两三个月，仍然避免不了“虽治而亡”的噩运。

病人的忧患，医生的天职，让李延国再也不坐不住，吃不下，睡不着。他找到院领导，汇报了现状，拿出了方案，甚至痛心疾首地大声疾呼：如再不迅速改善设备，提高水平，这种透析法，就不是治病而是杀人了！院领导也深为震撼与感动，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按你的要求与方案，立即落实！

从此，为了建立起一个高档次高质量高效率的血液透析中心，李延国就没歇过脑子，没住过脚步。他带领人员，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地四处考察学习，货比百家、精心核算地购进机器设备，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地制定操作规程，争分夺秒、认真严格地进行技术培训……不久，一个焕然一新的血液透析中心，出现在市人民医院肾脏科。前来诊疗的患者日益增多，治疗质量显著提高。

李延国的头发中开始出现根根闪亮的银丝。他毫不在意，也没时间与精力在意。他继续着他的前进步伐。为了更好地解除病人的忧患，他的目光总是紧紧盯着最前沿。2007年，肾脏内科又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连续性血液净化技术（CBP）”（又名“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它可以进行连续性血液滤过等，较之常规血液净化技术，具有稳定的血流动力学，持续、稳定地控制氮质血症及电解质和水盐代谢，不断清除循环中的毒素和中分子物质，按需提供营养及药物治疗的4大优势。这项技术已经大大超过肾内科的需要，涉及ICU、泌尿、心脏、消化、呼吸、神经、妇产、中毒、感染等多专业学科的内、外科患者，尤其适用于急危重症的抢救、老年人和心血管不稳定患者的治疗，极大地提高上述患者的救治率。就在他们引进此项技术不久，便成功救治了郯城一位50多岁的车祸重伤员。当时，伤员肝脾破裂，急性肾功能衰竭，凝血功能障碍与骨折，重度昏迷。经外科紧急止血修复后，送到肾内科时，其仍处于多脏器衰竭。在过去，此类情况死亡率极高，生还基本无望。李延国他们立即对伤员进行了CBP治疗，使其顺利渡过了危险期，一个月后康复出院。患者感激不尽，给他们送来了大红锦旗，至今还经常到科里来往。

CBP的开展，使医院的整体抢救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象严重药物中毒、重症胰腺炎等许多原来死亡率极高的疾患，抢救成功率大大提高。当然，也同时极大地增加了李延国与同事们的工作量和压力感，艰巨性与劳累度，风险性与责任心。

肾透析依靠仪器进行血液体外循环，病人有一定危险。无论是诊断治疗，还是护理操作，还是机器设备，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小的疏漏，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肾内科的医生与护士，本身就要经常加班加点，十分紧张与疲劳。随着医院各专业学科及时救治患者的需求，透析中心不得不拿出相当的人力物力，几乎跑遍了各分院、各专业学科。而这些专业需要做透析的，一来就是急危重症，肾内科同时承担了更大更多的风险。紧急出动、紧张战斗、紧张万分，成了他们的工作特点，也是他们的工作作风。

李延国怎么能不生长白发呢？然而壮年白发，孕育出的是更多的医疗成果。这些年，他先后开展10余项新技术新项目，填补了省、市肾脏病专业空白。对原发性、继发性肾小球疾病、肾间质疾病、肾血管疾病的治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国人高发、危及人类健康的重要“杀手”慢性肾脏病（CKD），实行个体化综合治疗，治愈、缓解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先后获得市级科技进步奖8项，国家专利3项，在医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主参编医学专著4部，同时担任青岛大学医学院和滨州医学院兼职教授，《临床肾脏杂志》编委等职务。

而今天的市院血液透析中心，拥有国际一流的血液透析机26台，连续性血液净化机3台，每年血液透析达1万余例次；每年开展连续性血液净化技术救治多种急危重症病者五六十余例，总计达到1000余例。

## 殚精唤回第二春

“殚精”者，用尽所有精力。

在数十年的从医生涯中，李延国还特别不忍见到另一种近乎于“规律性”的现象：夫妇二人如一人得了严重慢性肾病，如患者是男性，来院诊治期间，往往头几次还有妻子陪伴，再往后身边就会慢慢不见了妻子的身影；如患者是女性，这种情况发生得更多，陪伴看病治病的丈夫会离开得更早。他也经常听到一些让人心酸的真实故事：某地某人，因得了肾病不治，年轻地跳河自尽……严重肾病，特别象尿毒症、狼疮性肾炎等，治疗难，耗费大，预后差，一般人、一般家庭特别贫困人家，很难承担巨大的经济与精神负担，因此而家破人亡的事情时有发生。尽管医疗技术与水平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不解决患者的精神压力与心中纠结，照样严重影响治疗效果。

身体与精神“两病同治”，是李延国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他医德的生动体现。10年前，郯城县一位叫娟子的尿毒症患者来院治疗。其父刚刚去世，母亲患病，一个妹妹刚上技校，而她自己才22岁，参加工作仅半年。家庭负担自不待言，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女青年，精神上怎么能经得住如此不幸的打击！入院后，她情绪极差，十分绝望，常常叹息流泪。甚至对他人的健康顺达产生逆反心态，看到年轻的护士们一片生机盎然，就流露出反感，不配合治疗。而李延国对此给予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他决不能让这样一个青春生命早早殒落凋谢。思想工作虽然不是医生的职业与强项，他还是开动脑筋，绞尽脑汁，想尽一切理由与说辞，反复耐心地做娟子的思想工作，让她树立与疾病斗争、与命运抗衡的信心与志气。李延国更懂得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相结合的有效性。为了解决娟子的经济负担，他灵机一动，对娟子说，你的文笔很好呀，可以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向媒体求取救助呀！果然，娟子的眼睛中一下闪出了希望之光。她的情况很快得到了报纸与网络的同情与帮助，在社会上发起了一个“救助娟子行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回应，为娟子捐献了十几万元医疗费。李延国他们精心为娟子透析、换肾，不久，娟子康复出院，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她满含热泪，连声说：李医生和护士们真好，临沂人真好！正是这些好医生好人，让我获得了第二次青

春！几年之后，当她步入美好的婚姻殿堂时，专门来请肾内科的同志们出席。

从小过惯苦日子、辛勤劳动的李延国，对老百姓有一种特别的尊重与关怀，这是他的医德之根。

宁愿自己吃苦受累，一切为了病人，一切方便病人，是体现他医德的另一条原则。刚到地区医院时，他的孩子还小，他与爱人都是医生，为了病人一天忙到晚，下班时候经常误了接孩子的时间。每当急匆匆去接孩子时，经常见托儿所的阿姨领着孩子在路边眼巴巴地盼望，眼圈不由发湿。几年来，对十几位老年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他都是利于休息时间到病人家中免费指导治疗。遇有病人紧急情况，都是随叫随到。有天晚上九点多钟，某县中医院院长亲自给他打电话，一位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者，怕路上出危险，不敢朝市院转，要来车接他前去救助。从县里到市里一来一去，得耽误多长时间！当时，他正感冒发着高烧，半夜也难“打的”，只得在路旁搭了一辆开黑租的“小奥托”，一路颠簸，两个多小时赶到县院，及时抢救了患者。2010年他参与承担了国家“十一五”课题《中国成人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随机抽取调查全市15个村庄、3000名农村成人健康资料。为了及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天不亮他就奔到农户家，赶在下地干活前为他们抽血、验尿和体格检查，天天如此，整整辛劳了一个多月，其成果获得了科研组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良好医德，使他交下了众多的患者朋友。兰山区有一位尿毒症患者，数年前先在肾内科透析，后在肾外科换肾，得到李延国和外科主任郭丰富他们的全力、精心治疗，视他们为救命恩人，又视他们为最好的朋友。每年12月23日他进行肾移植的这天，都作为自己的“再生节”，年年邀请李延国他们前去庆贺，第一年还专门请了媒体记者作宣传。久而久之，这位患者拿李延国他们做了“主心骨”，两口子吵个仗闹点矛盾，也得找李延国他们给评理、调解，俨然一家人。

## 竭虑打造新乾坤

“乾坤”者，天地也。

1997年，李延国担任了肾内科主任。为了在肾内科这片“天地”中打造出一番新气象，把当时大内科中的一个“小专业”做大做强，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也为医院增光，他可谓“日夜竭虑”，累白了头发，也费尽了心思。

他对自己的“主任”这个职位与其职责有着清醒的理解与认识：在医院，院长是“总指挥”，我们就是在本科室中起带头作用的“冲锋队长”。凡事得带头干，还得能干、会干、干好，给大家树立个样子，同时更得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依靠大家的智慧与力量。业务上他自然得挑大梁，当主心骨，在其他各方面也必须当表率。无论是在抗击“非典”的特殊战斗中，还是在汶川大地震进行抗震医疗救助时，就是对医院号召的无偿献血等，他都是积极报名，冲在前头，发挥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业务领导的带头示范作用。他的思想与行动，也深深地感染着全科同事。5年前，科里收治了一位中年尿毒症患者，不幸的是她的一双儿女也同样患有肾病。当时她已血液透析一年多，偶然机会遇有一配型良好的移植肾源，但因不堪重负，对换不换肾一家人犹豫不决。李延国知道后，将自己准备买车的3万元交给了病人：机会难得，先治病再说！全科同志在主任带动下，纷纷伸出温暖的双手，一起为患者凑足了钱，成功实施了肾移植。病人感恩戴德：是你们这些好医生，给了我一条新的生命呀！

李延国十分关爱自己的团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理解。血液透析对护理技术要求很高，据介绍在美国必须具备5年以上的临床经验。肾病患者要经年累月地做透析，每次透析要数个小时，若干患者一起治疗，护理工作就忙上加累。去年，一向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护士长，终于不堪重负，竟然在李延国面前哭了3次。李延国很理解很感动，也耐心地开导：



看看今天那么多治愈康复的病人，我们苦点累点不是很值吗？护士长再看看主任那早生的华发，擦把眼泪，又去加班了。当然，李延国又把人员力量重新作了更恰当的安排与部署，尽量让大家有个喘气休息的机会。二是严格。特别在业务上，他经常告诫青年们：你们不能与我比，得按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我这个年纪，坚持个十年八年的行，你们要不刻苦学习提高，以后怎么能够适应？他努力给大家提供学习进修、培训深造的机会，使许多后秀蓬勃而起。

今天的肾内科，气象斐然，让人欣喜。在专业上，肾脏内科是全省肾病专业副主委单位，拥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并多次被临沂市卫生系统、市政府授予“党员模范岗”、“先锋模范岗”，2009年被山东省卫生厅授予“两好一满意”活动模范示范科室等称号。

而带出这样一个优秀团队的李延国，更为谦逊：成绩与荣誉，是集体创造的。我个人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大家智慧与劳动的结晶。没有大海，滴水何存？没有森林，何来大树？

这也是“齐鲁十佳、秀出蒙山”的真谛之一。



李延国和他的团队



# 姓氏百家漫谈——陈姓 (上)

赵丹峰

## 陈姓起源

陈姓得姓历史悠久，其代表性主源最早出自妫姓，系三皇五帝之一的虞舜的后代。舜早年以恭孝父母而闻名，帝尧爱其品格才器，将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舜为妻。舜居于妫汭。妫系河流名，相传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汭，指两水相汇之处。妫汭，即妫水入黄河处。因虞舜曾居妫水入黄之处，其后代子孙遂而姓妫。传至第34代为遏父（即阍父），生子胡公满。胡公满并非姓胡，亦不是以“胡公满”为姓名，而是姓妫，号胡公，字满。《史记·陈杞世家》云：“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而《左传》则称：“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封于陈。”陈国是武王灭商后所封建的一个诸侯国，其地在今河南淮阳一带。封建陈国的目的，一是使妫满及后人得以世代祭祀其祖先虞舜；二是可以获取虞氏后人对周王朝的臣服与支持。以后，妫满的后人便以国为氏，这便是陈姓的来源。

以上所说的妫满之陈氏，是当今中华陈氏族人的构成主体。此外，还有少部分他姓人士由于诸种原因改姓陈者。如在南北朝时，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有一支本姓侯莫陈的鲜卑族家族，便被改为汉姓，成为陈姓的族群成员。除各朝时有少数民族改姓陈氏外，还有一部分汉人亦因入赘或其他原因弃原姓而改为陈氏。上述情况虽然为数偏少，但亦在客观上壮大了陈姓族群的规模，在记述陈氏发展源流时不可或缺。



广东中山七路的陈家祠堂



## 陈姓族群的发展与迁徙

陈姓发源于河南淮阳，至今淮阳还有“老陈户”之说。后衍布于河南开封陈留镇、原阳县阳阿乡和固始县等地。西晋末，“永嘉之乱”发生后，陈氏与其他姓氏族群一样，大多离开故土南迁江左，居于今江苏丹阳和浙江长兴等地。后陈霸先于南朝时建立陈朝政权，都于建康（今南京），南京便成为陈姓的集聚地之一。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在此发展成为一大族群。唐末，随琅邪王氏后裔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在固始起事，后挥师入闽者中，即有陈姓一族。南宋时，陈姓族人开始迁居于广东，后发展成为当地一大姓氏。2002年秋，笔者到深圳印刷《临沂年鉴》，路经广州时，曾与同事一起参瞻过位于广州中山七路处的陈家祠堂。这座著名的宗祠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于光绪二十年落成，共三进五间、九堂六院，系广东72县陈氏族人的综合祠堂。祠堂总面积1万多平方米，为全国宗祠之最。置身于这座美轮美奂的宗祠，人们在充分体味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融合后所形成的独特魅力的同时，也明显感知到陈氏一族当年在粤地非同一般的政治地位与颇具影响的经济实力。明末清初，陈永华等陈姓人士随郑成功进台湾，使陈姓在台湾繁衍生息，至今已发展成为台湾第一大姓。有一个笑话段子，说是到了台湾，如果你不晓得对方的姓氏，如对方是男士，你可先问“您是陈先生吧？”如对方是女士，则问她“是陈女士吧？”此法多能歪打正着，因为在台湾居民中，陈、林两姓所占人数为多。

陈姓在长期的繁衍发展中，形成了诸多的代表性郡望，其中最显著者系颍川陈氏。其先祖为陈完。陈完系陈厉公之子，陈宣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他为避祸逃至齐国，改称为田氏（或因为古代陈、田音同而通用），即田敬仲。他被齐桓公任为卿，官为工正。其后代逐渐强大，至田和，终于取代齐国君王之位。公元前221年，田齐国为秦国所灭。田齐王建第三子轸逃至楚国为相，被封为颍川（今河南禹州）侯，遂恢复其祖姓“陈”，即陈轸，成为颍州陈姓之祖。此支陈姓支派后发展成为陈姓中最具代表性的郡望。除颍州陈氏外，国内陈氏郡望还有江州陈氏、汝南陈氏、广陵陈氏、下邳陈氏、河南陈氏等。陈姓广布全国，总人口约5000万人，其分布比例南方略高于北方。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



## 陈姓名人述略

陈姓是一个广布于国内的大族，有众多名人载于史册。秦末，陈姓中出了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他就是被司马迁列为“世家”予以立传记述的陈胜。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雇农出身。秦代赋役繁重，刑政苛暴，至秦二世时更甚，人民困苦不堪。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被征屯戍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行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刘村集）时因遇雨误期。依据秦法，“失期当斩”，为死里求生，陈胜遂与吴广率同行的戍卒900人起义。队伍迅速发展至数万人，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陈胜被推举为王。旋派兵攻赵魏之地，又遣周文率义军主力攻击关中。周文战败自杀后，秦军围攻义军大本营陈县，陈胜力战不敌，败退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为其御者庄贾杀害。此次起义虽只历半年即遭失败，但却由此而点燃了遍及全国的反抗暴秦的烽火，陈胜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杰出领袖而名垂青史。

汉魏时期，陈姓名人主要有：陈平，西汉开国功臣。陈胜起义，他投魏王咎，后从项羽，旋归刘邦，任护军中尉。楚汉战争中，他建议刘邦用反间计，使多疑的项羽去其最重要的谋士范增；建议以爵位笼络韩信，为刘邦所采纳。汉朝立国，他被封为曲逆侯。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又建议刘邦伪游云梦，逮捕韩信，逐一除掉了异性诸侯王的势力。惠帝、吕后时任丞相。因吕后大封诸吕为王，他被削夺实权。待吕后死，他与太尉周勃定计，合力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文帝刘恒。初，他让位于周勃，任左丞相，因明于职守，受到文帝称许。不久周勃罢相，陈平专为丞相辅国。

陈蕃，系东汉大臣，以刚正忠耿名垂青史。任光禄勋时，他与中郎将黄琬共同主持选举，公正不阿，不偏向权富，被诬陷遭免。不久，又被征为尚书仆射。他曾数次向桓帝刘志谏陈时弊，主张放还后宫采女，反对宦官擅权，故被太学诸生称誉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字仲举），将他与窦武、刘淑并称为“三君”。灵帝刘宏登基后，他任太傅，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事泄，率官属及太学生80余人攻入宫门，兵败后被害。

陈琳，系汉魏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其诗作《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繁重的劳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系最早文人拟作乐府诗作品之一。“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以读者揣度，凡是读过此诗的人，在登临长城时，其心境绝不会像游览桂林山水时那般陶醉和轻松。

西晋时期，陈氏族中产生了一位史学名家，他就是《三国志》的撰著者陈寿。陈寿在蜀汉政权时任观阁令史，入晋后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他在收集三国时期官私著作，掌握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著成65卷纪传体史书《三国志》。书以魏、蜀（汉）、吴三国并列，各自独立成志，亦属创例。该史书叙事核实明晰，但过于简略。南朝宋时裴松之为之作注，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几十种，引文首尾完备，且考订异同，使注文多出本文数倍，以其宏富的史料弥补了陈寿本志的不足。裴注后的《三国志》，成为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的最好的正史。

在南北朝后期，陈霸先走上了历史舞台。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原北朝降将、羯族人侯景举兵叛梁，制造了一场大祸乱。南朝梁都城建康（今南京）和广陵（今扬州）、吴郡（今苏州）、吴兴（今湖州）、会稽（今绍兴）被相继破城，叛军烧杀抢掠，城池几成废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督七郡诸军事的陈霸先（吴兴长城人，小吏出身，因军功得以升迁）于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在始兴（今广东韶关西南）起兵勤王，讨伐侯景，受湘东郡王萧绎节制，率部至江西九江，与王僧辩会师后，顺水东下，一举收复建康，击灭侯景，进位司空，领扬州刺史。梁元帝被杀后，他与王僧辩奉萧方智为梁王。天成年（公元555年），王僧辩纳北齐扶植的萧渊明为帝，陈霸先从京口举兵进建康，诛王僧辩，立萧方智



玄奘大师取经图

为帝（梁敬帝），并击败北齐军队，受封为陈王。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代梁称帝，改国号为陈。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使南朝汉族政权得到保护、延续，其功至大。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僧玄奘为佛教的发展和研究做出了无与伦比的重大贡献。玄奘，本名陈炜，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系杰出的中国佛教翻译家、旅行家、学者，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3岁出家，21岁受戒。后遍访名师，精通经论。因感国内诸师说法不一，各种佛经亦不尽相同，遂决计西行天竺学习，以求解疑释惑。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从京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凉州出玉门关一路西行。翻高山，涉荒漠，渡恶水，迎风沙，曲折迂回，险象环生，但仍心坚如磐，不改初衷。经四载苦旅，行程1.2万公里，辗转到达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拜印度名僧戒贤为师，潜心学研《瑜伽师地论》等佛经，刻苦攻读梵文。后又游学天竺各地，与一些学者展开辩论，一时名震五竺。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收集657部梵文佛书，回到阔别16年的长安。在唐太宗、唐高宗父子的支持下，组成完备的译经场，汇集各大寺高僧20余人，协助他潜心译经。历时19年，共译经75部、凡1335卷。在译经时，他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使所译经文，既忠于原文，又便于读者理解。由于他翻译的经文笔法严谨，表

述精确，且纠正了从前旧译中的错误，故被后人称为“新译”，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玄奘因此与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他和弟子窥基等人创建了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对中国乃至日本、朝鲜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据说，玄奘还建议朝廷在长安大慈恩寺内建一高塔，用以保藏他从印度带回的大量佛经文献与佛像舍利。唐高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于公元650年建大雁塔。塔成后，玄奘将一批珍贵文物藏于塔内，并在此译经讲法。在研究佛法之外，他还将其西行见闻口述，由其门徒辩机记录整理成一部长达12卷的游记《大唐西域记》，此书记述了唐僧西行所旅经的110国和所传闻的30余国的地理位置、佛教古迹、历史传说及当时佛教传播的情况，以及各地山川、城邑、物产、风俗等，多为新、旧《唐书》所未载，是研究南亚及中亚地区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向来为世界学者所重视。全书文笔质朴，畅雅可诵，系唐初纪实文学佳作。玄奘还是印刷术的先行者。

《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四众（僧、尼、善男、善女），后逐渐流行。由于唐僧贡献卓越，多有建树，因此民间广泛流传他的故事。元代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记》和明代吴承恩的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都是取材于唐僧玄奘的故事，而后进行艺术创作的。

陈子昂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反对唐初诗坛因袭齐梁以来的柔靡之风，提倡诗歌创作继承《诗经》风、雅传统，发扬汉魏风骨，对唐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代表作有《感遇诗》38首和《登幽州台歌》等。其《感遇诗》其中的一首，抒写了作者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随乔知之北征时的感慨：“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辞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风格高峻，寄托深远。其在中国诗坛上最受国人称道的诗作当数《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作者以短短22个字的架构，就将辽阔的宇宙意识、悲壮的生命情调与深邃的人生哲理交融贯通，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他的一些抒情小诗，亦多出名句，如其在《春夜别友人》中吟哦的“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之句就情境凄清，韵味深长。陈子昂的诗作对唐代清健诗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后，张九龄的《感遇》诗和李白的《古风》，均受到陈子昂感遇诗的启迪。

宋代，在徽宗赵佶执政后期，朝廷腐败，外族入侵，国势呈多事之秋。在国运危难之际，一些耿臣志士



拍案而起，要求朝廷外拒强敌，内用忠良，铲除奸佞，以振朝纲。陈东即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陈东，字少阳，徽宗时入太学。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太宗完颜晟在灭辽之后即兵发两路，大举南侵。十二月，徽宗于风雨飘摇之际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翌年正月初三，徽宗以“烧香”为名，离京南逃，奸臣蔡京、童贯、高俅等相继带家人南遁。消息一经传开，朝野义愤填膺。陈东率太学生伏阙上书，指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为六贼，说“六贼异名同罪”，处死后，应“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在举国舆论的压力下，朝廷不得不将此六人予以严惩。六人中除蔡京死于流放途中外，余者或被赐死、或被处斩。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迫京城开封，陈东又屡次上书。钦宗听从宰相李邦彦谗言，罢免抗金民族英雄李纲与种师道，主张对金割地求和，陈东又率太学生于宣德门上书，军民从者达十余万人，一致要求坚持抵抗，喧呼声惊天震地，一时撞坏登闻鼓。钦宗见群情激愤，只好恢复李纲职务。高宗赵构即位后，陈东被召往南京（今河南商丘），适值李纲再被免职，他又三次上书，力言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李纲不可罢，请高宗亲征，迎归徽、钦二帝。陈东此举触及高宗内心痛处，一怒之下竟将陈东押赴市上斩首。国人闻之，莫不痛心叹息！陈东的悲壮结局，再次应了东汉时那首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此期，有数位陈姓诗人驰名文坛。家于彭城（今徐州）的陈师道，在读书之余思念苏轼、黄庭坚等诗友，于是发出了“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时开”的感叹，此诗寓哲理于日常生活感受之中，从而引发读者共鸣，故颇受称道。与陈师道同属江西诗派的陈与义，南渡后经历战乱生活，多有感怀时事之作。在《伤春》诗中，作者先是抨击了高宗赵构的逃跑政策和南逃温州的狼狈之像，继而又由衷赞扬了长沙太守向子諲以弱小兵力英勇抗敌的壮举：“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在《临江仙》词中，作者先是追忆当年旧友欢聚的场景：“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尔后又抒发了在战乱中流寓江南的苦闷心绪：“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前后对比，产生了较强的艺术效果。

陈亮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诗人。他是绍熙进士，在孝宗朝三次上书，力主抗金，三次被诬陷下狱。在军事上，他提出许多杰出的军事思想。在政治哲学方面，则反对理学或道学。提倡注重事业功利有补国计民生的

“事功之学”，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的命题。指出物欲是人的自然本性，“天理人欲可以并行”，但欲须由礼加以节制。他反对朱熹认为三代以下天地人心日益退化的观点，通过三年的书信来往，就“王霸义利之辨”与朱熹进行了争论。陈亮在词的创作方面极富成就。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秋，宋庭派章森（德茂）出使金国祝贺新年，陈亮为其送行，写下了《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词：“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此词慷慨激越，充盈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可与岳飞的《满江红》相媲美，是宋词中的名篇。四年后，陈亮到京口（今江苏镇江）观察地形，准备向朝廷陈述抗金北伐的策略。他登临位于京口北固山甘露寺内的多景楼，吊古抚今，写下了《念奴娇·登多景楼》词：“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词人借评东晋偏安史事，对南宋朝廷只图对金妥协的行为作了抨击，以词的形象化语言，提出了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的政治主张。此词笔锋犀利，气势纵横，与17年后辛弃疾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宋词中为人传诵的佳作。

元代，陈孚和陈基享誉文坛。陈孚在《鄂渚晚眺》中吟出了“橹声摇月归巫峡，灯影随潮过汉阳”的诗句，将夜晚江上行船的情境写得有声有色，深受后人赞赏。陈基在《裁衣曲》中，以乐府体的形式描写了一位女子为远在边关的丈夫织布裁衣时的心情：“裁衣不怕剪刀寒，寄远唯忧行路难。临裁更忆身长短，只恐边城衣带缓。”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令人称奇。



# 临沂汉画像石上的“车马”类型

桑玉厚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以石为纸、以刀代笔的石刻艺术品，用以装饰神道、宗祠、地宫，风行300余年。汉画像石同商周的青铜器、南北朝的石窟艺术、唐诗宋词一样，各领风骚数百年，是汉代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

车马出行图是汉画像石上最常见的内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大部分的汉代墓室里几乎都有车马出行图的出现。在《中国汉画像石全集》中，大约2000块画像石中约有240多块画像石上出现车马出行图。出行行列中有各种形式的车辆，有斧车、轺车、辎车、骈车、驷马安车等，共12种之多。

## 一、车马出行图出现的背景

汉代以前，车马是国力、军力的象征。一车御四马被称为“一乘”，军力强国被称为“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车马变成了最具军事实力强弱的象征。汉中期以后，车马则成了财富、地位的象征。那时衡量人的身份、地位不是有车无车，有马无马，而是坐什么样的车，骑什么样的马。东汉明帝时，百官上朝，“车如流水，马若飞龙”。汉代的车舆制度始创于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以后继位的皇帝又都陆续增补修定，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乘车制度。《后汉书·舆服志》中有详细记载，如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前有三辆导车，后有两辆从车；三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骑吏二人；骑吏皆骑马、带剑持棨戟为前列开道。车是一种出行仪仗，是身份的象征，只有官员才能乘坐马车，“贾人不得乘马车”，车马出行成了统治者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贵族官吏们表现其地位和权势的绝好机会。

车马出行图之类画像最初发现时，其功能一度被认为是为了再现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和地位，是汉朝官僚地主生活的写照，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的最高身份，因而据车马出行图便能判定各组车马出行图中主人的大致身份。但随着多种榜题出行图的发现和增多，研究者逐渐注意到，在部分出行图中，榜题明确标明了墓主人并非出行队伍的主角。他们往往以随员的身份出现其中，图中展示的仪仗仪卫规格是墓主人所不能享用的。这些榜题画像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这类画像的传统认识。在东汉后期社会批判思潮中，时人王符和仲长统的言论也清楚地表明，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有些官吏、巨商富贾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势、财富，为了追求车辚马啸的威严，在墓里僭越建造刻画的大有人在。这也就是说，在汉画像石上出现的车辆，并不能非常确凿地证实墓主人的身份。

汉画像石中的车骑出行图大致可分作两类：一类是表现墓主生前的仕途经历，完全再现现实生活中出行的场面。多数的榜题出行图表明，其刻绘的内容主要以墓主人生前的履历事迹为主。如嘉祥武氏前石墓即武荣祠三壁上部的车骑出行图，图上有“令车、君为掾时”、“为督邮时”、“君为郎中时”等榜题，清楚地显示了武荣的为官历程和身份地位及其各时

期乘坐的车骑。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横贯三壁上部的“大王车”出行图表现的祠主参加诸侯冢簿活动的经历。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东汉晚期墓室壁画上，重在展示墓主人的一生经历，着意突出墓主人从“举孝廉”、为“郎”，到出任“两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而止于“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一系列仕途生活情景，可称为墓主人的一幅“传记画”，其对生前功业、尘世幸福的自叙、自赏、自炫、自乐的意味跃然于纸上。第二类表示幻想中的冥世、仙界出行，为“墓主升仙”的场面，这些出行行列一般都是朝着门阙（天门）的方向行进，表达墓主升仙的意境，因而这种主题的画像亦可以称为“墓主升仙图”或“车马临天门图”。

## 二、临沂汉画像石上的车马类型

目前所见的临沂汉画像石上，有斧车、轺车、施轳车、辒辌车、骈车、轩车、棚车、牛车、驷马安车、輦车、辇车等各种形式的车辆。除多为马拉车外，亦有龙拉车、虎拉车、鹿拉车、鹤拉车、凤拉车、鱼拉车、鸟拉车等。

一、斧车。斧车是一种由一马或二马拉的上无盖无帷的轻车，车上植建矛、戟等武器，因其輿中间竖立一柄大钺斧，故名，多位于车骑出行队伍之前，以此来象征主人的权威。从汉画像石中的斧车形状看，可乘坐二人。《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县令以上，加导斧车”。斧车是公卿以下，县令以上出行时用为前导之车。当时官级在千石以上者，才导以“斧车”。《白虎通·考黜篇》云：“能诛有罪者赐斧钺”，能够导以斧车者，或许象征有生杀之权。斧钺象征生杀之权是源于旧制，如《礼记·王制篇》中就有“赐斧钺然后杀”之句。《释名·释兵》说：“威，威也，斧以斩断，见者皆威惧也”，这也说明主人出行时用斧车既用以壮威仪、明身份，亦是为了对百姓进行威吓。

图1车马出行图，自右至左刻五轺车一斧车；图2车骑出行图，刻一斧车驾双马，一驷马安车。



图一



图二

二、轺车。轺车是由一马或二马拉的有盖无帷的可以四周遥望的轻车。刘熙《释名·释车》说：“轺车，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又《汉书·食货志》颜注：“轺，小车也。”司马贞《索隐》说：“谓轻车，一马车也。”《晋书·舆服志》说：“轺车，古时之军用车也。汉代贵辒辌车而贱轺车，魏晋贵轺车而贱辒辌车。”轺车一般驾一马，但也有驾二马的。因轺车结构简单，快马轻车，因此为一般小吏出外办理公事或邮驿传递公文时乘坐的马车。轺车的形制源于战车，汉初时轺车还是立乘，后来改为坐乘，一马可乘坐二人，御者居右，官吏居左，因车四面空敞，就是坐在车内也可以随意极目远眺。汉画像石上均为坐乘，尚未发现立乘者。





图三



图四

图3车马出行图，刻三轺车；图4祥禽瑞兽、车骑出行图，刻二轺车；图5祭祀图，自左至右刻一棚车三轺车；图8车马出行图，刻一轺车一辎车一棚车；图13上层刻三轺车。

三、施幡车。幡（音fān），是指古代车厢两旁反出如耳的部分，是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施 车是由轺车发展来的一种马车，它比轺车只增加一对车耳。所谓“施幡”，即在车舆两侧加置长条型板状物，“板”的上沿往外翻折，外侧有垂下的边板。这种呈板状物的“幡”，用竹席或皮革制成，附加在舆两侧以遮挡车轮卷起的尘泥，因此“幡”又有“屏泥”、“车耳”之称。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认为“施幡车是在车轮上方装有挡泥板的轺车”。施幡车是中、高级官吏出行时坐乘的轻快主车。为体现等级差别，当时规定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只准“朱左幡”，即将左边车幡髹以红色。二千石的官吏方允许“朱其两幡”。施幡车前多驾二马。

图8车马出行图，自左至右刻二轺车一施幡车一轺车。

四、辎车。辎车、辎车都是施有车衣的车，画像石上常见此种车的图像。刘熙《释名·释车》曰：“辎车，辎，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辎车即带有屏障的车。此车双辕单马，方形车舆，此车盖下车舆四面施以帷幔，成“四面屏蔽”状，车侧屏蔽一般有窗。车盖硕大，且四边稍稍上卷，呈盔帽形顶。车门改在前面，舆内仅容一人，御者坐在车舆前的轼板上。辎车是妇女乘坐的车。古时妇女不许抛头露面，故乘辎车，《礼记·曲礼》云：“妇人立不乘”。《后汉书·志第二十九·舆服上》云：“太皇太后、皇太后乘坐的辎车屏之以紫罽，左右骝，驾三马。长公主的 车屏之以赤辎，贵人、公主、王妃则乘油画辎车，皆只有右骝”。此车已见于临沂白庄、苍山兰陵、苍山城前画像石



图五



图六



中。

图9迎宾、车骑出行图，画面分四层，第三层中间刻一辎车，车内有女眷二人；第四层刻一轺车。图10乐舞、车骑出行图，下层刻一轺车一辎车一棚车。

五、辎车。辎车也是一种双曲辕驾单马、施有车衣的带篷车，其形制和辎车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车舆后半三面屏蔽，前敞，屏蔽一般不超过车轮中轴前伸。《释名·释车》曰：“辎车，辎，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辎、辎之形同，有邸曰辎，无邸曰辎。”“辎车，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也。辎，厠也，所载衣物杂厠其中也。”邸，一种观点认为是指车后面的横木，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指车后面的屏蔽。汉画像石仅表现车的侧面，辎车和辎车的有邸和无邸是很难区分的。《后汉书·舆服志》曰：“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骖，加交络帷裳，皆皂。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得乘漆布辎辎车，铜五末。”这就明确了上述官级的夫人所乘其夫的安车也好，辎车也好，都必须是黑色的。

李发林先生指出：“辎车是前开门，后面封闭，而辎车后面垂下一块布帘，从后面也能上去。”辎车是一种适用于长途旅行乘坐的车，既可载可行，夜间又可卧息车中。一般辎车和辎车可并称“辎辎”。辎、辎在汉代都是极为舒适而又装饰华丽的高级马车，专供贵族妇女乘坐。辎车可以里面躺卧休息，亦可载寝具衣物。

图11龙凤、进饌、出行图，下层刻一马拉一辎车；图12车马出行图，下层自左至右一轺车、一辎车、一棚车；图5车马出行图，画面庙的右边有一辆带交络的轺车和一辆辎车。



图七



图八

六、轩车。轩车又称藩车，是汉代供三公和诸侯乘坐的轻便马车。轩车与辎、辎不同之处在于，伞盖与屏板之间有较宽敞的间隔。《左传·闵公二年》：“鹤有乘轩者。”注：“服虔云：‘车有藩曰轩’。”《汉书·陈遵传》说：“遵初除，乘藩车，入闾巷。”注曰：“藩车，车有屏蔽者。”《说文·车部》：“轩，曲柄藩车也。”藩，《说文·车部》：“屏也。”轩车之藩，或以席，或以皮革为之。但李发林先生认为，轩车与藩车不完全一样，“藩车与轩车共同点是都有不太严实的藩篱一般的屏蔽；而其不同点，则是曲柄和直辕之分。”即轩车曲柄，藩车直辕。

图14车马出行图，上层刻一轺车二辎车一棚车，下层刻二轺车一轩车。图15车骑出行图，下层刻一轩车、一辎车，二棚车。图16祥禽瑞兽、车骑出行图，画面下层自左至右为三轺车和一四维轩车。

七、棚车、大车、輦车。棚车车舆较长，呈平面长方形，两直辕，上施卷棚，前后无遮蔽，也可以不带卷棚，不带卷棚者称大车。安上卷棚时，可以卧人；不安卷棚时，可装粮食、杂物。装粮食时，安装前后挡板；如卧人，可拆下前后挡板。此车的主要功能是载物，所以在汉画像石中常排在车骑出行图的后面，或一辆或两辆。汉画中的大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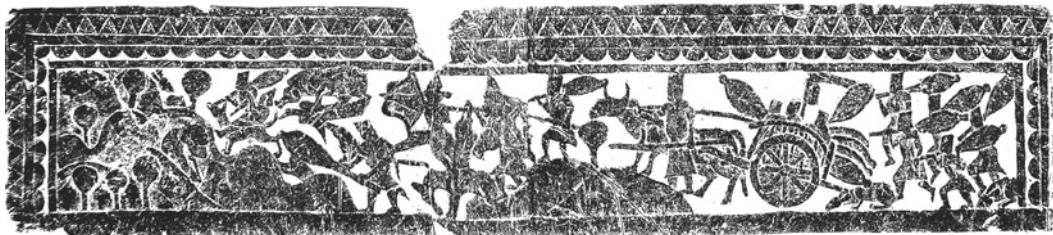
图十



图九



图十一



图十二

般直辕，无盖，车箱较大，驾牛。《说文通训定声》说：“《周礼·乡师》：‘与其輶’。”注：“驾马，所以载任器也。”古者大车多驾牛，其驾马者曰輶（jǔ）。《周礼·地官·乡师》的原话是：“正治其徒役与其輶。”注：“輶驾马，……所以载任器也。”任器，即“用器”，《周礼·秋官·司隶》贾公彦疏：“用器除兵之外，所有家具之器皆是用器也。”

图6车骑出行图，桥上三辚车，左下一棚车；图17乐舞、车骑出行图，下层左起刻一辚车、一辚车、一棚车；图18祥禽瑞兽、厅堂、车骑出行图，下层刻二棚车过桥。

八、輶车。輶车是指古代宫中用的一种便车，多用人挽拉，后多指天子或王室坐的车子，秦汉后特指君后所乘的车。《说文·车部》：“輶，挽车也。”《诗·小雅·黍苗》：“我任我輶。”《汉书·李广苏建传》：“扶輶下除。”

九、牛车。汉画像石上，牛车的图像不少，与今大车略同。汉代牛车由于采用直辕形式，所以支点较低，在平地上行车时远比曲辕的马车平稳安全。加上辕直，制作时便可选用较粗大的木材，提高了车辕的坚固性，而无须像马车那样附设加固杆。汉以后，人们坐车不求快速，但求安稳，直辕的优点渐渐显出，直辕车也开始盛行，而曲辕车渐被淘汰。

牛车最初是商贾们用来载货贩运的运输车。古代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因此自古重农轻商，商人虽富，但在政治上却无地位，被列为“庶民”、“小人”。在崇尚马



车、以马车明尊卑的时代，乘牛车被视为是件“卑贱”的事。所以，大小奴隶主贵族死后，随葬品只用马车，而绝对不用牛车。至今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有随葬的牛车坑。这种重马车、轻牛车之风至秦汉犹存。汉初，经济凋敝，《汉书·食货志》云：“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是因为当时马匹极度缺乏，同时也被作为一种反常现象载入史册。《史记·高五王传》记载：“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续汉书·舆服志》云：“贾人不得乘马车。”所以牛车在汉代就成为商人们运货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了，不少富商大贾拥有成百上千辆的牛车。

图12狩猎图，画面右有一牛车，载三人及猎具。

十、驷马安车。驷马安车是四匹马共拉一辆车。《礼记·曲礼》郑注：“安车，坐乘，若今小车也。”安车特指坐乘之车，常驾四匹马。安车一般为诸侯王所乘。此车有“羽盖华蚤”，而且在车衡上立一鸟，与《后汉书·舆服志》所说“鸾雀立衡”之制正相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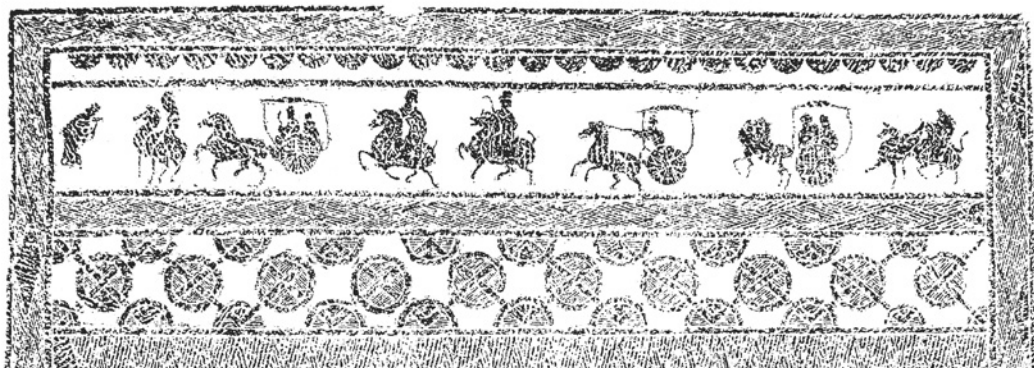
在汉代，驷马安车是太守以上高官乘坐的车。《续汉书·舆服志》说：“天子驾六，余皆驾驷。”注引《逸礼·王度记》说：“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这是指周代的制度。许慎《说文》云：“诸侯及卿驾驷。”许慎所说与《续汉书·舆服志》同，是汉制。《汉书·朱买臣传》：“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朱买臣当时任会稽太守，由此可知，太守以上的高官，包括卿、侯、王，才可以乘坐驷马安车。当然，如有人得到皇帝的特别恩宠，亦可乘坐驷马安车。驷马安车是汉画中见到的最豪华的车子。此种图像多见于山东地区，四川、陕北、河南不易见到。宋代诗人黄庭坚游王屋山时作诗《以天坛灵寿杖送辛老》云：“王屋千霜老紫藤，扶公休沐对亲朋，异时驷马安车去，拄到天坛愿力能。”

图2车骑出行图，左刻一斧车驾双马，右刻一驷马安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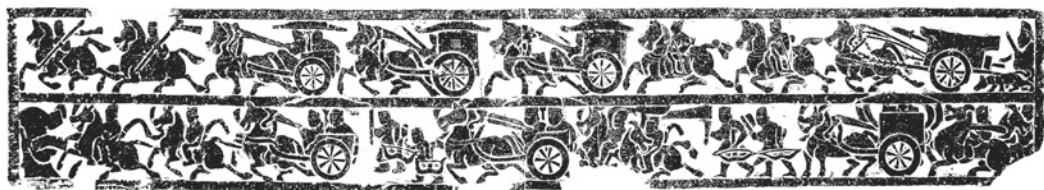
临沂之外的汉画像石上，还有鼓吹车、客车、轺辒车、輶车画面。

鼓吹车。和斧车一样，是仪仗用车，一般是载乐队的车子。河南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的出行图中有鼓吹车，车舆中树一建鼓，羽葆飘扬，一鼓吏持槌击鼓，开道前行。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的大王车出行图中的鼓吹车把鼓和吹奏乐器置于一车，车舆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二鼓吏侍槌击建鼓，下层四乐手两两对坐吹奏乐器。

客车、轺辒车。客车和轺辒车很难区别。从汉画像石画像看，有一种车，有盖，车侧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图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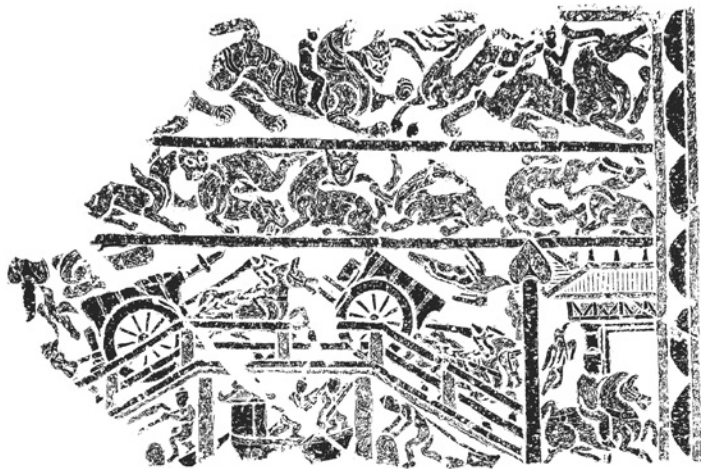


图十七

有屏蔽，屏蔽上开有小窗，即为此车。

輶车。亦作“輶车”、“輶车”。是指载运棺柩的车子。《释名·释丧制》曰：“輿棺之车曰輶。”《说文》曰：“輶，丧车也。”《汉书·王莽传下》：“百官窃言‘此似輶车，非仙物也’。”颜师古注：“輶车，载丧车，音而。”这种輶车，汉代又称广柳车或广轍车。据《释名》的记载，这种车称为“鳖甲”，从形象上看是模拟鳖甲的上盖而建造的。汉代人把装梓棺的车造成“鳖甲”形状，是取其作为宇宙之象征。江苏沛县龙固汉画像石上有一幅送葬图，十人用绳索牵拉着一辆由四轮的大篷车，大篷车形如龟甲，装饰奇特，巨大笨重，这一种特殊的车，即“輶车”。

以上所列举的车多为马所拉，但在临沂的汉画像石上，在升仙内容的汉画像上，还有龙拉车、虎拉车、鹿拉车、鹤拉车、凤拉车、鱼拉车、鸟拉车等；在乐舞百戏图之类的汉画像石上，还有戏车等。



图十八

# 院士诗人王鸿祯

王善刚



中国科学院王鸿祯院士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一直想写一篇祭奠的文章，但一直没有找到适宜的切入点。王鸿祯院士巨大的科研成就和他对国家，对世界的科学贡献，外界已经知道了很多，所以，我就选了“院士诗人王鸿祯”这样一个主题。

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他们的专业之外都有他们的爱好及特长，王鸿祯院士也是如此，他不仅是一位世界级的地质科学泰斗，还是一位具有高深文学修养的诗人、画家。他从小到老对诗词情有独钟，从《王鸿祯诗联文序选集》里可窥一斑。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求学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乃至90岁高龄之后，时常用诗人的情怀对社会、自然、人生、科学，用诗表达对祖国，对大自然，对时代，对事业，对师生长幼，对亲情的热爱、感触与情思。

—

王鸿祯，中国地质学家，1916年11月17日生于苍山县卞庄村。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并留校任教。194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2年转入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副院

长，武汉地质学院教授、院长，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先后任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地质学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秘书长、理事长，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曾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民进中央顾问，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2010年7月17日6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王鸿祯院士研究的领域有：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建立四射珊瑚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80年代建立中国构造单元划分及名词体系，综合研究了中国地壳构造演化和古地理发展提出全球构造阶段划分与构造格局重要演变；90年代研究层序地层与古大陆再造，提出地球节律的普遍性和全球大陆基底构造单元划分与泛大陆聚散周期，形成了全球构造的活动论与历史发展的点断前进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所著《中国古地理图集》和《中国古生代珊瑚分类演化及生物古地理》，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王鸿祯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工书法，喜文词，这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比较大。同时，他从小生活的地方，正是具有灿烂文化渊源与历史名人辈出的古楚兰陵之邦，仓颉、左丘明、季文子、荀卿、匡衡、鲍照、徐陵等家乡的历史文化名人也许对他有极大的潜在影响，乡土文化气息、文化氛围也会自然而然地浸染与熏陶他幼年的心灵。因而，他自幼就喜欢背诵古诗词，较早地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

1929年，王鸿祯在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学习的时候，除了喜欢绘画外，更多的是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作品，他还负责出刊壁报，这对他的写作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王鸿祯在学习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还参与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有时事报社、读书会、写生组、小型剧团，组织演出活动和远足郊游活动等。学生时代的王鸿祯如同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感受到无限的新鲜和无穷乐趣，使他增长了知识，培养了志趣，也历练了才干，同时也给他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文学基础。

1933年父亲去世后，家境逐渐衰落。此后他随哥哥赴北平求学。王鸿祯对绘画尤为喜爱，一度就读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这时，他在北平古都的浓厚文化氛围中接触到大量书刊，从《独立评论》上读到著名学者丁文江和胡适的文章，又在报纸上了解到中国科学家在西北科学考查中的重大发现，他还有幸聆听过鲁迅先生等名人的公开讲演，使他在广阔的文化领域和开放的思想领域中大开眼界，自觉接受了新思维风暴的洗礼，因而在浓郁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决心改学自然科学，以实现科学强国的夙愿。

1935年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洋大学三所名校，均被录取。经过权衡，最后去了对他有更大吸引力的北京大学，学习地质学。入学之初，他十分倾情于有丰富藏书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废寝忘食，博览群书，不仅阅读了大量国内文学作品，同时还阅读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这也给王鸿祯后来的诗词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思想与精神营养。

## 二

1940年，王鸿祯随谢家荣先生到昆阳做磷矿情况的短期调查。在磷矿层中采获了软舌螺化石，他写了《云南昆明中邑村磷矿述略》的短文，征求谢先生的意见，拟投送《中国地质学会会志》，谢先生立即给予鼓励，并要他自己署名。文章于1941年刊出，王鸿祯的科研成果第一次得到师生赞许，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工作热情高涨，文学情思也随之喷涌。

1943年5月，他给自己所作的水彩画《翠湖春色》题写了一首五言律诗，表达了诗人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始终能够以积极而美好的心态和情绪对待生活，对待学习，对待科研，对待未来的真实情感及精神状态，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

佳气兼天静，春光入望遥。斜晖留万瓦，疏影上池桥。

台榭临芳浦，青山出柳梢。堤边几株树，婀娜欲相邀。





然而，“此画常悬斋壁，于十年动乱中遗失，”实为遗憾，极为可惜。

这个时期的中国，国家政事腐败，战局频仍，社会与民族事倍累卵。王鸿祯感愤世，写下了《有感国是学风》一诗，抒发了对时世的既“幽愤牢愁”又极力“续学”以“匡时”的进取精神和情怀，以及对那些在国家危难之时只为一己私利，披着救国救民外衣，涂炭生灵，置黎民百姓生死与不顾的政客与卖国者的不耻：

亦知世事等蜉蝣，幽愤牢愁竟未休。揆己度人只应尔，焚琴煮鹤亦何犹！

投身久负匡时志，开卷长怀续学忧。衰世功勋同累狗，端居永日笑沐猴。

《登简旧西山》，则表达了诗人通过登临简旧山巅，看到更多更好祖国山川河流的美好景象之后的感悟：一个人，只有登临高处才能够望远，才能够看到更多的低处看不到的美好景象。如若匡时救世，必须要努力学习丰富自己，才能够丰满羽翼，登高望远，才能够“飞越万重山”，反映了那个时代年轻学者的理念与追求：

登高殊不觉，下望尽平川。云影凝轻霭，波光散紫烟。

崖巖石危立，天际鸟回环。何当生羽翼，飞越万重山。

1945年，王鸿祯考取了去英国的公费留学生。出国前在重庆小住时，见到了他崇敬的李四光先生，请求其指点赴英学习研究方向。李四光先生“承示应扩展眼界，当如黄汲清先生之博”。在嘉许他在珊瑚古生物研究之外，还鼓励他在地质构造理论等方面加强学习研究，有所建树。同时嘱咐他要博学多识，取长补短，中西对照，解脱思想的束缚和旧框框，放宽视野，学习探究西方先进的思维方式与技术创新。这对他日后的巨大学术成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作用。因李四光先生字仲揆，所以诗中称“揆老”。在中国地质学会年会期间见到黄汲清先生，王鸿祯院士以此诗相赠：

二叠名家留巨著，秦巴构造探幽微。

喜闻揆老犹说项，敢望他年更追随。

是年“8月，在加尔各答欣闻抗日战争胜利”，王鸿祯喜不自禁。日寇投降，自己不能在国内见证，不能享受胜利的快乐幸福时光，自己还滞留在异国他邦，的确心存遗憾，遂赋诗两首。其一：

华夏尘迷近十秋，忽传凶逆此朝休。非关盟势屈强虏，赖有群心护九州。

文物千年两京在，关河百二一时收。欣看建业竞同辈，愧我佛邦尚滞留。

### 三

20世纪50年代以后至80年代期间，或许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原因，王鸿祯先生很少再有诗作了。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王鸿祯似乎焕发了青春，诗的春天也随之而来，又有了不少新作。

1990年春天，王鸿祯参加中国地质博物馆组织的化石工艺展览，被美不胜收的精湛工艺品所感动，特别是被众多的珊瑚与昆虫化石工艺品所陶醉，于是诗兴大发，遂赋《题化石工艺展》诗：

生命有遗篇，留踪好记年。搜求情未了，研讨意恒牵。

琥珀蜉蝣戏，珊瑚蛟螭蟠。奇葩吐新秀，佳艺焕人间。

1993年，当王鸿祯院士重读朱夏院士所著《朱夏诗词选集》的时候，勾起了自己当年与朱夏院士诸多美好的回忆：年轻的时候与朱夏君在扬州秉烛对坐，彻夜促膝长谈，总有说不完的话。及至相伴游学到了法国，接触了新的社会环境、学习环境、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民风民俗和新思维，对于年轻的学子来说，无异于畅游在宽广深邃的知识海洋里，感觉是何等的惬意啊，尽管交往的时间有限，但是，两人志同道合，心心相通，成为一生的挚友。在地质学科、能源学科，两位院士既有共同的理想，又有共同的认识，更有相同的极高成就。



在文学爱好上两位院士也是不谋而合，文化修养上不分伯仲，而王鸿祯院士非常谦逊地说“诗才谈趣羨君长”，儒雅之风，君子之风跃然纸上。王鸿祯感叹朱院士才华横溢，博学多识，虽才高八斗，但是却命运多舛，英年早逝。对此，王鸿祯院士深感遗憾，赋得《忆朱夏院士》：

维扬夜话情难忘，法境同游兴欲狂。

构造能源欣共识，诗才谈趣羨君长。

对待自己的恩师，王鸿祯始终念念不忘，长期信使书往。1997年1月，“临沂五中（解放前山东省第五中学的称谓）学友为刘进之老师97华诞祝寿，刘老事后成自寿诗七律寄给”王鸿祯，遂“步韵敬和一首”：

世纪同龄历久常，友生小聚诉衷肠。

兴邦科教常萦绪，学问启蒙未敢忘。

君破三山担道义，我游十国论文章。

喜看儿女均彦俊，杯酒诗篇暖心房。

2005年，是王鸿祯院士诗词创作的又一个新的高潮。是年，仅仅在杨光荣先生编著的《王鸿祯诗联文序选集》中就收录了11首，如：《贺袁宝华学长90寿诞》、《贺李思田伉俪》、《寿杨光荣君》、《答马大猷学长》等。

还有一首诗更为感人。就是这一年的6月，已届90高龄的王鸿祯院士，还在亲自审读期刊论文。审完之后写下了《审读期刊论文有感》的诗句。一连10天的辛勤耕耘，对一个90岁的老人来说，是多么艰苦的事情。但是，王鸿祯院士那种斟字酌句的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那种不畏艰辛的吃苦耐劳的无私奉献精神，是老一辈科学家留给我们的无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冗长非细致，精简亦知难。

十日辛勤事，此身哪得闲！

#### 四

王鸿祯院士不仅写诗，还撰写了大量的联语。联语是诗与词的孪生姊妹，言简意赅，寓



意深邃。如1992年为中国地质大学成立40周年，题写的一联贺词：

忆四纪建业艰苦，历劫难而弦诵不歇，两地同心怀盛举

念五年起步峥嵘，非改革则事功难继，全方开放创新猷

2005年为“青少年发展中心”书贺联，对青少年给予了热切的厚望：

自少而壮，逐步传承中华文化积淀

由理及工，全面赶超当代科技精英

2006年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书题：

五十年理论求索，根植深厚，行见学科融汇，业绩彰著

千百遍实践验证，传承精微，更祝事功永继，思维常新

2006年4月，王鸿祯院士为彭志忠教授辞世20周年所撰写的短语长联，既表达了他对彭教授的深切的哀思与赞美之情，又充分展现了王鸿祯院士的聪明睿智，全联的首字联读即为“志忠学长精神学风千古可传”：

志存兴国，忠诚科技，学追别洛，长在实际，精英凋落，神州有继

学不逢时，风华遭忌，千夫冷对，古今有几，可歌可赞，传之周替

1995年，王鸿祯院士曾题词自勉，道出了一生追求的目标与终极向往：

其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探生命之始，窥造化之奇。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其二

学无止境，学以致用，学然后知不足；

读可明道，读以忘忧，读庶几知所止！

王鸿祯院士的诗，不仅纪实记事，如歌如画，然而还用极其浅显的白话语言揭示了极为深刻的哲理。一个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一个我国的资深院士，具有如此深邃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涵养与修养，除了在科学研究上有极深的造诣以外，还在诗词、联语、绘画等诸方面做出了常人做不出来的成就，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来临沂检查指导史志工作。**7月25—26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一行4人，在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钟华的陪同下来临沂检查指导地方史志工作。副市长赵爱华等领导陪同。

朱佳木一行专程到市史志办看望史志工作人员，发表重要讲话，并亲笔书写了“方志与经济齐飞，传统与现代一色”的题词。他指出，临沂市史志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实现了史志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为其他省市的史志工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做法。今后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拓宽服务领域，推动史志工作再上新台阶。同时要求修志工作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志书的质量与工作的进度并重，二是志书的统一标准和创新并重，三是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并重，四是干部的选配和业务人员的培养提高并重。五是要将方志馆建成地情馆，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工作标准。

期间，朱佳木一行还先后参观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罗庄展览馆、江泉新村、小埠东橡胶坝、市规划展览馆、市博物馆、临沂商城市场发展史展馆、中国教育用品采购基地、王羲之故居和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书法广场等，听取了相关介绍，对临沂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兰山年鉴》第十一卷出版发行。**近日，由兰山区人民政府主办、兰山区史志办承编的《兰山年鉴》（2010）正式出版发行。该卷年鉴为16开精装本，全书前置特载、大事记，后殿辑录，中按事业分为20个栏目，共53万字，配有80余页彩色插页。该书全面翔实地记述了2010年兰山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项事业的主要情况，深刻反映各部门、各行业取得的发展成就。

**《莒南县电业志》评议会召开。**8月15日，莒南县史志办在县供电公司会议室召开《莒南县电业志》评议会。莒县史志办、沂水县史志办、日照市岚山区史志办、沂南县史志办、临沭县史志办有关领导及志书编辑人员共30余人参加评审会。与会人员对志稿进行了认真的评议，对志稿修改和下一步的编纂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沂水县交通志》志稿评议会召开。**8月22日上午，《沂水县交通志》志稿评议会在沂水县交通局召开。《沂水县交通志》编委会全体成员及兰山、莒县、沂南、莒南、临沭县区史志办领导和修志专家参加会议。

《沂水县交通志》编纂工作于2011年8月启动，

2012年8月完成征求意见稿。该志上限起于1949年，下限止于2011年。全书共9章，约计15万字。与会人员对志稿进行了认真评审，对志稿修改和下一步的编纂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郯城县地方史志暨《郯城年鉴》（2008～2010）编纂工作会议召开。**8月31日上午，郯城县地方史志暨《郯城年鉴》（2008—2010）编纂工作会议在县广电局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要求以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例》为契机，确保《郯城年鉴》（2008—2010）编纂工作顺利进行，并对下一步加强方志馆建设、二轮修志、成立望族文化研究组织及编纂《东海徐氏文化志》《郯城银杏志》等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对《郯城年鉴》（2008～2010）的供稿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对如何做好年鉴的撰写、加快供稿进度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第二轮《费县志》编修工作业务培训会议召开。**7月12日上午，费县县政府召开第二轮《费县志》编修工作培训会议，对县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乡镇的分管领导和修志人员进行培训。市史志办副主任杨兴文、市志编审科科长王卫东应邀到会，分别就地方志发展概况和历史地位、当前我市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基本情况、撰写志稿的基本要求和方法、地方志的特点、如何把握地方志的文体文风、编纂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授课。